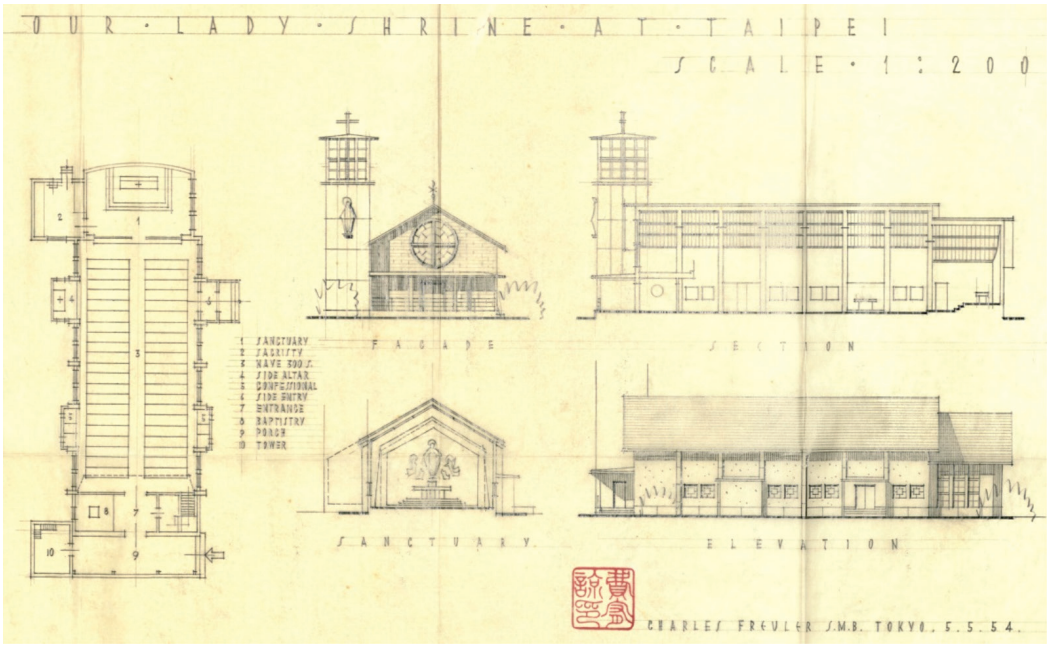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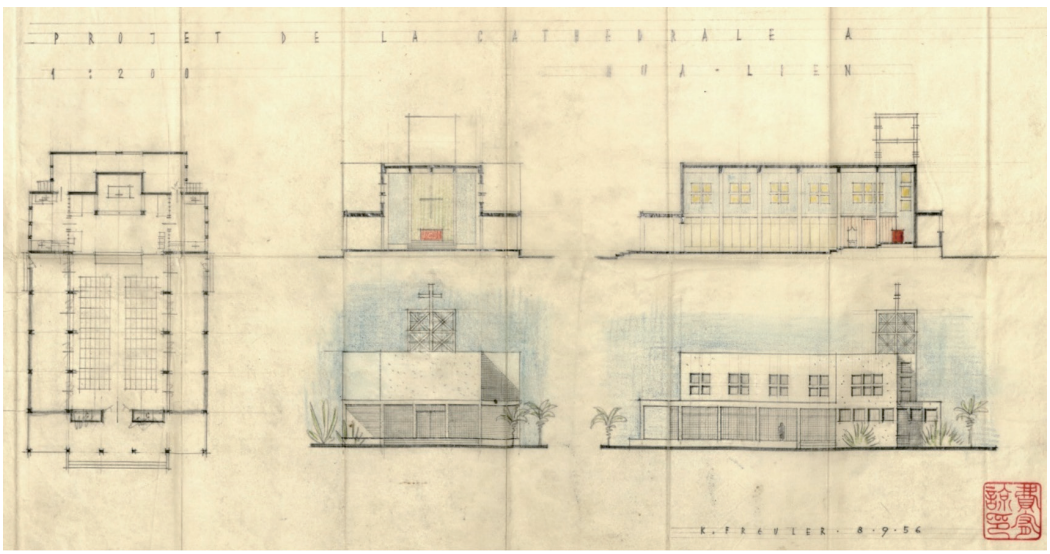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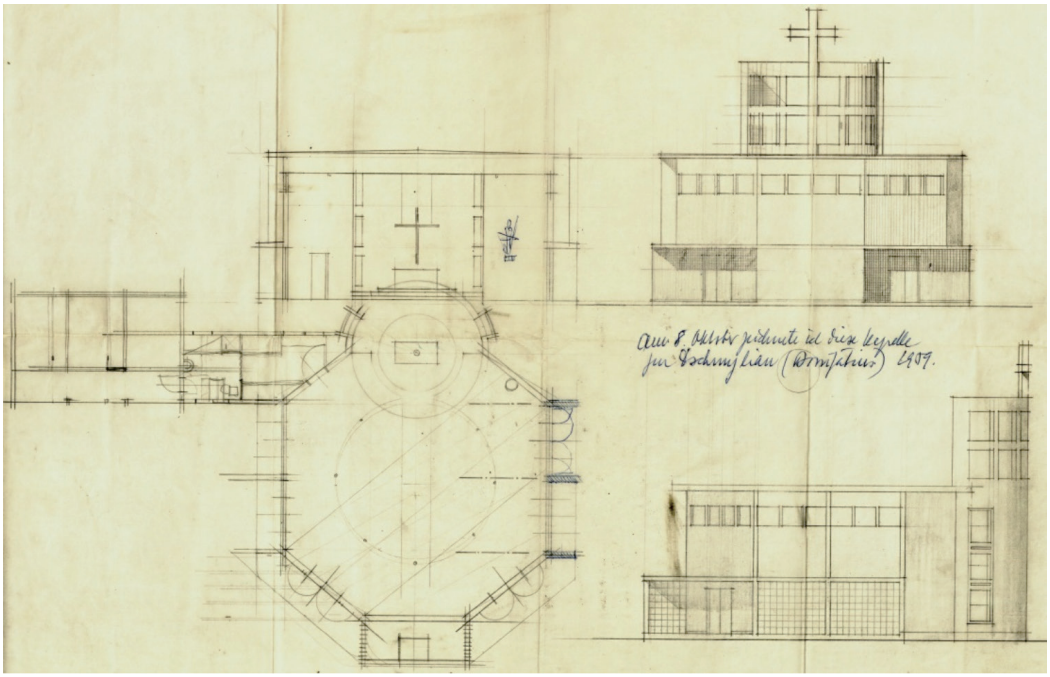
費宥諒　臺北聖母堂（Our Lady Shrine at Taipei）（1954.5.5）

1. 聖壇區 2. 聖器室 3. 中殿（500席位） 4. 副壇 5. 告解室 6. 側門 7. 大門 8. 洗禮堂 9. 門廊 10. 鐘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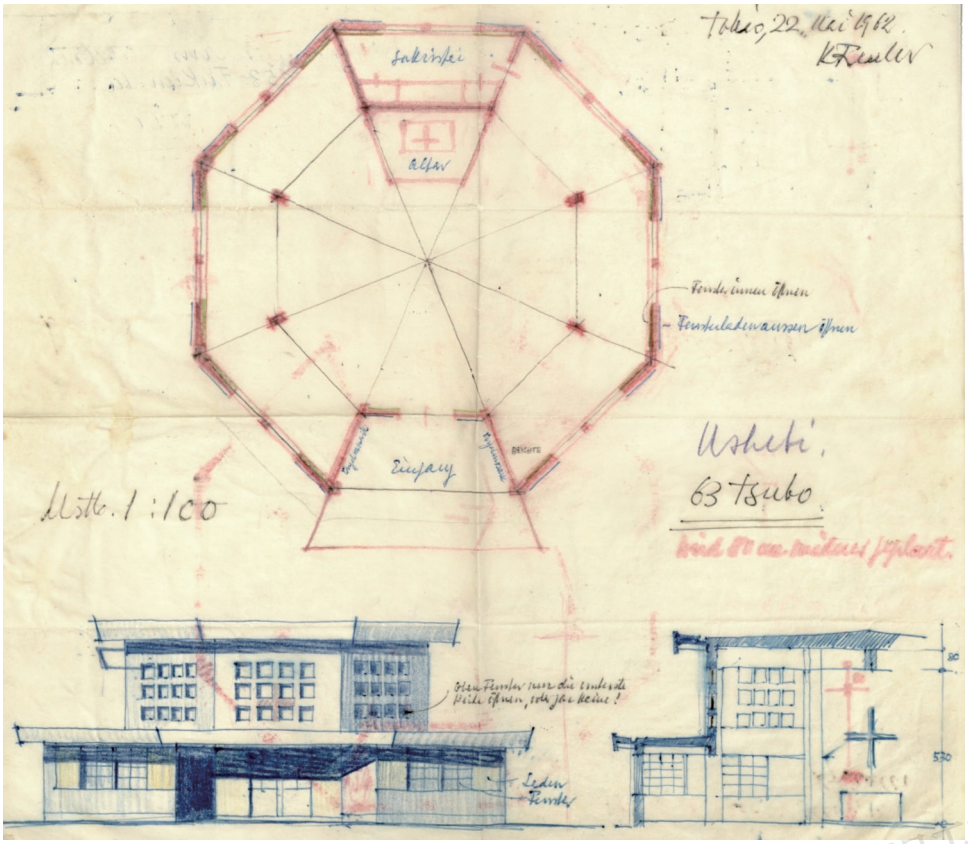


費宥諒　花蓮主教座堂（美崙進教之佑堂）（1956.9.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費宥諒　中寮天主堂（Dschungliau）（1959.10.8）



費宥諒　烏石鼻天主堂設計圖（1962.5.2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DOI: 10.6541/TJAH.2016.03.40.04

從建築到建樹：瑞士神父建築師費宥諒（Karl Freuler）的在臺教堂設計*

于禮本**

【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瑞士白冷會在日本與臺灣展開新的傳教工作。其中，費宥諒（Karl Freuler，1912－2000）以神父與建築師的身份實踐亞洲宣教的抱負，結合久居日本二十年的經歷，以及教堂建築作為宗教教育載體的信念，在1950至1970年間創作了廣佈於日本、臺灣與韓國的上百座教堂。這些教堂驚人的數量與多元的樣貌都讓費宥諒的作品在教堂建築史上成為一種獨特的存在。本文首次檢視神父建築師費宥諒在1953－1968年間為臺灣所設計的四十餘座教堂，透過梳理它們的風格特色、設計理念，與歷史脈絡，解析它們如何反映出瑞士現代教堂建築趨勢、如何融合東亞傳統建築元素，以及如何落實禮儀改革、亞洲福傳策略、宗教教育及文化涵化等理念。上述議題的釐清得以確立費氏設計在東亞教堂建築發展上的深遠影響，以及它們記錄瑞士、日本與臺灣的文化藝術關聯之獨特價值。

關鍵詞：白冷會、費宥諒、教堂建築、臺灣、瑞士

＊本文研究獲國科會計畫「歐洲現代教堂建築在臺灣--以Karl Freuler與Friedrich Linzenbach之作品為例」（NSC 101-2410-H-369-004）補助。在此同時感謝臺東白冷會、薛弘道（Laurenz Schelbert）與歐思定（Augustin Büchel）修士、葛德神父（Ernst Gassner）、鐘耀漳先生、花蓮何玫芹女士，以及瑞士茵夢湖白冷會檔案室的Elisabeth Vetter女士、瑞士琉森國家檔案室的Christina Dentler女士、傅義修士（Julius Felder）等，在檔案資料與訪談上的諸多協助。同時，也由衷感謝兩位審稿者並汪文琦老師對本文不足處之指教建議，使本篇論述能更臻完善。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 助理教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緒論

19世紀隨著歐洲勢力在亞洲的擴展，西方宣教團體在亞洲也日益活躍；其中，中國大陸是歐洲派遣宣教最密集的地區之一。然而，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西方宣教組織在東亞分佈的版圖發生變化。一方面，日本的戰後重建為西方宣教團體開啟進入的大門；另一方面，中國地區的西方傳教士則因共軍的驅趕而遷往鄰近國家。臺灣自1950年代起，成為安置撤離中國、等待重返中國的西方宣教士之據點，而這些新來的人力也為本土教區的建設帶來大幅開展。1952年，羅馬教廷讓臺灣成為中國教會聖統制下的第二十一個行省，教廷使館也從香港遷移來臺，臺灣自此成為天主教宣教的一個重鎮。① 在1950到1970年期間，歐洲的天主教團體派遣來臺的人數相當可觀；在他們的教區經營中，快速且大量的教堂興築在歷史上留下至今可見的痕跡。其中，興建教堂數量最多的當屬瑞士的白冷會；② 這些教堂見證了白冷會在偏遠花東地區的宣教熱情、慈善救濟、醫療服務與教育深耕。時至1970年代，隨著臺海政治情勢穩定、臺灣經濟起飛、信徒增長速度減緩，與村落人口外移等因素，西方宣教組織在臺灣的工作從披荊斬棘、開拓新土的階段進入到穩固維持、並逐漸由本土教會接手主導教區工作的階段，教堂的興建潮也不復以往。③

在白冷會的臺灣開教史中，費宥諒神父（Karl Freuler，1912－2000）與傅義修士（Julius Felder，1933－）是前、後期教堂設計的主將，兩人作品高達百逾座。④ 然而，這些極具文化資產意義的教堂卻直到1990年代末才開始受到注

① 中國天主教聖統制的建立始於1946年，當時才光復不久的臺灣尚未被納入中國聖統制中。費聲遠著，董增順譯，《回憶錄》（花蓮：華光書局，1980），頁76。

② 全名為「天主教白冷外方傳教會」，「白冷」取自耶穌誕生地Bethlehem之音譯。

③ 費聲遠，《回憶錄》，頁143。

④ 這些數字不包括宿舍、學校等；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傅義修士教堂建築清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目。以臺灣史視角探討白冷會發展與貢獻之論述已頗為豐富，⑤ 教堂建築方面的討論則至今僅有達興登（Justus Dahinden，1925－）設計的臺東公東高工校舍與聖堂獲得系統性的整理。⑥ 相形之下，費宥諒的教堂設計幾乎不為人知。海外宣教神父的身份、建築及藝術史的訓練，久居日本二十年的經驗，以及廣布於日本、臺灣與韓國的上百座教堂，⑦ 都讓其設計所映照出的文化意涵有別於其他當代建築師之作。然而，直到1992年才有瑞士神學家暨藝術史學家Fabrizio Brentini首以作品集的方式介紹了費宥諒在日本所設計的教堂；⑧ 之後，繼有德國學者Beate Löffler在2011年在探討日本教堂建築發展時對費宥諒的影響予以肯定。⑨ 至於費宥諒在臺灣的教堂，至今僅見於張志豪2002年的碩士論文，⑩ 其

⑤ 如費聲遠，《回憶錄》；鄭仲烜，〈傳教會與區域發展—以臺東白冷會為例〉，《東臺灣研究》，14期（2010），頁53-88；天主教白冷外方傳教會編，《天主教白冷外方傳教會來臺傳教五十週年紀念專輯》（臺東：編者自印，2003）、黃連生編，《白冷會在中國傳教史料》（臺東：臺東天主教教義中心，1995）；薛弘道，《白冷外方傳教會在華人區域》，<http://www.smb.tw/Bethlehem%20Missionare%20in%20China%20und%20Taiwan-chin.pdf>（2014年1月5日檢索）；歐思定口述、鄭仲烜記錄，〈歐思定修士訪問記錄〉，《臺東文獻》，復刊12期（2006.10），頁48-62；歐思定編，《天主教白冷外方傳教會來台傳教五十週年紀念專輯》（臺東：白冷會，2003）。

⑥ 如傅朝卿，〈光線與材質的詩篇—評介台東公東高工舊舍〉，《建築師雜誌》，1期（1996），頁108-113；蔡光明，《公東教堂建築語彙與神學意涵之研究》（臺南：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徐明松、王俊雄，《粗獷與詩意—臺灣戰後第一代建築》（臺北：木馬文化，2008）；于禮本，〈毆洲現代教堂建築在臺灣：以Justus Dahinden的公東高工為例〉，《南藝學報》，2期（2011.6），頁203-229；范毅舜，《公東的教堂：海岸山脈的一頁教育傳奇》（臺北：本事文化，2012）。

⑦ 此處的東亞以日本與臺灣地區為主；雖然費宥諒在韓國也有作品，但數量不多，且確切地點不明；Hans Holenstein, *Bethlehem Mission in Japan 1948-2001* (Immensee: Bethlehem-Mission, 2004), p. 122; Bethlehem Mission Immensee (SMB), Archiv, Num. A 393, 07, v. 6707.〔白冷會總部檔案室，瑞士茵夢湖。檔案編號A393, 07, v. 6707〕

⑧ Fabrizio Brentini, *Karl Freuler. Architektur für die Kirche. Japan 1948-1968* (Baden: Verlag Lars Müller, 1992); Susanna Lehman, "Buchbesprechung," *Werk, Bauen + Wohnen*, 81 (1994), p. 77.

⑨ Beate Löffler, *Fremd und Eigen. Christlicher Sakralbau in Japan seit 1853* (Berlin: Frank & Timme GmbH Verlag, 2011).

⑩ 張志豪，《花東地區天主教教堂建築研究》（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整體分析以Brentini的論述為主要根據，並在費氏臺灣作品的整理上奠定初步基礎。近十年來陸續公諸於世的資料，如傅義修士在2007年離臺返鄉前悉數捐贈臺東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的設計稿、⑪ 2013年的兩個白冷會相關展覽、2014年出版的白冷會在臺歷史圖集，⑫ 以及瑞士白冷會檔案室在2015年7月新發現的一批費氏設計手稿等，都有助於讓費宥諒在臺教堂的樣貌與意義得以日益明晰。

本文立基於上述研究材料，首度呈現費氏在臺灣的教堂設計手稿，⑬ 同時結合費氏自身論述、⑭ 瑞士現代教堂建築發展脈絡，⑮ 與白冷會的宣教報導等史料，進而釐清這些教堂的特色、它們與當代禮儀運動（liturgical movement）的關係、與歐洲現代教堂建築之連結，以及費宥諒在東亞教堂建築上的影響。有鑑於許多教堂多已改建或不復存，在整體造形、材料、顏色、內部格局、裝飾、與周遭環境的關係上，都與原貌不同，因此在分析費氏教堂設計時，並不依循傳統的系統式介紹，而是根據文獻、設計圖與歷史照片中可考部分進行描述分析。上述諸議題的思考將有助於廓清費宥諒的教堂在文化史與藝術史上的明確定位，並為臺灣的歐洲教堂建築相關討論勾勒出一個更寬廣的面向。

一、白冷會的事工與教堂興建

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正值天主教宣教工作在中國快速發展之際；因此，

⑪ 傅義修士在對費宥諒的教堂進行修繕改建時會在圖稿中留下原教堂的紀錄，因此成為費宥諒教堂研究上的重要參考。

⑫ 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所舉辦的《以愛，為一生的腳印—白冷會在臺東六十年寫真記事展》暨吳若石神父晉鐸四十五週年寫真記事展、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與國立臺東大學美術產業系合辦展：《台東天主教白冷會現代教堂數位展--尋找東海岸那一串最美麗的珍珠》；趙川明編，《後山傳愛：白冷會臺東60年的影像故事》（臺東：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2013）。

⑬ 2015年7月獲瑞士白冷會檔案室Elisabeth Vetter女士來函告知，因檔案室搬遷整修而發現若干費宥諒的資料。因目前檔案室搬遷尚未結束，是以本文所列費氏教堂數量或許還有缺漏。SMB Archiv, Num. A 393, 07, v. 6707；趙川明，《後山傳愛》，頁170-191。

⑭ 主要根據為十逾篇費宥諒所撰寫的文章、訪談、自傳，以及他的剪貼簿圖文資料等。

⑮ 除了瑞士教堂建築史專論之外，1930－1970年代瑞士宗教藝術與建築藝術類期刊是主要憑據。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成立於1921年的瑞士白冷會也在1924年來到中國，並在1926年成立齊齊哈爾教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白冷會加派人員前往中國，期待能開始新一階段的宣教工作。然而，自1945年開始，西方傳教士卻迫於中共的驅趕而陸續撤往鄰近其他國家。原本擔任瀋陽總主教區主教代理人的費聲遠神父（Andrew J. Verineux，1897－1983）也在此趨勢下於1951年來到臺灣，並催生了花蓮監牧區在1952年的成立。⑯ 費神父擔任代理監牧後，便開始尋求不同修會的協助，以建設在人力與資源上皆貧瘠的花東地區；此舉獲得白冷會熱誠的歡迎，「白冷會和其他許多別的傳教修會，過去在中國大陸都有傳教事業，白冷會神父很願意到臺灣，一方面為在中國留一立足之地，另一方面為安置他們被逐出的會士。」⑰ 隨著錫質平神父（Jakob Hilber，1917－1985）在1953年10月的抵臺，正式揭開了白冷會在臺事工的序幕。⑱ 白冷會在有限的人手與經費下，在六年內（1954－1960）便已在71個村落興建了教堂、小禮拜堂、或道理廳，先後共建有百逾座教堂。⑲ 教堂的建立不但是宣教與融入當地生活的開始，亦是滿足教友與吸引村民的有效手法：「一座教堂的出現，不但能滿足村內教友們的熱心，更能增加他們的面子，並且對那些態度冷淡，仍在觀望的村民是一種激勵。」⑳

白冷會的教堂興建集中在1953－1960年間。許多1950年代初期搭建的臨時性教堂為茅草屋，或竹造茅頂、磚造瓦頂與木造瓦頂等形式，與當地民宅並無太大區別。稻草與竹子是潮濕氣候下最受青睞的建材，即便只能維持幾年，但低廉的價格使之成為划算的選擇。㉑ 1961－1967年間，教區經營逐漸穩定，初期的木構磚造教堂逐漸被汰換為持久、能防震抗颱的鋼筋混凝土建築；而費宥

⑯ 1963年正式升格為花蓮教區。

⑰ 費聲遠，《回憶錄》，頁70-71。

⑱ 鄭仲烜，〈傳教會與區域發展—以臺東白冷會為例〉，頁55-61。

⑲ Ambros Rust, *Die Bethlehem Missionare Immensee*, pp. 193-194, 198；鄭仲烜，〈傳教會與區域發展—以臺東白冷會為例〉，頁64；黃連生編，《白冷會在中國傳教史料》，頁33-40。

⑳ 費聲遠，《回憶錄》，頁94。

㉑ 初期茅屋教堂圖片可參見趙川明，《後山傳愛》，頁160, 217, 300；張志豪，《花東地區天主教教堂建築研究》，頁4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諒的教堂便落在前兩個時期（1953－1968）。在費宥諒於1968年返回瑞士時，花東地區也面臨了人口外移與教友流失的現像；1968年之後的教堂工程多屬修整或重建，主要由傅義修士負責。㉒ 隨著第二次梵諦岡大公會議（The Second Vatican Council, 1962－1965；簡稱梵二公會）後本土化意識的興起，許多天主堂的裝飾自1980年代起都帶有濃厚的原住民藝術色彩，白冷會教堂的樣貌開始進入另一階段。㉓

二、費宥諒的設計理念

（一）費宥諒的學成經歷

1912年出生於瑞士巴塞爾城（Basel）的費宥諒（圖1）在中學時期便因進入著名的蘇特與布爾克哈特建築事務所（Büro Suter und Burckhardt）學習製圖而與建築藝術結緣。爾後，即便他獻身神職，並在1942年晉鐸為白冷會神父，卻仍在1942－1944年間進入蘇黎世理工學院（ETH）建築系修課，成為若干瑞士現代建築重要推手的學生。㉔ 其中，比爾希勒（Linus Birchler，1893－1967）的藝術史課程對他啟發最大，舉凡觀察訓練、設計能力、文化精神的剖析，以及對美好、真誠、永恆事物的品味等，都讓他受益匪淺。㉕ 費宥諒在1944年轉往弗瑞堡（Fribourg）大學修習中文、牧靈神學與藝術史，開始為前往中國宣教做準備。1946年初，他前往中國，支援母會在齊齊哈爾的宣教工作。可惜好景不

㉒ Ambros Rust, *Die Bethlehem Missionare Immensee*, p. 193；張志豪，《花東地區天主教教堂建築研究》，頁31-51。

㉓ 趙川明，《後山傳愛》，頁303。

㉔ 費宥諒在ETH的老師有Friedrich Hess（1887－1962）、William Dunkel（1893－1980）、Hans Hoffmann（1897－1957），與藝術史學家Linus Birchler（1893－1967）等。

㉕ Karl Freuler, *Persoenliche Gedanken, anlässlich meines 80. Geburtstages am 5. Dezember 1992 und der Herausgabe des Buches über meine Tätigkeit als Architekt im Fernen Osten. [Beilage zur Monographie von 1992]* (Bethlehem Mission Immensee Archiv, A393. 06a), p. 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常，費宥諒在1948年便因共黨的驅趕而被迫離開中國，輾轉逃至日本。㉖ 初到日本的他便先落腳白冷會於1949年新成立的仙台教區，協助設計會院與教堂；很快的，其他修會聞風而來，紛紛委請他設計教堂、修院與宿舍。於是，費宥諒在瑞士白冷會總會的建議下駐留東京，以建築師身份為西方天主教組織服務。㉗ 僅僅三年（1949－1952），他在日本便已完成三十多座教堂等設計；㉘ 1953年時，更成為當地外籍神父口中「來自瑞士的著名神父建築師」。㉙ 1950年代到1960年代初是費宥諒教堂設計量的巔峰期，但眼見日本與臺灣的教堂興建潮自1960年代中葉開始消退，㉚ 費宥諒決定重新定位自身貢獻所在。他在1968年底返回瑞士，先後在巴塞爾與馬格登城（Magdem）任職副本堂（Vikar），並在1982年退休回到巴塞爾；最後，於2000年因病過世，享年88歲。㉛

（二）德國與瑞士的現代教堂建築發展

費宥諒的教堂設計與歐洲現代教堂建築發展關係密切。回溯過往，19世紀的歐洲天主教教會普遍面臨了現代思潮、工業發展，與民眾疏離信仰等挑戰。但同時，此困境也催生了天主教教會的復興運動；其中，又以德國本篤會在19世紀中葉發起的禮儀改革運動對宗教建築與藝術的影響最為深遠。此運動旨在復興民眾對信仰的內化、加強對教會的認同與教會奧體共融的自覺，因此強調崇拜禮儀須以基督為核心，而崇拜空間要能表現信仰精神與促進信眾對禮儀的

㉖ Fabrizio Brentini, *Karl Freuler*, pp. 125, 127; 薛弘道，《白冷外方傳教會在華人區域》，頁47。

㉗ Hans Holenstein, *Bethlehem Mission in Japan*, pp. 28, 31, 32.

㉘ 根據費宥諒的手寫作品清單；Karl Freuler, *Werklist*, Bethlehem Mission Immensee Archiv, Num. A 393, 07, v. 6707.

㉙ “*noted priest-architect from Switzerland*”; Hans Holenstein, *Bethlehem Mission in Japan*, p. 60.

㉚ Hans Holenstein, *Bethlehem Mission in Japan*, pp. 115-117, 151, 370; Fabrizio Brentini, *Karl Freuler*, pp. 11, 125, 127; Beate Löffler, *Fremd und Eigen*, p. 212.

㉛ Hans Holenstein, *Bethlehem Mission in Japan*, pp. 178, 37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參與。㉜

思變的湧動也一樣出現在教堂建築領域。德國教堂建築的歷史風格與折衷主義在19世紀末開始受到撻伐，複雜的空間配置與滿佈的裝飾圖像被視為阻礙信眾專注崇拜的罪魁禍首。㉝ 德國現代教堂建築的萌芽歸功於幾位與禮儀改革運動關係密切的開路先鋒，如新教（protestant）建築師奧圖・巴特寧（Otto Bartning，1883－1959）、天主教建築師多米尼庫斯・波姆（Dominikus Böhm，1880－1955）與魯道夫・舒瓦茲（Rudolf Schwarz，1997－1961），以及神父范艾肯（Johannes van Acken，1879－1937）等。他們不再從風格角度出發，而是從信仰本質、禮儀表現，與禮儀空間為出發點，對教堂的傳統平面與空間格局進行省思。這樣的理論與實踐成為歐洲現代教堂建築的基石。例如，巴特寧提出，教堂建築的「神聖性」並非建立在其風格形式上，而是在整體會眾的聚集、祈禱、與紀念耶穌受難的聖祭禮上。他在1922年發展出聖壇位於中央的16角向心式星狀教堂，之後對他1928年參加科隆（Köln）Pressa展的鋼筋混凝土長軸式教堂給予了象徵性的詮釋：「一如禮儀司鐸展開的雙臂，此一空間也如放射線般的展開；一如朝向聖事聚集的會眾，此一空間也在聖壇區完結圓滿……。這種空間形式與動感要促進、並表現出朝向聖事聚集行動與提升的信眾共同體。」㉞ 類似的思考也見於神父范艾肯所提出的「基督中心論」（Christocentrism）教堂設計理念：教堂建築的形式應以禮儀為基礎，而代表基督奧秘的聖壇與彰顯基督救贖的聖祭禮應作為教堂建築的終極目的。無論是聖壇的位置、形式、與會眾的距離、其周遭儀式空間的考量等，都應凸顯「獻祭」的特質，並清楚傳達會眾與司鐸共同參與聖祭禮的意義，同時加強會眾對

㉜ Fabrizio Brentini, *Bauen für die Kirche. Katholischer Kirchenbau des 20. Jahrhunderts in der Schweiz* (Luzern: Edition SSL, 1994), p. 4.

㉝ Hugo Schnell, *Der Kirchenbau des 20. Jahrhunderts in Deutschland* (München: Schnell & Steiner, 1973), pp. 7-21, 41.

㉞ "*Gleich den ausgebreiteten Armen des Liturgen breitet der Raum sich strahlenförmig aus, und gleich der zum Sakrament sich sammelnden Gemeinde schliess und rundet sich der Raum um den Altar…. Diese Form, diese Bewegung des Raumes will eine handelnd sich verbindende, zum Sakrament sich sammelnde und erhöhende Gottesdienst-Gemeinschaft herstellen und darstellen.*"; 引自Fabrizio Brentini, *Bauen für die Kirche*, p. 5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禮儀的參與度。對上述訴求的具體實踐方式可以是聖壇空間的拓寬、拉近聖壇與會眾區的距離、避免遮擋視線的柱子等。㉟ 與范艾肯關係友好的波姆是位創新性極高、作品數量驚人的建築師；他自1920年代起根據基督中心論所設計的向心式與長軸式平面、摺狀牆面、拔地而起直達屋頂的哥德意像尖拱結構、聖壇區的玻璃牆，與華蓋結構等母題，都成為其他建築師的效仿對象。㊱ 另一位在重要性上與波姆並駕齊驅、且在瑞士更具影響力的則是舒瓦茲。舒瓦茲在1938年撰寫的《論教堂建築》（*Vom Bau der Kirche*）將教堂與身處其內的禮儀團體視為呈現基督奧體的有機意象，並根據此一「軀體」概念歸納出六種因應不同強調重點的教堂基本類型。例如，在「神聖的環繞」（Heiliger Ring）類型中，以聖壇為中心的橫向橢圓、正方，與半圓等向心式平面可讓信眾圍繞聖壇，強調出參與禮儀者彼此間的「團契、共融」，表達了信眾是教會肢體的意象。在這樣的空間中，司鐸要面向信眾，透過展開雙臂的手勢將會眾納入一個完結的圈子。而在「神聖的啟程」（Heiliger Aufbruch）類型中，T字平面象徵了信眾從三個方向朝著中央聖壇而來，烘托出禮儀崇拜所象徵的朝聖旅途。最常見的類型則是「神聖之旅」（Heilige Fahrt），它是聖壇走向式（矩形）長軸教堂（或稱「道途教堂」；Wegkirche），大門與聖壇位於教堂空間兩端，中間是彼此相連結的信眾，包括司鐸與輔祭在內的所有人一致望向聖壇與其後方象徵永恆彼界的白牆，傳達出作為朝聖者的信徒旅經世界過站，走向天家之意象。㊲ 在此空間裡，代表基督受難與救贖的聖壇則有如走向神的「門檻」，聖壇前方的信眾好比身處俗世人間，須通過聖壇（基督）這道關卡才能進入聖壇後方上主所在的超凡彼界。毫無裝飾的教堂大廳有如一個純白容器，唯獨參與禮儀的

㉟ Johannes van Acken, *Christozentrische Kirchenkunst. Ein Entwurf zum liturgischen Gesamtkunstwerk* (Gladbeck: Verlag A. Theben, 1923), pp. 49-50; 引自Herbert Muck, "Liturgische Anliegen und Religiöse Werte in den Raumordnungen von D. Böhm," in August Hoff et al. eds., *Dominikus Böhm* (München: Schnell & Schnell, 1962), p. 36.

㊱ 有關波姆的教堂設計特色可參見August Hoff et al., *Dominikus Böhm* (München: Schnell & Schnell, 1962)；于禮本，〈德國現代教堂建築在臺灣：哥特佛瑞德・波姆（Gottfried Böhm）的菁寮聖十字堂與學甲天主堂〉，《南藝學報》，8期（2014.6），頁83-125。

㊲ 礙於篇幅，在此只對最常見的三種類型加以解釋。舒瓦茲的這些類型是一種思維的發想，而非具體建築結構形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信眾讓教堂空間有了生命。㊳

1920－1930年代是德國現代教堂建築發展尤其蓬勃的時期，教堂設計在外形、結構與建材上，無疑受到現代建築的啟發；但在空間格局上，則傾向以禮儀功能與其神聖性的凸顯為主要考量。㊴ 即便這樣的發展因著1933年納粹政權上台而漸緩，但德國現代教堂建築的根基已然紮穩。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德國現代教堂建築延續了1930年代以來的設計原則、平面與立面形式；但自1950年代起，禮儀改革理念的普遍被認可，與經濟的復甦則促成新的空間形式與造形的出現，圓形、橢圓與方形等向心式平面日益常見，矩形教堂則因著禮儀需求上的附加空間而擁有變化多元、較鬆散、不對稱、不規則的平面。在1960年代梵二公會閉幕後，禮儀改革的訴求成為教堂建築的基本綱要，而教堂造形則更為多元，建築師的個人色彩也越加明顯。㊵

德國的禮儀改革運動與現代教堂建築發展為鄰國瑞士樹立了重要範例。瑞士的天主教復興運動同樣始於19世紀，但禮儀改革運動在瑞士德語區僅零星被提及，在法語區則全無蹤跡。直到1924年巴塞爾城的天主教大會（Katholikentag），禮儀改革才被明訂為核心訴求；配合此大會所舉行的現代基督教藝術大展也催生了以促進現代教堂建築與藝術為目標的全國性組織「聖路加協會」（Societas Sancti Lucae）。協會的發起人之一便是費宥諒的老師比爾希勒，而許多瑞士現代教堂建築的代表人物也都是會員，如Hermann Baur（1894－1980）、Otto Dreyer（1897－1972），與Fritz Metzger（1898－1973）等。㊶ 以德語區藝術家為主的聖路加協會開始針對德國的禮儀改革運動與現代教堂建築進

㊳ Rudolf Schwarz, *Vom Bau der Kirche* (Würzburg: Werkbund-Verlag, 1938); Rudolf Schwarz, "Liturgie und Kirchenbau," *Baukunst und Werkform*, 8.2 (1955), pp. 87-93.

㊴ 1920年代末的現代教堂建築仍處摸索階段，對非宗教性現代建築的態度並不一致，有的人極欲與之劃清界線，其他人卻認為現代建築中的反樸歸真與突顯材質特色（*Materialwahrheit*）提供了新的啟發。Ralf van Bühren, *Kunst und Kirche im 20. Jahrhundert. Die Rezeption des Zweiten Vatikanischen Konzils* (Paderborn: Ferdinand Schöningh, 2008), pp. 105-107, 120-123, 207.

㊵ Hugo Schnell, *Der Kirchenbau des 20. Jahrhunderts in Deutschland*, pp. 37-51, 87-94, 201-202.

㊶ Fabrizio Brentini, *Bauen für die Kirche*, pp. 1-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行密集討論，並致力媒合傾向現代主義的神職人員、藝術家、建築師與贊助者彼此間的合作。此協會更透過發行年刊*Ars sacra*（《聖藝》）與專書、舉辦展覽、競圖與研討會等，來介紹現代教堂設計佳例，是瑞士禮儀改革運動、現代教堂建築與宗教藝術最重要的發聲組織與推動力。㊷

瑞士的現代教堂建築能在1920年代末開始起步，除了禮儀改革運動的推波助瀾，另一關鍵則是現代建築的發展。受到德國1907年成立的「德意志工藝聯盟」（Deutsche Werkbund）影響，瑞士工藝聯盟（Der Schweizerische Werkbund）也在1913年成立，開始鼓吹「新建築」（“Neues Bauen”）。此時的「新建築」被視為「新客觀主義」（Neue Sachlichkeit）的同義詞，具有類似包浩斯（Bauhaus）脈絡下的意義；廣義上，泛指建築界自1920年代起尋求脫離學院傳統與歷史風格的態度，轉而追求以結構為重、合乎功能需求、去除裝飾的理性設計。教會圈與建築界對「新建築」的態度則明顯分歧。一方面，Karl Moser（1860－1936）在巴塞爾城的聖安東教堂（St. Antonius, Basel, 1927）被讚譽為「新客觀主義」教堂首例，其學生如Baur與Metzger的教堂設計也與「新建築」趨勢與時俱進，且他們參與的雜誌*Das Werk*（《建築》）也成為瑞士現代教堂設計的討論交流平台。㊸ 另一方面，自19世紀以來流行的歷史主義與折衷主義風格教堂仍持續流行，與新興的現代風格教堂並存；㊹ 甚至主教Ambühl便曾以教會法CIC1164（Codex Iuris Canonici）駁斥1936年巴塞爾城Don Bosco教堂競圖中帶有現代建築特色的前三名設計：

> 教會雖未規定特定的風格，也認可教堂建築應符合時代需求，但公告中卻禁止、且主教也從未准許那種看不出是上主居所的教堂形式、那種刻意接

㊷ 西部法語區的宗教藝術復興組織為1917年成立的「聖路加與聖莫里斯協會」（Saint-Luc et Saint-Maurice）；此組織提倡一種活潑、巴洛克化的教堂建築，這也造成了聖路加協會中法語區與德語區藝術家之間的衝突，法語區藝術家至1945年便完全脫離聖路加協會。Fabrizio Brentini, *Bauen für die Kirche*, pp. 4-8.

㊸ 雜誌*Das Werk*（《建築》）是1908年成立的瑞士建築師協會（Bund Schweizer Architekten簡稱BSA）與1913年成立的瑞士工藝聯盟（Schweizerischer Werkbund）在1914年所共同創刊，雜誌發起者之一便是Hermann Baur，他在1948－1958年擔任編輯委員召集人。

㊹ Fabrizio Brentini, *Bauen für die Kirche*, pp. 8-9, 15, 51-5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近世俗性建築且令人無法區分兩者差異的形式、那種大膽到在人們眼中只會引起反感的陌生形式。公告中要求的是那種能一眼就被辨識出是天主教教堂的建築形式……。㊺

這種對教堂建築改革看法的分歧也見於瑞士西部法語區及東部德語區。對法語區建築師而言，禮儀共同體只是表現對神頌讚的一部分，禮儀改革的訴求不足以成為設計上的主導考量；相形之下，更重要的是充滿象徵、宏偉大氣的教堂建築；也因此，從而追求現代形式、歷史主義，或地域性風格的結合可能。㊻ 然而，對德語區建築師而言，崇拜的意義在於讓每位禮儀參與者在信仰共同體的自覺中深刻地感受神的同在；因此，教堂建築應縮減為提供禮儀進行的一個軀殼。在瑞士德語區，聖壇走向的長軸空間形式是主導類型，㊼ 這樣的發展與舒瓦茲的影響不無關係。他的文章不但自1920年代起便陸續刊登在*Das Werk*雜誌上，㊽ 其設計如阿亨城的聖體教堂（Fronleichnamskirche, Aachen, 1928/30）也徹底實踐了「新建築」的原則：表裡如一地刪除所有建築裝飾、高

㊺ "*Was aber durch den angeführten Canon verboten erscheint, was darum der Bischof nie zugeben kann, sind Kirchenbauten in solchen Formen, denen man das Gotteshaus kaum mehr ansieht, Kirchenformen, die sich absichtlich den Profanbauten so angleichen, dass sie von denselben nicht mehr zu unterscheiden sind. Kirchenformen, die so gewagt erscheinen, dass sie in unserem als Fremdkörper nur abstossend wirken können. Was jener Canon verlangt, sind Bauformen, aus denen das katholische Gotteshaus auf den ersten Blick als solches erkennbar ist*…."; Quellen Archiv Ordinariat Solothurm, undatierter Brief von Bischof Ambühl; 引自Fabrizio Brentini, *Bauen für die Kirche*, p. 86.

㊻ Fabrizio Brentini, *Bauen für die Kirche*, pp. 16-32.

㊼ Fabrizio Brentini, *Bauen für die Kirche*, pp. 32-47.

㊽ 例如Carl Albrecht Bernoulli, "Philosophische Bemühmungen: Rudolf Schwarz: Wegweisung der Technik," *Das Werk*, 15.12 (1928), pp. 392-394; Rudolf Schwarz, "Der neue Kirchenbau," *Das Werk*, 36.4 (1949), pp. 107-109, 114; "Zwei Kirchen von Prof. Rudolf Schwarz," *Das Werk*, 44.6 (1957), pp. 193-194等。相對之下，波姆的作品則從未在Das Werk被介紹。有關舒瓦茲對瑞士現代教堂的影響可參閱Fabrizio Brentini, "Rudolf Schwarz und sein Einfluss auf die Kirchenarchitektur in der Schweiz," *Rudolf Schwarz (1897–1961). Werk, Theorie, Rezeption*, ed. Conrad Lienhardt (Regensburg: Schnell & Steiner, 1997), pp. 58-7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聳的牆面上僅留嚴謹的格狀窗戶；一個極不顯眼的低矮側廊成全了主要禮儀空間的明確與完整；深色的地板與聖壇對照白色空曠的牆面，象徵了黑色的地面（世俗/世界）與光明的天上。許多瑞士建築師如Baur與Metzger等，都受到聖體教堂的啟發。㊾

禮儀改革運動、基督中心論的教堂建築原則，以及舒瓦茲的理論在瑞士德語區的發酵可從1930年琉森城（Luzern）的St. Karl教堂競圖看出。㊿ 第一輪入選的Josef Schütz（1898－1966）、Dreyer與Metzger都不約而同地採用類似的手法回應禮儀改革訴求：如聖壇導向的長軸空間、被弱化的附加空間（如低矮無窗的側廊）、連貫中廊與聖壇區的天花板以加強兩者的融合、讓柱樑框架結構帶出空間韻律並導向聖壇、圈圍聖壇與信眾的柱列以暗示團體凝聚、高聳封閉的牆面以隔絕外界紛擾。(51) St. Karl教堂最後根據Metzger的設計建蓋（圖2），不僅表現出瑞士「新建築」嚴謹簡明的建築語彙，還成為首次明確回應禮儀改革的瑞士現代教堂。(52) 自St. Karl教堂之後，傳統的巴西力卡類型、三廊有著統一高度的廳式類型（Hallenkirche），以及捨棄側廊元素的單廳類型（Einraumtypus）等，都成為常見的教堂空間形式。其中，側廊常縮減為有如壁龕般的低矮空間，讓教堂因著高聳寬大、且連貫到聖壇區的中廊而看似一個單廳空間；細長的柱子與橫樑營造出優雅的跨度序列感，或者屋頂的水泥樑桁烘托出空間的中軸線，而帶有肋條的木頭天花板自成一種低調的裝飾。前院、門廊、低矮的入口、明亮的聖壇等，都是常見的配置；建築師Karl Higi（1920－2008）曾如此解釋這些空間配置的意義：前院提供了進入教堂前整理心情的空間，開放式的門廊則要喚起信徒走向聖壇的欲望；而在此行進過程中必先經過的低矮昏暗大門則象徵將一切世俗摒棄在外，最後則前往高而明亮的聖壇區。此般種種皆代表

㊾ Schweizer St. Lukasgesellschaft ed., *Kirchenbauten von Hermann Baur und Fritz Metzger* (Würzburg: Echter Verlag, 1956), p. 16; Fabrizio Brentini, *Bauen für die Kirche*, pp. 54-55.

㊿ 1930年與1931年的競圖可參見Fabrizio Brentini, *Bauen für die Kirche*, pp. 70-72.

(51) Fabrizio Brentini, *Bauen für die Kirche*, pp. 65-73.

(52) Karl Moser的St. Antonius教堂雖被視為瑞士現代教堂的範例，但禮儀的考量尚未成為設計上的重點，而是將用於工程結構上的材料運用在教堂建築上的一個去裝飾化歷史風格建築。Fabrizio Brentini, *Bauen für die Kirche*, pp. 59-62, 74-7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了生命轉變過程中的不同階段，也就是從現世邁向彼界的旅途。而從聖壇後方引入的光線，以及顯得沉靜的側牆，也都讓整體空間散發出安靜的氛圍，好在敬畏中指向聖壇。[53] 符合禮儀需求的教堂設計在瑞士雖要到1940年代才獲得普遍迴響，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下，瑞士反而成為歐洲現代教堂建築唯一能持續發展而無中斷的地方，進而擁有在歐洲現代教堂建築發展上不可動搖的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瑞士的新建教堂仍多以1930年代的現代教堂形式為依歸；但自1950年代起，教堂外觀開始透過外露的混凝土框架、填充其中的磚材，與木質屋頂等不同材質的搭配，來增加建築形式的活潑。時至1960年代，教堂形式的發展類似德國，趨向多元化與設計者個人色彩的表現。[54]

（三）費宥諒與東京1954年的瑞士現代教堂攝影展

從費宥諒的學習與成長來看，瑞士現代教堂的發展無疑為他的設計提供了滋養沃土。即便身在亞洲，他對歐洲教堂藝術的關注從未間斷，這從他旅日期間所彙整的剪貼簿中便可看出。[55] 這些資料以現代宗教藝術為主，其中又以教堂建築的圖片與文章最多，舉凡德國、法國、瑞士與美國的作品都在其列，而德國與瑞士的數量居冠，當然Baur作品的相關討論也包括在內。這都說明了費宥諒對歐洲教堂建築近況的掌握，以及他從中擷取參考的意圖。

費宥諒對禮儀改革運動與瑞士德語區現代教堂建築的肯定清楚地流露在1954年他以日本天主教藝術委員會（Die katholische Kunstkommission）主任身份[56] 在東京所策劃的瑞士現代教堂建築攝影展中（以下簡稱東京攝影展）。此展覽的協辦單位是瑞士的聖路加協會，而展覽中所選的近百張作品主要集中在

---

[53] Karl Higi對St. Anton church (Wettingen, 1953/54)的說明。Fabrizio Brentini, *Bauen für die Kirche*, pp. 110-111.

[54] Fabrizio Brentini, *Bauen für die Kirche*, pp. 111-115.

[55] Bethlehem Mission Immensee, Archiv, E030.2〔白冷會總部檔案室，瑞士茵夢湖。檔案編號 E030.2〕，（2013年9月1-4日造訪）。

[56] 他自1953年起任職。Martin Baumann, “Bericht aus Morioka,” *Echo S.M.B*, 16.7 (1952), pp. 6-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瑞士德語區最具代表性的四位建築師身上：Otto Dreyer、Hermann Baur、Fritz Metzger，與Josef Schütz。[57] 費宥諒的開幕演講展現出自身教堂設計理念與瑞士現代教堂建築發展的契合；他強調教堂建築之目的是建立在禮儀的基礎上，而禮儀運動的核心訴求有三：首先是回歸本質，也就是強調聖祭禮是信仰的核心；其次是在沉靜理性中體驗聖事的意義；最後，彌撒與聖祭禮是屬於信眾共同體的。瑞士現代教堂建築的典範性便在於三個關鍵：清楚的結構邏輯、符合時代需求的藝術表現，以及順應禮儀需求。[58]

> 這個革新而有活力的〔禮儀〕精神成為教堂設計的新法則，這點可在此次展覽中清楚看出。教堂是為信眾進行聖祭禮所設計的空間。它圍繞著抬高的聖壇，信眾的眼和心得以專注在獻祭處與祭桌上。聖壇主導著空間；聖事的進行、福音的傳講……等都臣服於它之下。如果副壇、告解室、苦路必須在教堂內，則應被安置在其他空間，避免造成信眾分心或干擾禮拜。理想的解決方式是一個與教堂隔離的附加小禮拜堂（以取代多個空間），既可存放聖體〔聖餐〕，也方便告解者的出入。這樣的小禮拜堂……可做為週間彌撒或小群信徒舉行特殊禮拜的空間。……洗禮池是一個常被忽略的對象。一個鄰近教堂入口的莊嚴空間足以表現出此聖事的重要意義。……我在吉祥寺市〔Kichijoji〕與鎌倉市〔Kamakura〕的新教堂……就是實踐上述理念的嘗試。
>
> 當你們觀看展覽中的不同照片時，會注意到聖壇區的寬敞、聖壇的高雅裝飾、非戲劇性的巧妙而冷靜的光影設計、材質的選擇，以及這些藝術家作品中的宗教真誠。當然，考慮到在日本的情形，我並不鼓吹一味地去模仿這些〔瑞士〕教堂。這個國家的氣候、經濟，與宣教狀況都與之不同。……神父van Straelen最近發表了一篇有關日本建築文化涵化〔accommodation〕的文章，提出了若干教堂設計上的建議。這位作者似乎認為我們〔在日本〕的教堂不應顯得宏偉，而應低矮昏暗一如佛教廟宇。然而，我們應切記不可從傑出的佛教與神道〔Shintoism〕建築中擷取教堂

[57] 此展覽的選件清單列於附錄一。Karl Freuler, *Vortrag für die Bishöfe und Superioren in Japan, als Einführung in die Ausstellung des SSL, 30.IV.1954*; Ausstellung in Tokyo. Dossier PA 378 / 163, Staatsarchiv Luzern〔東京展覽，琉森國家檔案室，卷宗編號PA 378 / 163〕

[58] 費宥諒的演講內容參見附錄二。Karl Freuler, *Vortrag für die Bishöfe und Superioren in Japa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設計的法則。若從禮儀的角度來思考，則恰恰會得出相反的結論：「以喜悅之心敬拜神，人對我說，我們往耶和華的殿去，我就歡喜。〔詩篇122,1〕」神的偉大、我們作為祂兒女的尊嚴、與古老禮儀之美，都需要一個喜悅、光明與宏偉的空間，就如這些瑞士教堂具體所現。這些寬大的空間是設計來讓禮儀與我們的信仰生活相結合，並讓我們得以活在這些聖事所給予的珍寶中。㊾

（四）比爾希勒與亞瑟神父的影響

除了高度認同瑞士的現代教堂建築，費宥諒的神職身份與亞洲宣教使命使其設計思維中還多了歐洲建築師所沒有的內涵。其恩師比爾希勒與好友瑞士本篤會神父席德布蘭登・亞瑟（Hildebrand Yaiser，1901－1983）無疑是他在設計理念發展上的堅強後盾。前者作為瑞士極具權威的建築史學者與現代教堂建築的先鋒人物，為他搭起與歐洲宗教藝術維持通暢對話的橋樑，並給予設計上的諮詢。後者則是他在亞洲宣教工作上的戰友與禮儀學的交流對象。例如，比爾希勒便曾對費宥諒1952年在橫濱大和市南林間的聖彌迦勒教堂（St. Michael, Minami-Rinkan, 1952）㊿提出質疑，並敦促費宥諒的兄長轉告：

> 請寫信告訴他，我認為這種從地表拔高的尖拱（南林間）是危險的形式，它們有著太明顯的多米尼庫斯・波姆〔Dominikus Böhm〕標誌。除此之外，我覺得其他部分的設計相當巧妙，且真正符合教堂真義。費神父走在一個好的道路上，包括面對當地藝術的態度。(61)

㊾ 原文內容請參閱附錄二。Karl Freuler, *Vortrag für die Bishöfe und Superioren in Japan*.

㊿ 此教堂的圖片可參見：〈カトリック大和教会〉,《株式会社親建会工務所》2014年7月，<http://www.shinkenkai.jp/wordpress/wp-content/uploads/2014/07/yamato_3.jpg>（2014年12月8日檢索）

(61) "*Schreiben Sie ihm auch, daß ich die direct auf den Boden gesetzten Spitzbogen (Minami-Rinkan) für gefärlich halte; sie stehen zu sehr im Zeichen von Dominikus Böhm. Sonst aber finde ich alles sehr klug und wirklich kirchlich. P. Karl geht einen guten Weg, auch gegenüber der einheimischen Kunst*." BMI-Archiv A 330, 06; 引自Beate Löffler, *Fremd und Eigen*, p. 21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此處指的是波姆創自1920年代的尖拱框架教堂，[62] 它普遍被認為帶有濃厚的表現主義色彩，以及將歷史主義風格轉化為現代風格的企圖。這或許正是比爾希勒認為此形式不符當下現代理性精神、也不適用於異國宣教地的原因。費宥諒這位摯友的提醒似乎起了作用，這種形式的教堂在日本僅曇花一現，且從未出現在臺灣。比爾希勒進而在1953年《巴塞爾大眾報》（"Basler Volksblatt"）批評當下亞洲教堂建築亂象，並推舉費宥諒的作品：

> 今日正在重建中的日本崇拜著真假混雜的現代主義，同時也對真誠的教堂建築抱持開放態度，可惜天主教圈在面臨日本傑出建築傳統的挑戰時，卻迷失在貧瘠無果的歷史主義中。……這種不具內在生命的形式有如低劣的博物館陳列品，對天主教在日本知識份子中的名聲當然毫無助益。教堂建築的問題是如何愚蠢天真地被看待，可從下例清楚看出：一位高階神職人員拜訪了我們的建築師〔費宥諒〕，並在對整座教堂毫無任何構思的情形下出示了他為新教堂所設計的一系列門面〔façade〕。這位業主顯然被糟糕的諮詢所誤導，竟然欲從門面開始進行他的教堂設計。而就在去年，東京興建了一座「純文藝復興」風格的教堂，幾百米之外則同時興建了一座令人讚嘆的混凝土佛寺，有著傑出的藝術表現與大膽的結構設計，顯得活潑生動……。費宥諒能明確洞察時代所需。他的造形語彙既遠離了過度堆砌的歷史主義，亦非矯作的個人主義與冒進實驗。……這位瑞士宣教建築師已具有穩定的風格，且不淪於強制性的主觀主義。[63]

比爾希勒的這番評論一方面流露出他對費宥諒教堂設計的關注，另一方面間接佐證了兩人常有著交流討論；因為就在費宥諒的剪貼簿中，貼有一張剪自日本時報（Nippon Times）的東京-駒込（Komagome-Tokyo）混凝土佛寺圖片，上面標註的日期為1953年1月，[64] 顯然就是比爾希勒文中所指混凝土佛寺。

---

[62] 例如他設計的St. Apollinaris教堂（Frielingsdorf, Bergischen Land, 1926/27）。

[63] 原文請參見附錄三；Linus Birchler, "Ein Schweizer Kirchenarchitekt in Japan," *Basler Volksblatt*, 6.3.1953; 此篇文章同時刊登在當天的《新蘇黎世新聞報》（Neue Züricher Nachrichten 6.3.1953）；Hans Holenstein, *Bethlehem Mission in Japan*, p. 60.

[64] Bethlehem Mission Immensee, Archiv, E030.2〔白冷會總部檔案室，瑞士茵夢湖。檔案編號 E030.2〕,（2013年9月1-4日造訪）。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另一位影響費宥諒的是駐日的瑞士本篤會亞瑟神父。亞瑟神父以研究宗教禮儀（公教典禮）著名，曾在1956年帶領費宥諒與其他駐日神職人員參加義大利阿西西（Assisi）的禮儀大會（Liturgischer Kongress），並在1957年為日本的白冷會主持禮儀改革與現代牧靈議題講座。[65] 亞瑟神父對亞洲的教堂設計也提出了具體建議。他認為，哥德或仿羅馬等歷史風格常被亞洲民眾視為「天主教標準風格」，就好像「天主教」只是某種舊有風格的重複而已，且在經費不足時，往往造成「天主教」等同於「平庸品質」的印象。反之，宗教禮儀並不拘泥於任何風格、國家與時代，它是永久的；因此，只要以禮儀為原則，就無需擔心去嘗試新的形式。而在尚無基督教藝術傳統的國家，如日本，教堂設計就更應該以宗教禮儀為基礎，而非某種西方歷史風格。此外，宗教禮儀在這些國家尤其要臣服於宣教目的；因此，特定空間的強調與安排當取決於宣教需求。例如，成人洗禮在異教信仰傳統深遠的亞洲國家有著極強烈的公眾昭告性，其意義並不同於歐洲的常態性洗禮。因此，在亞洲教堂中，洗禮空間應儘量寬敞，好令人印象深刻。[66]

比爾希勒與亞瑟神父堅定了費宥諒走在擺脫歷史主義、採納現代主義建築菁華、遵循禮儀精神，並在其設計中納入文化涵化與福傳教育等考量的道路上。無怪乎雜誌*Liturgical Arts*（《禮儀藝術》）編輯Maurice Lavanoux（1894－1974）在1953年已盛讚費宥諒的設計是異國宣教地教堂建築的典範。[67]

（五）禮儀精神、福傳教育，與文化涵化

低調淡泊的費宥諒在建築界一直沒沒無聞，但他卻因宣教使命與教育關懷而在許多宗教藝術雜誌上勇於發聲。這些論述除了清楚展現其設計理念與當代瑞士教堂建築的趨勢相同之外，[68] 也記錄了身為宣教士、神父，與建築師的費

[65] Hans Holenstein, *Bethlehem Mission in Japan*, pp. 78-79.

[66] Hildebrand Yaiser, O.S.B., “The Liturgy as a Basis for New Churches in Japan,” *Liturgical Arts* (1953), pp. 79-80.

[67] Maurice Lavanoux, “A Summary,” *Liturgical Arts*, 21.3 (1953), p. 94.

[68] Karl Freuler, “Accommodation of Church Architecture in Japan. Some Suggestion,” *Missionary Bulletin*, 11(1957), p. 22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宥諒尤其關懷教堂建築在宣教與牧會上所發揮的果效，遠勝於對複雜精湛的結構、技術，與外形的追求。他強調，教堂建築師的責任是在消除生活與信仰間的距離，並要讓教堂能作為文化載體；而身在不具基督教傳統的亞洲國家，宣教士更要背負主導教會藝術發展，與引介西方文化的責任；而瑞士學派（Swiss school）的教堂建築，如Fritz Metzger與Hermann Baur的作品，就可做為極佳範例。[69]

> 我……的作品與三超德「信、望、愛」息息相關……。教堂、小禮拜堂、主教座堂與修道院的設計總是喜多於苦；在此，建築〔das Bauen〕成為一種建樹〔Erbauung〕－從興建〔aedes〕進而教育〔aedificatio〕。身為禮拜儀式執行者與建築師的我能夠在這裡透過神學與建築進行教導培育，盡心貢獻。這種信仰、藝術，與學識的融合應被展現在教堂設計中。……身為宣教士的我有著建立基督教會，並逐步培育、維持教會活力的使命。若沒有提供證道與聖事禮儀一個有效的空間，以及作為聚會、紀念信仰的地點，則不可能達成此一使命。……對於作為神父與牧靈者的我而言，教堂與修道院的設計之所以令人著迷，是因為信徒能參與體驗神的親近、呼召、與差遣，而這些都在禮儀的伴隨下發生在這些空間裡。……教堂建築師……必須……讓泉湧在一個莊嚴容器中的神聖恩典被感知，以頌讚神，並促進基督教會的成長。[70]

費宥諒在設計上另一不同於歐洲現代教堂建築之處，就是亞洲宣教經驗所帶來的文化涵化省思。他根據自己過去十多年來在臺灣、韓國與日本的工作經驗提出教堂設計在文化涵化上的三大原則：經濟實惠的建材、符合當地民族心性、以宗教禮儀與牧靈為根本。首先，材料上的選擇應順應當地氣候、風景、勞工，與建材的可能性。而教堂設計要能配合當地工匠所能，若在實踐上無法

---

[69] Charles Freuler SMB, “Church Architecture in Japan,” *Missionary Bulletin* (Seperatdruck, Herbst 1950), pp. 7-9; Karl Freuler, “Is Adoption of Church Architecture a Misunderstood Ideal? Reflections of a Priest- Architect,” *Liturgical Arts*, 27.3 (1959), pp. 54-56; Charles Freuler, SMB, “Religious Architecture in Japan,” *Liturgical Arts*, 21.3 (1953), pp. 74-75; Charles Freuler, SMB, “Ecclesiastical Architecture in Japan,” *Bethlehem* (1953), pp. 242-244.

[70] 原文參見附錄四；Karl Freuler, *Persoenliche Gedanken*, pp. 1-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被實現，再好的設計亦是惘然。[71]

其次，應對當地人民的審美情感、經驗與藝術理念有所了解與採納，以符合當地民族心性。例如，在日本設計教堂時，需透過歷史的檢視萃取出日本傳統建築的核心原則與元素。他認為日本建築的核心精神建立在三種原則上：（1）對材質特色的尊重；（2）簡明的結構合宜地展現其功能，不同空間彼此的關係清楚可見；（3）對自然的尊敬：建築在整體風景中不可成為突兀的元素，甚至要有美化的效果；因此教堂建築須能界定、圓融相鄰建物，並美化環境。[72] 在了解當地傳統思維之餘，還要符合當代精神。例如，日本當下的公共建築既非西方歷史風格，亦非古典日式風格，而是現代風格。因此，教堂建築也須順應此一時代趨勢。現代建築中的邏輯組織、新的鋼筋混凝土建材、造形上凹凸表現的藝術性，秩序與和諧感等，都可用於教堂建築。例如，木材不但經濟實惠與穩固，可營造溫暖、真實的日式氣氛，同時也具有現代性；而水平與垂直線的簡潔搭配或非對稱性安排、方形幾何圖式等，則恰好成為歐洲現代主義風格與東亞建築美感的交集；例如皮耶特・蒙德里安（Piet Mondrian，1872－1944）的風格派（De Stijl）對幾何尺度的強調與日本住家建築中做為重要尺度的榻榻米有了共通性。[73]

最後，牧靈上的文化涵化則是指透過好的禮儀空間來引領信徒理解、學習信仰內涵與禮儀精神。例如，他認為日本人在傳統宗教信仰上習慣孤立個人的形式，對基督教集體性崇拜的眾聖團契（communio sanctorum）精神必然感到陌生。因此，教堂的設計要避免讓人分散獨處，才能促進會眾群體的聚集；而透過讓信眾圍繞聖壇聆聽講道與經歷聖禮，則有助於學習並感知眾聖團契的意義。[74]

---

[71] Karl Freuler, “Accommodation of Church Architecture in Japan,” pp. 226-229; Freuler, “Is Adoption of Church Architecture a Misunderstood Ideal?” pp. 54-55.

[72] Karl Freuler, SMB, “Is Adoption of Church Architecture a Misunderstood Ideal?” p. 55.

[73] 礙於篇幅，在此不對荷蘭現代主義對瑞士現代教堂建築的影響作論述。Karl Freuler, “Accommodation of Church Architecture in Japan,” pp. 226-229.

[74] Karl Freuler, “Is Adoption of Church Architecture a Misunderstood Ideal?” p. 5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費宥諒的教堂設計

費宥諒的這些理念並非一蹴而成，而是隨著他在亞洲的教堂設計工作逐步成熟。他為臺灣設計了至少40座教堂，[75] 分佈於白冷會、方濟會與巴黎外方傳教會轄區內；[76] 加之其1955－1958年作品清單中的註記：「還有許多小教堂散佈在各地，只有神知道。」[77] 這顯示，這段時間他設計的小型教堂似乎多到連自己也不清楚座落地點與名稱，且顯然未一一記載，所以實際作品數量應超過目前所知。綜觀費宥諒在臺橫跨十一年（1954－1965）的教堂設計，反映禮儀精神與需求的平面佈局大體來說並不複雜，多以矩形長軸式與向心式兩種類型為主。相較之下，蘊含了信徒與設計者的認同、嚮往、震懾、理念、想像等情感成分的教堂外觀表徵，如造形、結構，與細部特色等，則極為多元。這樣的多元性源自費氏對亞洲宣教的考量，舉凡當地建材、人力技術、本土文化、與現代性等因素，皆影響了教堂外觀表徵。是以，下文將對應費氏的亞洲宣教教堂設計理念，分別以三種類型介紹其作品，[78] 並探討其風格、特色，以及與歐洲現代教堂建築的關係。

（一）融合西方傳統的樣式

此處的「西方傳統」意指在西歐建築中普遍可見、非歷史主義風格之建築「原型」（prototype）：矩形平面、四面牆體，與雙坡屋頂；其外觀表徵可源自

---

[75] 此數字包括了沒有落實建蓋的設計方案。

[76] 有關費宥諒為方濟會所設計的教堂可參閱于禮本，〈德國與臺灣的相會：1950-1970德國科倫方濟會省在臺南新營教區的教堂建築〉，《藝術學研究》，16期（2015.6），頁49-59；若干文獻誤將1966年竣工的花蓮新城聖母元后堂列為費宥諒之作，詳見，閻亞寧，《花蓮縣縣定古蹟新城神社舊址調查研究》（花蓮：花蓮縣文化局，2010），頁42-43。

[77] "*… und viele Kirchlein. All over the place, only God knows*"; *Karl Freuler, Werklist*〔作品清單手稿〕，1955－1958，檔案編號A393.07。Bethlehem Mission Immensee, Archiv〔白冷會總部檔案室，瑞士茵夢湖〕，（2013年9月1-4日造訪）。

[78] 當作品在外觀表徵上同時具有不同歸類屬性特質時，則以具聯想與情感主導性之元素為分類根據。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不同功能類型的建築，如民宅、農舍，與（外加屋脊鐘座或鐘樓的）鄉村教堂等。即便其中或許夾雜些許異於此原型的細節，但總體而言，源自此傳統的建築語彙及聯想明顯在此類教堂外觀表徵上具有主導性，並以喚起對「傳統」的情感為目的。然而，此處的「傳統」所指為何？

身處「現代」與「傳統」（或「歷史」）呈現對立或曖昧關係的時代，費宥諒對「傳統」的態度是相當包容與正面的。⑲ 他認為，藝術是有生命的，因此，隨著時代的發展推進，今日的藝術必然根植於昨日的傳統。極端的否決傳統是一種錯誤的態度，但更糟的則是將傳統中的某一時段之建築風格視為絕對權威。⑳ 費宥諒在反對盲目套用歷史風格的同時，也強調了「傳統」的重要：

> 如果我們要順應日本民族的風俗民情，則必須牢記他們對美是如何的敏感細膩與善於欣賞；同時也不可忘記，我們自己的豐富傳統提供了無數可喚起此地人民對藝術共鳴的資源。㉑

---

⑲ 現代建築因其發展中並存的多元性與複雜性而使「現代」一詞之意長久以來有其模糊與爭議性。有鑒於此概念並無法簡化至與某一特定樣式（如國際風格），或某一特質（如「理性功能主義」）畫上等號，而是還含括了技術、經濟、心理、個人，與社會等層面，且不同脈絡下的現代建築發展對之前傳統之反動、或互動方式與強度也各有差異，因此學者常歸納出包含空間格局、功能、結構、材質、審美等不同面向的綜合性多項原則作為思考輔助。本文礙於篇幅，並不在此贅述現代建築中「現代性」的定義與省思，僅在後文相關處加以說明。參見Jürgen Pahl, *Architekturtheorie des 20. Jahrhunderts* (München: Prestel Verlag, 1999), pp. 37-45.

⑳ "*Art is a living thing…. As life unfolds, the living art of today is anchored in tradition…. It would be an error to reject the sou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 and it would be an even greater error to cut out some phase of development from tradition and make it an absolute, i.e., to consider it as eternally viable and as classical form. This error has crept into the Orient. Seminars and universities in China were constructed in imitation of palaces of former times… owing to fallacious respect for a once living, but now dead, language of form.*"; Charles Freuler, "Is Adoption of Church Architecture a Misunderstood Ideal?" p. 54.

㉑ "*If we wish therefore to adapt ourselves to the Japanese we must always remember how receptive and appreciative they are for things which are beautiful. We must remember too that our own rich tradition provides us with many things which are eminently suited to arouse the interest of this artistic people*."; Charles Freuler, "Church Architecture in Japan," p. 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在瑞士小小的版圖中，密集蘊藏著見證信仰生活的豐富歷史古蹟……，古老、健康的天主教傳統造就了一種簡樸的民間藝術，並在其他文化影響下展現高貴特質。瓦利斯邦〔（Wallis Kanton）〕山谷中的小教堂就是很好的例子……當我們面對好的古老宗教藝術時，……應去思考創造出它們的那股精神，亦即深刻而活潑的信仰、作為基督徒的喜悅，以及天主教蘊育文化力量的驕傲。㉜

值得注意的是，在費宥諒的剪貼簿中，貼著一篇Thomas Merton在1956年的文章〈論神聖與世俗藝術〉（*Notes on sacred and profane arts*），㉝ 文中對「傳統」有一番闡述。首先，Merton定義了好的宗教藝術（或稱為聖藝）必須具備的條件：它必須是傳統的（traditional），但非慣例的（conventional）；它必須貼近生活，而非實驗性的；必須是認真嚴肅的，而非煽情的；必須是精神性的，而非感官性的；最後，必須是「天主教的（普世的）」（catholic），也就是能行於任何時期、地域，及文化。其中，「傳統」所代表的，是一種跨越古今的永恆真實。㉞ 循線追溯，則可發現在費宥諒充滿現代藝術與建築資料的剪貼簿中，亦夾雜著不少早期基督教與中古世紀的藝術作品圖片，以及1937年由瑞士藝術家Johannes Hugentobler（1897－1955）所設計的瑞士阿彭策爾邦（Appenzell Kanton）「亞宏的瑪利亞」朝聖禮拜堂（Maria zum Ahorn, Wallfahrtskapelle）（圖3）。㉟ 當時，此禮拜堂被盛讚為具有不受時代更迭影響的「永恆適切性」（*in*

㉜ "*Die Schweiz birgt, auf kleinem Raum konzentriert, eine Unmenge Denkmäler religiösen Lebens…, wo alte, gesunde, katholische Tradition eine herbe Volkskunst hervorgebracht hat, die durch den Einfluß eines anderen Kulturkreises veredelt wurde. Ein treffendes Beispiel bieten die Kirchen und Kapellen des Saastales im Wallis…. Wenn uns … gute alte religiöse Kunst begegnet, ...soll künden und leuchten den Geist, der sie schuf: einen tiefenlebendigen Glauben, christliche Freude – und ein wenig katholischen Stolz auf die Kulturkraft unserer heiligen Kirche*."; Karl Freuler, "Alte kirchliche Kunst," *Bethlehem*, 51.1 (1946), pp. 8-9.

㉝ Thomas Merton, *Notes on sacred and profane arts* (Jubilee Magazine, 1956).

㉞ "*A sense of timeless actuality of all living art from the primitives to the present,"; Thomas Merton, Notes on sacred and profane arts*, no. pag.

㉟ 彩圖可參見http://photos1.blogger.com/blogger/4490/2035/1600/Ahorn3.0.jpg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zeitloser Gültigkeit）樣式，也就是費宥諒文中提及瓦利斯邦〔（Wallis Kanton）〕山谷小教堂的樣式（圖4），[86] 亦即回歸古老教堂建築的初始「原型」。此說並非沒有道理，直到1950年代為止，在德國大廠Faller公司出品的兒童模型組裝玩具中，鄉村教堂[87] 的模型便常擁有此「原型」形式（圖5），足見此種教堂樣式的代表性。在費宥諒的設計中，不乏具有這種鄉村小教堂原型特色的例子；除了花費低廉、技術與人力精簡等實際考量之外，跨文化地域的「普世」「原型」樣式無非是避開歷史主義風格的一個可行選項。

1. 鹿野天主堂（1956）、石坑聖若瑟堂（1957）

費宥諒在1956年設計的「鹿野天主堂」（圖6）為一簡單的雙坡屋頂矩形平面單廳空間，聖壇區外突於主體空間之外，兩側的開窗讓聖壇空間浸淫在光明中，凸顯其神聖與重要性；擁有獨立入口的矩形聖器室依附在主要空間一側，維持了禮拜空間的完整。山牆面的入口搭配了前置的四柱門廊，工整長窗中的矩格重複出現在門廊上方的窗洞與入口拉門上，成為主導元素。門廊與主堂不同斜率的雙坡屋頂也形成高低有別的層次效果；清楚的幾何線條為簡單的小教堂增添一份俐落。設計圖中的名字「鹿野」顯然是指鹿野堂區，但並未進一步註明是堂區內哪個堂口小教堂，但根據外觀，則極可能落實在鹿野堂區內的龍田（1956）與永安（1957）天主堂（圖7a-b）。此外，費宥諒隔年為白冷會所設計的混凝土與木構磚造石坑聖若瑟堂（1957）（圖7c），[88] 與他在日本為美

[86] Karl Neff, "Kulturbeilage," *Ostschweiz*, 21 (1944), no. Pag. ; *ABBATISCELLA CATHOLICA* http://abbatiscella.blogspot.tw/2006/08/unsere-liebe-frau-vom-ahorn-6_29.html（2015年12月1日查閱）

[87] 此種鄉村教堂的形式明顯有別於規模較大、造形設計與元素皆更複雜多元的城鎮教堂。

[88] 趙川明，《後山傳愛》，頁181、301；而同書頁301中將石坑天主堂的年代誤植為1964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國方濟會所建造、「契合周遭風景的簡樸木造教堂」[89] 的菊名聖安東天主堂（1957）（圖8）等，都採用了同樣的形式。此樣式不僅在費氏教堂設計中重複使用度高，同類型也見於白冷會傳教區內的桃源（1957）、泰源（1957）、電光（1957）、及竹湖（1960）天主堂等，[90] 以及德國方濟會新營傳教區內的平安村聖若瑟天主堂（1957）與官田聖安東尼天主堂（1957）（圖9a-b）。[91] 這種形式的教堂大量出現在白冷會與日、臺方濟會宣教區內的現象，是否意味著費宥諒的設計提供了兩個德語修會組織在其轄區內能快速建蓋教堂的一個方便參考，還有待更多資料佐證方能定論。

2. 大鳥舊堂（1955）

另一種重複性亦頗高的類型與鹿野天主堂相差無幾，僅門廊部分較窄，且門廊與主堂的雙坡屋頂斜度相同，並有著將附加空間與主堂連結為一體的拖曳斜坡屋頂（Schleppdach），[92] 如大鳥舊堂（1955）與南興舊堂（1956）（圖10-11）。[93] 大鳥與南興舊堂的設計者身份不可考，但它們與費宥諒1952年的

[89] " *Schlichter Holzbau, der sich eng der Landschaft anpasst*." Karl Freuler, "Vom Kirchenbauen in der Mission.Gedanken Eines Priester-Architekten," *Die Katholische Missionen*, 78.6 (1959), p. 173.

[90] 圖片可參閱趙川明，《後山傳愛》，頁128、135、140、150、153、188、190、193、301。

[91] 有關德國方濟會與費宥諒的關係，以及方濟會新營宣教區內的平安村與官田天主堂出自費宥諒之手的分析，可參見于禮本，〈德國與臺灣的相會：1950-1970德國科倫方濟會省在臺南新營教區的教堂建築〉，頁37-130。

[92] 此種屋頂形式常見於西方的民宅、農舍，與教堂等建築類型。

[93] 從照片中只能看到大鳥與南興天主堂一側的附屬空間（聖器室），但因矩形平面搭配單邊外突附加空間的形式常出現在費宥諒的設計中，因而另一側沒有對稱性外加空間的可能極高。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神奈川縣茅崎市無原罪の聖母堂的外觀極相似（圖12），[94] 因此不排除它們與茅崎市天主堂「同源」的可能。[95] 此類型教堂的簡化形式[96] 重複出現在鹿野和平（1954）（圖13）、小馬（1957）、利吉（1958）、美山（1958）、新園（1960）、太麻里（1960s）、鸞山（1962）與新興（1963）天主堂等，[97] 是白冷會初期常見的教堂類型之一。

3. 臺北聖母堂（1954）

費宥諒在1954年所設計的臺北聖母堂（圖14）[98] 在空間配置上再現了他在同年東京攝影展演講中所說的現代教堂建築特色：聖壇走向式長軸單廳具有主要禮儀空間之完整性、容納副壇與告解室的低調附加空間、緊鄰大門入口的洗禮池。此外，室內屋頂筋樑與板柱所形成的框架結構營造出韻律感與前導性，屋頂筋樑與其間的木質天花板形成顏色與材質的和諧搭配。在外觀上，入口處的高聳鐘樓與正面的大型圓窗都指涉了傳統教堂的聯想，但簡明的幾何造形與線條重複出現在鐘樓的鏤空塔冠、柱列、磚牆與窗戶上，連同和諧融入其中的中式花窗點綴，都流露出現代特質。此外，成為內部空間主導元素的柱樑框架結構則是另一現代建築特徵，也是費宥諒喜用的手法，如在東京攝影展演講中

[94] 大鳥與南興天主堂極可能為單廳空間；相形之下，入口位於教堂長邊的茅崎市無原罪の聖母堂規模更大，內部空間結構不同，有著外露的混凝土柱樑框架結構與單邊側廊。費宥諒將入口安排在教堂長邊時，如茅崎市無原罪の聖母堂，除了可能是順應當地建築傳統之外，有時是因佔地深度不夠，無法滿足中軸線上由前院與門廊所構成的多層次入口設計。

[95] 此處的「同源」是指同出自費宥諒之手，或大鳥舊堂與費氏的茅崎市無原罪の聖母堂有著共同或相近的教堂參照類型。

[96] 省略屋脊鐘座或依附長邊一側的附加空間。

[97] 教堂圖片見趙川明，《後山傳愛》，頁113、124、125、151、161、166、244、247、253、300。

[98] 1954年5月5日完成的設計圖將教堂標示為：*Our Lady Shrine At Taipei*.此設計的委託背景並不清楚，顯然也並未落實建蓋。*Pläne von Karl Freuler. Luzern Staatsarchiv*.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特別被提及的吉祥寺市聖靈天主堂（1950）（圖15）、[99] 茅崎市無原罪の聖母堂（圖16），與下文將提及的臺東中華殉道烈士堂（圖28a-b）等。德國藝術史學家Anton Henze在1958年便觀察到費氏教堂設計中這種外露柱樑框架結構是當代許多歐洲建築師喜用的手法：

> 建築師Josef Schütz並不隱藏他在所羅圖恩城聖母堂空間裡的框架結構……。它們的產生是基於功能考量，但卻具有現代雕塑的本質，規範著空間，引導在長軸空間中走向聖壇的步調。這種清楚可見的結構主義將技術上的承載結構轉化為形塑造形的強調元素，受到許多現代教堂建築師的青睞……。費神父在他的日本宣教教堂〔吉祥寺市教堂〕中利用簡單的混凝土框架結構，不僅是為了因應地震的安全考量，同時類似其他的結構主義建築師，與Auguste Perret有著同樣的立場：欲隱藏支柱結構的人實則犯了嚴重錯誤。[100]

在外觀上，臺北聖母堂與費氏早先的仙臺市聖道明天主堂（1950），及一關天主堂（1952）雷同（圖17、18）；稍加變化的形式則見於館山聖十字堂

---

[99] 吉祥寺市聖靈堂的落成年代在日本親建會工務所上的紀錄是1954年，但在1953年的期刊報導中卻紀錄其設計是1950年，Brentini所給予的年代也是1949-1950年。Maurice Lavanoux, "A Summary," p. 83; Fabrizio Brentini, *Karl Freuler*, p. 38;〈カトリック吉祥寺教会〉,《株式会社親建会工務所》2014年7月， <http://www.shinkenkai.jp/portfolio-item/%E3%82%AB%E3%83%88%E3%83%AA%E3%83%83%E3%82%AF%E5%90%89%E7%A5%A5%E5%AF%BA%E6%95%99%E4%BC%9A/>（2014年10月12日檢索）。

[100] "*Josef Schütz stellt das konstruktive Gerüst unverhüllt in den Raum der Halle seiner Muttergotteskirche in Solothurn. Stützen und Pfetten sind aus Beton. Sie wurden aus der Funktion entwickelt, nehmen aber etwas vom Wesen moderner Plastik an, gliedern den Raum und bringen das Schreiten der Wegkirche zum Altar in Gang. Der offene Konstruktivismus, der das tektonische Kräftespiel von Stützen und Last als formgebende Faktoren betont, findet unter den Kirchenbaumeistern viele Freude….P. Freuler weiß in seiner Missionskirche in Japan die Folge von einfachen Betonrahmen nicht nur für die Sicherheit bei Erdbeben zu nützen. Gleich den anderen Architekten des Konstruktivismus scheint er mit Auguste Perret zu sagen: "Wer eine Stütze verbirgt, begeht einen Irrtum.*"; Anton Henze, *Neue Kirchliche Kunst* (Recklinghausen: Paulus Verlag, 1958), pp. 33, 5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950s）與長浦天主堂（1950s）等（圖19）。這種在費氏作品中頻繁重複的現象有其意義。費宥諒在其撰文中說：「沒有基督教傳統的日本需要向外國學習……。在宗教建築方面，瑞士學派則可在日本發揮關鍵影響，因其簡明的結構與符合聖事禮儀的樣式是莊重嚴肅的最佳表現。」[101] 在此文中作為實踐範例的附圖便是仙臺市聖道明天主堂與一關天主堂。然而，這裡的「瑞士學派」具體所指為何？廣義而言，可以是整個瑞士現代教堂建築討論與發展趨勢；狹義而言，或許可具體限縮至某些具代表性建築師的作品。的確，在瑞士現代教堂討論中，並非僅有傾向國際風格（International style）的類型，融合傳統的類型也在其列。例如，費宥諒的老師比爾希勒便曾撰文介紹瑞士1920與1930年代的鋼筋混凝土現代鄉村小教堂，如Metzger所設計的歐爾利孔鎮小教堂（Oerlikon, 1926）（圖20a-c），與Dreyer的聖安東禮拜堂（St. Antonius chapel, 1932）（圖21a-c）。[102] 這兩座針對人數稀少且散居性地區所設計的教堂在外形上與傳統鄉間教堂並無明顯差異：界定入口的出挑門簷、屋脊鐘座、覆蓋單邊外突小禮拜堂的拖曳低斜坡屋頂、縱向長窗、以及側面開窗的內縮外凸聖壇空間等。它們之所以被比爾希勒盛讚為「現代」村落小教堂的範例，[103] 除了因為顧及鄉村教區拮据的財力與人力，以及與周遭多山風景的融合之外，更因它們證明了在現代教堂建築中，有一個可避免被民眾誤解、並能兼顧傳統與現代藝術的中庸之道。[104] 此處的「傳統」是指建築外觀，而「現代」則是指鋼筋混凝土的建材、

---

[101] "*Japan…has no Christian tradition and needs, therefore, has to learn from foreign countries…. As far as religious architecture is concerned, the Swiss school could exercise an essential influence in Japan because its clearcut construction as well as its sacral-liturgical formation are the expression of a seriousness which leaves nothing to be desired*."; Charles Freuler, "Ecclesiastical Architecture in Japan," p. 244.

[102] Linus Birchler, "Betonkirchen," *Das Werk*, 13 (1926), pp. 21-25; Linus Birchler, "Wallfahrtskapelle St. Anton, Stettenbach bei Grosswangen: Architekt Otto Dreyer, Luzern," *Das Werk*, 20 (1933), pp. 263-265.

[103] Linus Birchler, "Wallfahrtskapelle St. Anton, Stettenbach bei Grosswangen: Architekt Otto Dreyer, Luzern," pp. 263-265.

[104] Linus Birchler, "Wallfahrtskapelle St. Anton, Stettenbach bei Grosswangen: Architekt Otto Dreyer, Luzern," p. 26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內部空間中外露的結構框架（如歐爾利孔鎮小教堂）、符合禮儀需求與實用性[105]的空間格局（強調聖壇區，與崇拜空間的完整性）、內部教堂藝術與建築的整體性，以及教堂藝術的現代風格（如St. Antonius chapel）。[106]從比爾希勒對Dreyer的聖安東禮拜堂之讚美、此作品在1954年參展費宥諒在東京的瑞士現代教堂攝影展，以及此設計與白冷會在多山臺東的教堂在地理環境、經濟人力，與技術條件上，都有共通之處來看，費宥諒應也認同這種現代鄉村小教堂的理念，並身體力行地落實在自己的設計中。

臺北聖母堂與上述費氏日本教堂的共同造形特色，也出現在被費聲遠主教譽為當時花蓮教區內最美的教堂－臺東新港安德肋堂（1955），[107]以及德國方濟會新營傳教區的佳里聖三堂（1956）（圖22a-b、23）。新港安德肋堂的單廳長軸空間有著費氏教堂常見的內縮、側面開窗的聖壇區，以及外露的格狀屋頂筋樑結構（圖22b）。現有文獻並未提及這兩座教堂的設計者，但它們與費氏教堂的高度相近似乎都指向同源關係，抑或兩座教堂的設計者曾受費氏影響。[108]

然而，單就費氏這些教堂中重複出現的柱樑框架結構與聖壇空間設計來看，另一可能的連結便是巴特寧的臨時教堂（Notkirche）。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百廢待興的德國面臨著普遍缺乏可用教堂的困境，日內瓦的普世教會協會（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in Genf）與德國的新教救濟組織（Hilfswerk der Evangelischen Kirchen in Deutschland）委請巴特寧為「臨時教堂方案」（Notkirchenprogramm, 1947－1951）設計一系列的教堂類型，以簡單、真誠，[109]

---

[105] 例如Metzger在Oerlikon小教堂中把傳統的巴西利卡式空間加以變化，將因人數稀少而少有用處的側廊縮減為走道。Linus Birchler, “Betonkirchen,” p. 24.

[106] 此處的「教堂藝術」（church art）是指教堂內部與禮儀崇拜有關的作品及用器，如壁畫、苦像、祭桌、燭台、聖體櫃等。

[107] 新港天主堂建於1955年，同年8月25日落成，1986年重建。趙川明，《後山傳愛》，頁158。

[108] 佳里天主堂內部是否有著外露的屋頂筋樑，則不得而知，目前的平頂天花板是重修後的結果。

[109] 這種教堂誠實地反映出當代現實（貧瘠），及人心在戰後對安定、秩序，與回歸本質的渴求。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與節省為原則，以外地工廠預製的成套結構桿件為支撐系統（圖24），讓教會成員可自行完成無須複雜靜力學考量的外牆，力求在最短時間內、用最實惠的建材、透過最簡單的結構與建蓋流程，並兼具凝聚信眾的效果，完成一個實用且莊嚴的教堂。在此方案中，最具代表性的矩形廳式空間類型B（Typ B）有三種聖壇區形式：連結矩形會眾空間的多角形聖壇區、納入矩形空間中內嵌式聖壇區，與不予以區隔的聖壇區（圖25）；而拖曳斜坡屋頂可覆蓋舊堂的殘存部分，或單邊非對稱性的附屬空間，使其與主要空間整合為一體。雙坡屋頂與毫無塊面劃分的外牆賦予厚實量體的臨時教堂一種類似農舍穀倉建築的簡樸特質，唯介於屋頂與牆體之間的連貫窗帶暗示出此建築並非一般穀倉的砌體建築，而是內部另有支架結構，且此三角拱鉸接框架成為視覺上的主導元素。⑩除了類型B之外，臨時教堂方案中的類型A（Typ A）（圖26）有著建蓋技術較複雜、且更昂貴的尖拱屋架，以及寬敞中廊與兩側低矮狹窄走道的空間格局。⑪費宥諒1950年的吉祥寺市聖靈教會（圖15）在建材、柱樑框架結構、三廊格局，與內縮的後殿空間上，有如臨時教堂類型A與類型B的結合，而1952年的茅崎市無原罪の聖母堂與一關天主堂等（圖16、27），則幾乎是類型B的再現。這樣的雷同或許並非偶然。費宥諒在面臨西方宣教組織於日本及臺灣急需教堂之際，巴特寧的臨時教堂無非提供了一個極佳的參考，可達到建蓋快速、節省經費、減低工程複雜度、並兼具樸素莊嚴的效果。⑫

4. 中華殉道烈士堂（1955）

⑩ Svenja Schrickel, “Die Notkirchen von Otto Bartning – eine serielle Kirchenbauproduktion der Nachkriegszeit. Überlieferte Zeichen eines Neuanfangs nach dem Zweiten Weltkrieg,” *Denkmalpflege in Baden-Württemberg, Esslingen am Neckar*, 34.4 (2005), pp. 201-205.

⑪ 類型A的外牆成為支撐架構的一部份，在建蓋上難以由一般教友來完成。Svenja Schrickel, “Die Notkirchen von Otto Bartning,” pp. 201-205.

⑫ Fabrizio Brentini, *Karl Freuler*, p. 1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東中華殉道烈士堂（圖28a-b）[113] 也反映出上述臺北聖母堂融合傳統與現代的特質。在其西方傳統教堂建築原型外觀中，門面設計、厚實封閉的牆體、細長的直條窗戶，與室內的柱樑框架結構等，都凸顯出現代建築的特色。其中，上粗下窄的板柱在結構考量之餘，更讓空間有了帳幕的意象，呼應了聖經中用會幕（tabernacle）與帳幕對崇拜所在的比喻。[114] 但同時，矩形單廳格局、柱樑框架結構、屋頂與壁面之間的橫向窗帶，與內縮嵌入的聖壇空間等，[115] 則留有前述巴特寧臨時教堂的影子。在外觀上，教堂門面部分騰空於屋頂上的壁帶裝飾結構形如傳統巴西利卡式教堂、或有著屋脊鐘座的教堂簡筆符號，清楚傳達此建築的意義。[116] 室內大片的壁面營造出隔絕外界的庇護感，同時也讓外露的混凝土柱樑框架結構特別醒目，它們與緊鄰板柱兩側的縱向窗條共同規範著空間秩序與韻律感。

（二）順應當地文化的樣式

除了上述這種以西方傳統樣式為主導的教堂，費宥諒另一類教堂設計則分別在當地建材與傳統建築造形元素的採納、本土文化中審美原則與氣候等考量上，流露出順應當地風土民情的強烈企圖。他在闡述設計日本教堂的理念時，曾說：

> 宗教建築必須像世俗性建築一樣，走向進步。而這條道路在日本顯得格外容易，因為最重要的原則早已存在於傑出的古代日本建築中：邏輯、清

[113] 福建路的第一座天主堂建於1953年，是臺東傳教區的首座天主堂；費宥諒的設計圖完成於1955年11月22日，新堂在1956年9月祝聖啟用，為紀念之前在中國殉教的神父與教友而命名為「中華殉道烈士堂」；1979年整修後改名為中華殉道諸聖堂；現今聖壇區上方的開窗為傅義修士所增修；內部屋頂與外部壁面樣貌亦有所改變。趙川明，《後山傳愛》，頁96、301。

[114] 《聖經》（和合本），〈希伯來書〉11章，9-10節。

[115] 目前難以確定費宥諒的這份手稿是否是定稿；現今教堂的帶狀高窗與聖壇區或許維持了原狀。

[116] 已閒置的成功區下麒麟天主堂之正面造形可能便是參考中華殉道烈士堂而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楚、簡單的結構、材質的細緻，以及對風景的尊重。我們必須重思〔日本〕傳統美感的價值，才能成就真正具創造力的藝術。因此，我們不應在現代教堂建築中消除日本藝術元素，而是要重新發現它的價值……。順應日本文化不代表僅採用其外在形式，而是要理解這些造就日本傑作的審美精神。⑰
>
> 至於外在形式，我們必須研讀不同的世俗性作品，採納適合的部分，使其變得高貴，並具有精神性，好創造出真正配得聖藝之名的作品。⑱

> 我的建築設計有何特別之處？我的工作橫跨大部分的遠東地區－日本、韓國與臺灣。我必須面對東亞的歷史、文化、氣候情況，這些都是特別的挑戰，並激發了全新的想法。……這些考量無非帶來了許多限制，但也激發了許多創意……。我研讀東方廟宇宮殿，東方古典建築中截然不同於西方的比例結構，人與木、石、竹、宣紙、與稻草蓆墊〔榻榻米〕等建材之間極微妙的人性化關係……，讓我省思內化，幫助我掙脫學院訓練的束縛，以開放、有同理心的、負責的態度面對新的可能性。⑲

費氏教堂設計中順應文化的特質主要被反映在本土建材、「東方」傳統

---

⑰ "*Like secular architecture, religious architecture must turn to progressive architecture. In Japan, this road is all the easier to travel as the most important principles are represented in the good old Japanese dwellings: Logic of construction, structural clarity and simplicity, refinement of material and considerable respect for the landscape. The reconsideration of traditional aesthetical values is the best guarantee for an actually creative art. In modern church building therefore, there should be no elimination of Japanese artistic elements, but rather re-discovery…. Adoption to this culture does not consist in the adoption of external forms, but rather in the comprehension of the spirit and the conception of the aesthetics from which the Japanses masterpieces have originated*."; Charles Freuler, "Ecclesiastical Architecture in Japan," p. 243.

⑱ "*For the external forms, on the other hand, we must study the various secular productions, adopt what is suitable, ennoble and spiritualize it so as to produce something that will be really worthy of the name of sacred art*."; Charles Freuler, "Church Architecture in Japan," p. 9.

⑲ 原文參見附錄四；Karl Freuler, *Persoenliche Gedanken*, p. 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與古典建築結構，⑳ 以及細節造形上。他多方的探索實驗也造就了其作品外觀表徵上的多元性；其中，最常見的手法則是利用具幾何線條特色的大片日式格窗、紅色窗框、木頭圓柱、屋頂形式（如重檐廡殿頂或歇山頂），以及木材與竹材等。

1.「堂口小禮拜堂」（1955）

費宥諒在1955年的木構「堂口小禮拜堂」（圖29）㉑ 是簡單的雙坡屋頂矩形平面單廳空間，內縮有如壁龕的低矮聖壇區外突於主體空間之外，兩側的開窗讓聖壇空間尤其明亮，凸顯出其神聖與重要性；擁有獨立入口的矩形聖器室依附在主要空間一側，維持了禮拜空間的完整。位於長側面的入口不但沿襲了東亞建築傳統，且採用傳統閩南民居中常見的凹壽形式與步口廊，讓略顯陰暗的入口空間與進入室內後的明亮聖壇區形成對比，不無前述瑞士教堂設計中「摒棄世界，前往光明」之效果。壁面上的日式格子窗（*Shōji*）在營造出東方

⑳ 本文中的「東方」與「東方古典」沿用了費宥諒在論述中國與日本建築特色時的用語，但從費宥諒本人的亞洲經驗而言，「東方」實際上所指涉的是東亞地區，具體影射對象可能是其工作經驗中所認識的中國、日本，臺灣，與韓國，但其中顯然又以中國與日本為主。他認為，「東方古典風格」的代表便是中國與日本的宮殿及廟宇建築，這樣的思維延續了第一任駐華宗座剛恆毅的論述。此外，費宥諒雖然知曉中文，但停留中國的時間不到一年，造訪臺灣的時間更短；而他的日文雖然不好，卻在日本生活了20年。因此，在他對東亞文化與建築傳統的理解中是否對日本、中國，與臺灣有所區分，還有待商榷。但有鑑於費氏在所發表的文章中幾乎清一色以其日本作品為例來說明設計理念，加之當時臺灣的日式房舍相當普遍，因此他將這些日本經驗套用在臺灣教堂設計上之可能性極大。參見Karl Freuler, “Vom neuen Bauen in China. Ein Blick in Geist und Gestaltwandlung,” *Bethlehem*, 52 (1947), pp. 464-468; Karl Freuler, *Persoenliche Gedanken*, p. 4; 于禮本，〈德國與臺灣的相會：1950-1970德國科倫方濟會省在臺南新營教區的教堂建築〉，頁74-76。

㉑ 設計圖上未標明地點與堂名，只註明「堂口・臺灣・小禮拜堂」（Aussenmission. Taiwan. Kapelle），日期為1955年12月9日。*Pläne von Karl Freuler*. Luzern Staatsarchiv.〔費宥諒手稿。琉森國家檔案室〕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風味的同時，也為教堂增添了現代建築的簡單俐落與幾何美。日式格窗是費宥諒極常用的元素，當代《禮儀藝術》期刊（*Liturgical Arts*）便如此讚美他的吉祥寺市教堂：「建築師將日本門窗的簡潔美與常見現代建築之簡潔美進行了巧妙的結合。」[122] 在材質使用上，費宥諒在設計稿中註明：「木架結構，且內外覆以木條板材所構成的殼層」。[123] 這種以木條板材為外部壁面的手法也見於費氏同期（1955－1956）在日本的教堂，如神奈川縣小田原市国府津的七苦聖母堂、四日市市聖母堂（圖30），與北海道苫小牧市聖母堂（圖31）等。這樣的作法一方面帶來了溫暖的效果，另一方面也凸顯了木材的特色與地位，既順應了本土木造建築的傳統，也符合現代建築回歸材質特色的精神。[124]

2. Bali 小教堂（1956）

費宥諒在1956年所設計的Bali小教堂（圖32）[125] 位於短側面的凹壽入口類似「堂口小禮拜堂」，但此處進深近兩米的門廊在設計圖上被標示為「前廳」（Halle），不再僅具傳統雨庇的意義，而是流露出作為延伸聚會空間的企圖。[126] 矩形平面的教堂有著巴西利卡式的三廊空間，柱列劃分出寬大的中廊與狹窄的側廊通道。被含納在主體空間中的聖壇區與中廊等寬，而祭桌位於抬高的淺台中央，這些都彰顯出聖祭的重要。在外觀上，連貫主堂與門廊的雙坡屋頂營造出整體感，但門廊處較高的屋簷又讓它與主堂有所區隔。大面積的日式格子窗仍是主要造形元素，兼具東方的聯想與俐落工整的現代感；同時，屋頂上勾勒屋脊鐘座輪廓的十字支架也頗具幾何線條之美。

---

[122] Charles Freuler, “Religious Architecture in Japan,” p. 84.

[123] “*Konstruktion in Holz mit Innen- und Aussenverschalung in Lauwanholz”; Pläne von Karl Freuler*. Luzern Staatsarchiv.〔費宥諒手稿。琉森國家檔案室〕。

[124] Karl Freuler, “Accommodation of church architecture in Japan,” p. 229.

[125] 設計圖日期是1956年7月28日；目前無法確認設計圖中“*Kirchlein in Bali*”（Bali小教堂）確切所指為何，以及是否落實興建。*Pläne von Karl Freuler*. Luzern Staatsarchiv.

[126] 類似的概念常出現在費宥諒的教堂設計中；有關此設計概念將在後文有進一步的說明。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3.「福爾摩沙小教堂」（1956）

完成時間僅比Bali小教堂晚四天的「福爾摩沙小教堂」（Kirchlein in Formosa）（圖33）並未標示地點與堂名，且在平面圖部分僅繪製了聖壇區，其上註記顯示它應是一種基本類型的起草：

> 鋼筋混凝土與竹結構設計的嘗試：十六坪的鋼筋混凝土聖壇區與起居空間。聖壇區祭桌後方裝有柵欄的開放式壁龕用來安置聖體櫃。延伸的水泥屋頂將緊鄰聖壇區的竹造空間覆蓋在下。長邊有著帶狀高窗開口，搭配〔竹子〕交織紋樣的牆壁。木製大門有著寬大的邊框。正面屋頂出挑一米五，其餘部位維持一米。地板可用水泥或磚材。⑫⑦

「福爾摩沙小教堂」在外觀與空間格局上都與上述Bali小教堂極為接近，日式方窗與外牆上的竹節紋理一方面流露本土建材特質及簡明工整效果，另一方面也暗示了內部空間的不同。聖壇區有著幾乎落地的大面積窗戶，在無窗竹構會眾區的對比下，顯露出其明亮神聖的特殊性。有著獨立入口的聖器室與緊鄰的休息室位於聖壇後方，維持了禮儀空間的完整性。費氏在設計圖中區隔聖壇區與會眾區的部位特別註明：「可以是容易拆卸的隔離設計，以便週日禮拜需要。搭配可撤除的半高樁柱。」這種可拆卸的隔門與活動式樁柱顯然為因應宣教區的特殊需求，讓空間能隨著週間與週日造訪人數的大幅差異而能彈性調整。⑫⑧「福爾摩沙小教堂」展現出費宥諒順應當地建材、本土建築造形元素、

---

⑫⑦ "*Versuch einer Beton Bambus Konstruktion: 16 Ping Chor und Wohnung in Eisenbeton. Da Chor offen Nische hinter Altar vergittert für Tabernakel. Das Bambushaus wird an Chor angeschlossen, unter das vorspringende Betondach geschoben. Längwände leichtes geflecht mit oberem Fensterband, offen. Eingangstüre in Holz mit breitem Rahmen. Dachausladung 1.50 Front, sonst ein Meter. Boden im Betonteil Zement, sonst gewachsen oder Backstein*."; 此設計圖並未註明具體地名與教堂，落款日期為1956年8月1日；*Pläne von Karl Freuler*. Luzern Staatsarchiv.

⑫⑧ "E*v[entuell] leichte Abschluss zum Wegnehmen, wenn Gottesdienst am Sonntag. Halbhoch Pfosten zum Herausnehmen"; Pläne von Karl Freuler*. Luzern Staatsarchiv.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禮儀改革中凸顯聖祭禮的訴求，與實用功能等努力；尤其竹材的使用讓此教堂有別於當時臺灣常見的日式木屋，而更接近茅草頂與竹架牆體的原住民住屋。設計圖上的教堂是否曾落實建蓋已難以追溯，但從白冷會許多1956年之後的教堂結合混凝土與竹材、並搭配帶狀窗孔的形式來看，如小馬（1957）、利吉（1958）、新園天主堂（1960）等（圖34），[129] 不難想見費宥諒此設計反映了當時在建造教堂時，順應風土、就地取材的趨勢，但也不排除費氏理念影響了其他教堂設計的可能。

4. 大南天主堂（1958）

Bali教堂的形式再現於費宥諒的大南（今東興）天主堂（1958）（圖35），[130] 無論是平面、空間格局、門廊、日式方窗、屋頂的十字架造形等，都近乎雷同；唯內縮外凸的聖壇空間，與緊鄰其後方的聖器室及休息室有些差異。從教堂側面觀之，屋簷的高低隨著門廊、會眾區與聖壇區而有所變化；會眾區的橫向格窗與聖壇區兩側的縱向格窗也點出內部的不同空間。從兩側縱向細窗灑入的光線強調出此空間的神聖性。設計圖上標註「臺灣原住民村落小教堂。樑柱間的屋頂：木頭或上漆。磚牆，若磚材不好則塗上灰泥。」[131] 顯示費氏凸顯材質與結構的企圖，而這些外露的筋樑線條同時也成為空間中引導向上與向前的視覺動線。[132]

---

[129] 小馬與新園天主堂的圖片可參見趙川明，《後山傳愛》，頁166、244、247。

[130] 大南天主堂圖稿在1958年3月10日完成，教堂在1959年7月竣工。琉森國家檔案室的圖稿並無教堂名稱，但臺東白冷會的圖稿上印有「東興天主堂」字樣。1969年大南村大火後改名東興村，天主堂亦改名為東興天主堂。天主堂在1974年整建後在外觀、屋頂與樑柱結構上維持了原教堂基本架構，但在門窗形式、材質與顏色、雕塑與繪畫裝飾上都與原貌不同。趙川明，《後山傳愛》，頁245；田清福，個人訪談，臺東東興天主堂，東興（2015年4月1日）。

[131] "*Kirchlein für ein Eingeborenendorf in Taiwan/ Decke zwischen Balken: Holz oder Bemalt/ Mauer Backstein. Wenn schlechte B[ackstein] dann geschlemmt[geschlämmt]*"；費宥諒圖稿，臺東白冷會。

[132] 現今東興天主堂的顏色與裝飾與原貌有所出入，但屋頂筋樑結構並無太大改變。臺東錦屏天主堂有著類似東興天主堂的造形，或許便是參照它而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5. 馬蘭聖若瑟堂（1957/58）

馬蘭的開教始於錫質平神父在1953年購買的一棟日式建築作為臨時教堂，它不但是台東縣原住民部落中的第一座天主堂與傳教中心，也是白冷會神父學習原住民語言的據點。1957年白冷會開始籌建新堂，費宥諒的馬蘭聖若瑟堂（圖36a）設計圖在1957年9月完成，新堂於1958年5月祝聖啟用。[133] 馬蘭天主堂有著常見的矩形平面、外突依附的聖器室，以及巴西利卡式平屋頂三廊格局。與中廊等寬的凹退入口門廊及聖壇區，並貫穿整個空間的方柱列，形成中廊會眾區與聖壇區融合為統一單廳空間的錯覺；但同時，祭桌後方的深色壁面與主廊會眾區的白色柱列及壁面形成強烈對比，凸顯出聖壇區的特殊性（圖36b）。洗禮空間位於西面側廊內，維持了聖祭禮空間的完整，而它與凹退門廊僅隔一牆的鄰近入口位置則暗示了洗禮是成為教會奧體的第一個步驟。垂直與水平線條充斥在樑柱、窗戶、座椅、祭桌與耶穌苦像上，整體顯得沉穩節制。[134] 相對於內部空間呼應禮儀精神的特質，它的外觀有著類似日式寄棟造或中式五脊四坡重檐廡殿頂的屋頂形式，而紅色的窗框則帶有中國古典建築風味；但白色的柱樑與上下樓層的壁柱、成片的方格窗戶，及大片深色壁面，卻同時呈現出幾何線條所建構出簡潔、規律的現代感（圖36c）。[135]

6. 鸞山天主堂（1961）

另一在外觀上帶有東方風味的例子是1961年的鸞山禮拜堂（圖37）。[136] 教堂內部格局仍是常見的矩形單廳空間，擁有獨立入口的聖器室位於聖壇後方。然而，此處的洗禮池卻位於聖壇附近，被納入主要聖祭禮空間的安排凸顯了洗禮聖事的重要。告解空間則位於入口附近的角落，維護了造訪者的私密性與進

[133] 趙川明，《後山傳愛》，頁106-107。

[134] 原設計的現代簡明特色在歷經修建與壁畫裝飾的添加後不復見；是否室內原本有著外露的筋樑結構，或類似目前的木質天花板，則難以斷言。

[135] 根據歷史照片中的顏色深淺對比，類似今日教堂顏色的可能性頗高。

[136] 此設計圖並未落實興建。*Pläne von Karl Freuler*. Luzern Staatsarchiv.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出方便。教堂內部空間以禮儀改革運動的精神為原則，其外觀卻因歇山頂、入口柱列門廊，與橫推的格子窗等，流露出東方風味，並在簡潔的線條中不失現代建築的幾何美。歇山頂在歐洲多出現在住宅建築中，在東亞則常見於宗教建築；因此，費氏或許刻意採用東亞熟悉的宗教建築語彙傳達教堂所蘊含的信仰特質。值得注意的是，鸞山禮拜堂的外觀與內部格局幾乎重現了費宥諒在日本的苫小牧市聖母堂（1956）（圖38、39）與鎌倉市大磯町聖母堂（1954/55）（圖40、41），而費氏在東京攝影展演講及撰文中，多次以這兩座聖母堂為例，說明順應日本文化的教堂設計。[137] 是以，馬蘭聖若瑟堂與鸞山禮拜堂一方面見證了費宥諒的文化涵化企圖；另一方面，鸞山禮拜堂也成為費氏在臺灣教堂設計中套用其日本經驗的例子。

7. 鹽水天主堂（1959）

同樣與費宥諒日本教堂有著密切關係的則是他為新營德國方濟會所設計的鹽水聖神堂（1959）[138]（圖42a-b）。它有著常見的矩形平面、三廊巴西利卡式格局、內嵌入主要空間的聖壇區，以及位於長邊的入口與柱列門廊。室內的木頭圓柱不但帶有明顯的東方色彩，也成為導向聖壇的輔助暗示。明顯不同於前述教堂之處是新增的半圓外突洗禮空間，它被納入教堂中軸一端，與聖壇遙遙相對；如此一來，既可維持聖祭空間的完整，以及會眾對儀式的專注，又可因獨立的空間而凸顯洗禮聖事的重要，因它是成為教會肢體的第一步，充分展現此設計對禮儀精神的考量。鹽水聖神堂內部的木頭屋架被平滑的膠合板天花板遮掩，讓整體空間顯得簡單明瞭。[139] 成排日式方窗，與聖壇空間中僅有的祭

[137] Charles Freuler, “Accommodation of Church Architecture in Japan,” pp. 226-229.

[138] 設計圖的落款日是1959年3月8日。于禮本論文中（附圖40）的鐘樓並不在費宥諒的設計圖中，雖然可能為日後加建，但鐘樓的構思早已存在費氏其他的設計中；文中若干空間配置上的推論因2015年出現的新資料而需修正。于禮本，〈德國與臺灣的相會：1950-1970德國科倫方濟會省在臺南新營教區的教堂建築〉，頁49-59。

[139] 設計圖對天花板的註記：“*8mm Dicke perforierte Sperrholzplatten 90/90”; Pläne von Karl Freuler*. Luzern Staatsarchiv.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桌、聖體櫃、燭台，與十字架等，成為室內僅有的裝飾。教堂的白色外觀讓它顯得相當醒目，⑭⓪ 而北向臨街的外突壁面上有著方形窗洞排列成的十字樣式，不但昭告出此建築的宗教性質，也暗示了牆壁後方洗禮空間的特殊與意義。

鹽水聖神堂的內部格局與苫小牧市聖母堂（1956）（圖39），及東京板橋區聖伊莉莎白堂（1956/1957）（圖43）非常類似；前者作為文化順應的範例已無庸置疑，而後者也是費氏及他人眼中著名的日本文化順應教堂典範：

> 在這個〔採用本土傳統木材作為文化涵化建築〕脈絡下，我要以木更津、苫小牧、松阪市，與東京—板橋區的這4座在1956年建蓋的木造教堂為例。它們可以被視為很好的範例，因為木料在這些教堂中營造了溫和且真實的日本氛圍—但卻又具有現代風格。⑭①

> 一個像板橋區聖伊莉莎白堂的空間對所有熟知日本建築的內行人而言，是明顯的日本樣式，但它並非直接遵照某個傳統範本而來。⑭②

8. 都蘭天主堂（1959）

木造的都蘭天主堂（1959）（圖44）⑭③ 在設計時間上僅比鹽水聖神堂早一個多月，兩者在平面、空間格局，與樑柱結構上幾乎如出一轍；但都蘭天主堂

---

⑭⓪ 設計圖上註記："*Backsteinmauerwerk Weiss geschlämmt*"（磚牆塗上白色灰泥）; *Pläne von Karl Freuler*. Luzern Staatsarchiv.

⑭① "*In this connection [accommodation] I like to refer to the four wooden churches in Kisarazu, Matsusaka, Tomakomai and Tokyo-Itabashi, all built in 1956. They might be considered a good example, because the wood in these churches creates a warm and real Japanese atmosphere – and yet they are in modern style*."; Karl Freuler, "Accommodation of church architecture in Japan," p. 229.

⑭② "*Ein Raum wie die Kirche St. Elisabeth in Itabashi wirkt auf jeden Kenner der japanischen Architektur unverwechselbar japanisch, und doch besitzt er kein direktes Vorbild in der Tradition*."; Thomas Immos, "Ein Schweizer Architekt in Japan," *Bethlehem*, 42(1963), p. 6.

⑭③ 設計圖落款日期是1959年1月24日，未落實興建。*Pläne von Karl Freuler*. Luzern Staatsarchiv.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則多了與門廊相連的厚實立方鐘樓、環繞教堂的開放式迴廊，以及室內類似東京板橋區聖伊莉莎白堂的外露木屋架。費宥諒在設計圖上註明：「鐘樓塗白；磚牆塗白色灰泥；〔山牆面〕木頭〔樑柱〕外露」，[144] 這讓白色的鐘樓與教堂無疑成為明顯地標。都蘭天主堂鐘樓攢尖頂與教堂雙坡頂的相呼應，以及臨街白色山牆上的可見木頭樑柱，都標示出東方風味；然而，白色山牆與木樑柱的對比也可能是源自歐洲傳統建築的啟發，例如德國、奧地利，與瑞士德語區等地擁有白牆與外露木樑柱結構的傳統桁架建築式樣（“Fachwerk”; “Riegelhaus”）（圖45）。無論如何，循著費宥諒融合傳統與文化順應的理念，他自東亞或歐洲傳統建築中尋找符合現代性的元素，如幾何線條美、建材與結構的特質等，並將之轉用在教堂設計中的意圖是無庸置疑的。

9. 新城天主堂（1958）

費宥諒的新城禮拜堂（1958）（圖46）[145] 有著費氏作品中常見的矩形單廳空間與格局、位於長邊的入口及門廊、大片連貫的日式矩格窗戶等。新的造形元素是突出外壁的柱樑框架結構、順沿整個教堂長邊的開放式柱廊，以及連結門廊、有著高聳圓錐屋頂的四柱開放式鐘樓。造訪者行經鐘樓、門廊、入口，而後進入教堂，在不同空間過渡變化中得以沉澱心情。圓錐屋頂的鐘樓成為此教堂明顯昭告西方信仰與現代美感的標記。此種樣式的鐘樓，以及連結鐘樓與主堂的廊道元素無獨有偶地與德國方濟會在1956年開始興建的菁寮聖十字架堂類似（圖47）。菁寮聖十字架堂由德國建築師哥特佛瑞德・波姆（Gottfried Böhm，1920－）所設計，其中的許多建築語彙不但是他在1950年代到1960年代間設計教堂時的慣用元素，同時也反映出其父多米尼庫斯・波姆的影響；而結合入口通道與鐘樓的手法、亭式鐘樓，與標示特殊空間的大型圓錐屋頂等，則

[144] “*Turm weiss verputzt; Ziegelmauerwerk weiss geschlämmt; Holz sichtbar.*”；*Pläne von Karl Freuler*. Luzern Staatsarchiv.

[145] 設計圖完成於1958年2月13日，未落實興建。*Pläne von Karl Freuler*. Luzern Staatsarchiv.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是波姆父子喜用於其現代教堂設計的標誌性母題。[146] 菁寮聖十字架堂在當時臺灣的外籍宣教士圈中相當有名，加上費宥諒設計新城禮拜堂時，他為德國方濟會所設計的新營天使之后堂正在興建中，以及他與在臺德國方濟會、並委託波姆設計菁寮聖十字架堂的楊森神父關係友好，可想知他曾過目菁寮天主堂設計圖的可能性極大。[147] 新城天主堂外觀表徵中的日式格窗東方元素、西方傳統鐘樓體，與頗具現代性的鐘樓大型幾何圓錐頂及突出外壁、並在內部外露的柱樑結構框架，三者在視覺聯想的主導性上呈現有趣的平衡，但幾何線條與形式卻是三者共同烘托出的要素。

（三）純粹幾何形體的現代樣式

在費氏的教堂設計中，除了前述融合西方傳統，與順應當地文化等類型之外，現代幾何樣式的鋼筋混凝土教堂數量則是最多的一種，在外觀上通常流露出國際風格特色，並有著白色矩方或圓形等幾何造形，以及簡潔俐落的設計原則；其背後的設計動機仍與宣教目的緊密相關，但此處的主要考量則在展現瑞士現代教堂建築特色，以作為亞洲教堂建築發展的重要參考：

> 沒有基督教傳統的日本需要向外國學習……。在宗教建築方面，瑞士學派（〔Karl〕Moser、〔Hans〕Hofmann、〔Fritz〕Metzger、〔Hermann〕Baur）則可在日本發揮關鍵影響，因其簡明的結構與符合聖事禮儀的樣式是莊重嚴肅的最佳表現。在多年的掙扎與嘗試後，今日的瑞士教堂建築藝術已達其他地方無可比擬的高度……。[148]

[146] 有關菁寮聖十字堂造形元素的溯源、波姆父子在教堂設計上的承襲與創新等分析頗為龐雜冗長，礙於篇幅限制在此不做贅述，詳細討論可參見于禮本，〈德國現代教堂建築在臺灣：哥特佛瑞德・波姆（Gottfried Böhm）的菁寮聖十字堂與學甲天主堂〉，頁83-125。

[147] 有關費宥諒與在臺德國方濟會的關係，可參見于禮本，〈德國與臺灣的相會：1950-1970德國科倫方濟會省在臺南新營教區的教堂建築〉，頁45、49-5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在費宥諒的字裡行間，可明顯察覺他對瑞士現代教堂建築的自豪；此處所提及的建築師不但皆是瑞士德語區內樹立現代教堂建築典範的權威人物，其中的Hofmann與Baur還曾任費氏的老師，而Metzger與Baur不但是費氏老師比爾希勒所主導聖路加協會的成員，也參展了費氏與此協會所合辦的東京瑞士現代教堂攝影展。無怪乎在費氏此類作品中，除了個人創意的發揮之外，往往流露出呼應瑞士現代教堂建築的特質，或是與上述這些人的作品有類似之處。

1. 關山（1956）、下營（1959）

關山地區的傳教始於1954年的一座茅草屋臨時教堂。費宥諒的新堂設計稿完成於1956年3月（圖48a），教堂在1957年3月25日祝聖啟用。[149] 與當地木造日式風格的警察局與鎮公所等相較，關山天主堂是當地第一棟超過兩層樓高的鋼筋混凝土建築。[150] 天主堂有著常見的矩形平面、巴西利卡式三廊格局、內縮外凸的矩形聖壇空間，以及依附於教堂的聖器室。堂內的方柱列形成圍繞會眾與聖壇空間的迴廊，讓儀式進行時能夠環繞祭桌，呼應了禮儀改革運動中融合主祭司鐸與會眾的訴求。教堂內部的筋樑與柱列帶出了井然有序的空間層次感，而有著粗細變化的橫樑營造出近似四折板屋頂的形式，同時也有如拉開的帳幕（圖48b），類似的手法也常見於前述費氏的吉祥寺市、茅崎市，與一關天主堂（圖15、16、27）等。在外觀上，坡度淺而無外簷的雙坡屋頂讓教堂看似一

---

[148] "*Japan…has no Christian tradition and needs, therefore, has to learn from foreign countries…. As far as religious architecture is concerned, the Swiss school(Moser, Hofmann, Metzger, Baur) could exercise an essential influence in Japan because its clearcut construction as well as its sacral-liturgical formation are the expression of a seriousness which leaves nothing to be desired. After struggling and experimenting for many years Swiss church architecture has reached today an artistic level which is barely attained anywhere else.…*"；Charles Freuler, "Religious Architecture in Japan," p. 75.

[149] 費宥諒設計圖，臺東白冷會；趙川明，《後山傳愛》，頁136。

[150] 教堂在1995與1998年經過整建，與原貌有所出入。田力強神父，個人訪談，關山天主堂，關山（2013年4月3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白色立方體。[151] 入口與平屋頂雙柱門廊位於南面長邊，門口的圓形圖式按照草圖（圖48c），或許象徵了基督君王所在的關山聖母堂之地理位置，它位於海岸山脈與中央山脈之間，並有新武呂溪從中流經。[152] 教堂長面上突出於外牆的附壁柱與緊鄰在兩側的縱向窗格類似中華殉道烈士堂（圖28a），賦予外觀一種簡明、工整的特質。西向鄰街牆上的格狀玻璃牆表現出簡明的幾何特色，其山牆般的形狀也呼應了室內中廊的輪廓；[153] 類似的造形元素也見於費氏的日本長浦天主堂（1950s）（圖49）。

關山天主堂與Baur在巴塞爾城郊的聖彌迦勒教堂（St. Michael, Hirzbrunnen, Basel, 1948/49）（圖50a-c）有著許多共同點：類似的空間格局、柱列安排、樑柱結構與造形，及格狀玻璃牆等。[154] 兩個教堂中粗細不同的筋樑形式也見於Schütz的所羅圖恩城聖母堂（St. Marien, Solothurn -Weststadt, 1953/54）（圖51a-b）中的鉸接結構樑柱。這兩座聖母堂都是費氏在東京攝影展的選件，且在費宥諒的剪貼簿中也有多幅Schütz聖母堂的圖片與介紹，[155] 不難想像關山天主堂留有它們的蹤影。[156]

費宥諒在1959年為德國方濟會所設計的下營天主堂（圖52）為一矩形平面單廳空間，極寬敞的聖壇區凸顯出位於淺臺中央的祭桌，在聖壇與會眾區周遭也留有禮儀行進環繞的空間。聖壇區與洗禮堂位於空間中軸兩端的格局一如都

---

[151] 現今教堂的斜屋頂已整修過，與原設計中的造形不同。

[152] 田神父不確定圖像意義為何，猜測與三位一體有關。田力強神父，個人訪談，關山（2013年4月3日）。

[153] 今日玻璃牆的矩格安排與設計圖不同，減弱了縱向性，整體牆面顯得較為瑣碎。

[154] St. Michael比關山天主堂多出的後殿後方壁龕則用以放置聖體櫃；其入口位於傳統西面，洗禮堂則位於南面近入口處。相較之下，關山天主堂的入口位置或許因前院方位的考量而改至南面；參見 “St. Michaelskirche, Hirzbrunnen, Basel,” *Das Werk*, 36 (1949), pp. 112-113.

[155] 其中一張圖片顯然剪自瑞士建築期刊的文章；“Muttergotteskirche in Solothurn-Weststadt: Architekt Josef Schütz, Zürich,” *Das Werk*, 41 (1954), pp. 451-454.

[156] 關山天主堂的獨立鐘樓建於1976或1978年，並非費氏的設計。田力強神父，個人訪談，關山天主堂，關山（2013年4月3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蘭與鹽水天主堂。左右兩側內凹的入口與突出於寬深門廊中央的洗禮堂取代了往常中央入口的形式，特別強調出洗禮聖事的地位。在外觀上，它類似關山聖母堂，[157] 因淺緩的雙坡屋頂而形似立方；正面與側面的矩格窗戶、錯落排列的空心磚、壁柱與外簷等，將壁面劃分為幾何性十足的大小方格。此設計中有些不若以往之處，如側面大幅外突的板柱與橫向屋簷，明顯的凹凸對比打破了平直的壁面，增添強烈的光影效果。此外，空心磚成為重要元素；洗禮堂門面由空心磚形構，後方裝有玻璃；長面的空心磚牆則無玻璃，但窗前裝有可防颱風的摺疊拉門，[158] 如此不但有助通風，也因灑入室內的細碎光線而使空間別有風味。下營天主堂的淺緩斜屋頂、緊鄰屋頂的帶狀高窗、壁面的幾何規律，花磚、與室內屋頂筋樑結構等，也見於Baur的聖彌迦勒堂（圖50a-c）與歐騰市聖母堂（1953）（圖53a-b）；這兩座教堂皆是東京攝影展的選件，費氏對它們的熟悉自然不在話下。

2. 臺東培質院、寶桑天主堂、白冷會院、康樂學生中心、鹿野學生中心

隨著臺東教務的推展，白冷會也陸續成立了提供偏遠地區學生寄宿與課業補習的臺東培質院、康樂培質院，與鹿野學生中心；不同堂口因信眾人數的增長也逐漸發展出由教室、宿舍，活動室，與附屬禮拜堂等所組成的多層立方建物群組。它們都有著白色外觀、水平分割的窗戶、或筆直遮陽板等所形塑出的簡潔工整特色。其中的附屬禮拜堂規模偏小，不易從建物外觀中辨識出，但透過不同的窗戶與板柱形式，以及外牆上的十字架來暗示教堂所在，則是常見手法。[159]

---

[157] 此設計圖並未落實興建，下營天主堂後來是根據方濟會樂根修士的設計建造；于禮本，〈德國與臺灣的相會：1950-1970德國科倫方濟會省在臺南新營教區的教堂建築〉，頁64-68。

[158] 設計圖上標註："*Vorfabrizierte Betonraster ohne Glas. Davor Falttüren für Taifun.*"; *Pläne von Karl Freuler.* Luzern Staatsarchiv.

[159] 手稿中還有1955年的第一座白冷會館禮拜堂設計圖與1965年的大武天主堂會院設計圖；但因僅為簡略平面圖，因此暫不討論。*Pläne von Karl Freuler*. Luzern Staatsarchiv.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臺東培質院（1958）

費宥諒在1958年1月完成臺東培質院的設計，校舍大樓在同年10月祝聖。[160] 培質院由兩棟成直角坐落的雙層鋼筋混凝土建築組成；附設的小禮拜堂位於院區入口左側，教堂後方緊鄰著聖壇室、聖器室、休息室與圖書室，[161] 南面鄰街外牆上的十字架暗示了禮拜堂所在（圖54a-b）。禮拜堂為一矩形單廳空間，屋頂朝中央微拱的橫向筋樑與上寬下窄的板柱將形成的冂字框架微調成類似帳幕般上窄下寬的意像（圖54c）；類似的手法已見於前述關山天主堂中。此外，較纖細的縱向天花板肋條有如視覺上的輔助線，將焦點帶往前方的聖壇。大面積的開窗緩和了低矮屋頂所造成的壓迫感，而聖壇兩側的開窗採光烘托出此空間的重要性。類似的柱樑框架結構也見於費氏的日本教堂，除了前述若干例子之外，還有宮古天主堂（1952）（圖55），與東京主教行政大樓聖堂（1953）（圖56）等。

（2）寶桑天主堂（1962）

1962年落成的寶桑路天主堂是因福建路天主教無法容納持續增長的教友而建。費宥諒在1961年5月完成的設計中，將原本的道理廳加以改建，除了地面層的天主堂與樓上的神父宿舍之外，還在旁邊加蓋傳教員宿舍。[162] 兩棟二層樓高的平屋頂建築以L形排列，地面層有著開放式的柱廊，其正上方二樓走廊外壁則覆以花磚，形成上下樓層在外觀上的凹凸與明暗對比（圖57a-b）。地面層的教堂為無柱單廳矩形空間，入口位於長面，進入大門後的左側狹窄外凸空間為洗禮池所在，與另一端的聖壇相對。室內的柱樑框架形塑空間的規律性，而佔

[160] 趙川明，《後山傳愛》，頁39。

[161] 如今的培質院已與原貌大為不同。

[162] "*1961/16. Mai. Karl Freuler freut sich über den Abschluss des Bauvertrages für Dausanglu[寶桑路], die zweite Pfarrei in Taitung auf Taiwan, wo er einen Pfarrsaal als Kirchenraum mit einer Pfarrwohnung im 1. Stock und einer Katechistenwohnung daneben zu bauen plant*." 原文中的"Dausanglu" 顯然將B誤拼為D，實際所指應為寶桑路（"Bausanglu"）; Hans Holenstein, *Bethlehem Mission in Japan*, p. 124；趙川明，《後山傳愛》，頁11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牆面二分之一的成片木框方格拉窗成為前往祭桌的動線指引。一如培質院禮拜堂，寶桑路天主堂的白色外觀與室內充斥著簡單的幾何線條、採光充足、聖壇與會眾空間融合度高，呈現簡樸的現代風格。[163]

（3）白冷會會院（1965）

費宥諒在1965年設計、1966年竣工的白冷會會院由樓層高度不同的建築群、中庭，與迴廊等所組成。[164] 在整體白色外觀中，連接行政區與聖堂之間的走廊外牆以燒製兩次而顏色深淺不一的紅磚砌成，在兼具美觀之餘也暗示了不同功能的空間（圖58a）。高低錯落的立方建築與壁面結構上不同的線條韻律及凹凸變化讓個別建築在群組統一性當中仍有其特殊性。東－西向配置的一層樓高禮拜堂位於會院東南方，在矩形平面單廳空間中，聖壇與會眾區的大小接近，聖壇區淺台中央的祭桌位置遵循著禮儀改革的精神（圖58b）。此外，聖壇區淺台及壁面與眾不同的材質及色調也烘托出此一空間的特殊。室內屋頂的白色格子樑與填充其中的木質天花板形塑出統一整體空間的結構與深淺顏色的規律交替（圖58c）。[165] 在外觀上，南面縱向長窗與遮陽板強調出垂直線的視覺效果，而連貫的橫向窗戶所帶出的水平線則與之相平衡（圖58d）；聖堂南面牆上大幅外突的遮陽板賦予了教堂外觀一種光影對比強烈的雕塑感。這種外突的板柱在下營天主堂設計圖（圖52）已出現，它與1950年代瑞士現代教堂在外觀細節變化上的趨勢同步，讓以往平直的壁面更為活潑。

---

[163] 寶桑路天主堂今已成為腳底按摩中心。屋頂、壁面與窗戶結構幾乎維持原狀，但內部格局與原貌已大為不同。黃子芳先生，個人訪談，寶桑天主堂，臺東（2015年6月9日）。

[164] 白冷會在1953年來臺後先住在福建路天主堂，而後在1956年於福建路興建第一座會館；1965年興建現在的會館。趙川明，《後山傳愛》，頁12、14、22；臺東縣政府文化處，〈天主教白冷外方傳教會〉，<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itycase/cityCase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caseId=VA09602000983&version=1&assetsClassifyId=1.2&cityId=22&menu=1>（2012年3月5日檢索）

[165] 白冷會院在1975年與1981年歷經整修擴建，但禮拜堂並未有關鍵性的改變。歐思定修士，個人訪談，臺東白冷會總院，臺東市（2013年4月3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4）康樂培質院附屬禮拜堂（1959）、鹿野學生中心禮拜堂（1965）

相較之下，費宥諒1959年設計的康樂培質院附屬禮拜堂，與1965年的鹿野學生中心禮拜堂在平面設計上則有別於上述範例。康樂培質院禮拜堂也是簡樸的單廳空間，整體外觀也以立方矩格元素為主（圖59）；不同之處在於禮拜堂的座椅呈T形圍繞著緊鄰壁面的聖壇，呼應了舒瓦茲理論中「神聖的啟程」的意象。[166] 這是費氏設計中少見的形式，目前難以斷定原因為何，或許此設計流露出他在中軸走向安排形式以外的企圖。

1965年6月7日完稿的鹿野學生中心（圖60）因地形的關係而讓教堂平面呈梯形，單廳空間中的聖壇區前方裝有折疊拉門；此一活動隔牆讓會眾空間在平日可為其他活動所用，反映出多功能空間的思考。拉開隔門後，聖壇與頌經台的位置非常接近整體禮儀空間的中央，主祭人員的座位緊鄰後方壁面，聖體櫃也在聖壇正後方的壁龕中，這些都符合禮儀改革的訴求，突顯聖壇的核心地位。

3. 知本（1956）、大溪（1956）、美崙（1956/57）、新營（1958）、鸞山天主堂（1961）

相較於前述獨棟、或融合在群組建築中的立方樣式小教堂，費氏也以立方與矩方多元組合的方式設計了許多教堂。

（1）知本聖母無染原罪堂（1956）

知本地區的開教始於1954年，起初白冷會神父租用了一個茅草屋為據點，1955年2月便興建了一個80平方米的混凝土單廳教堂；時至1956年，教友的快

[166] 設計圖完稿於1959年10月1日；費宥諒在1962年5月11日還有另一張外觀不同的設計圖，但禮拜堂的隔局並未改變。*Pläne von Karl Freuler*. Luzern Staatsarchiv.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速增長讓教堂再度不敷使用，錫質平神父重新購地，委請費宥諒設計新堂（圖61a-b）。聖母無染原罪堂於1956年12月8日落成，是當時白冷會傳教區中最大的教堂（圖61c-d）。[167] 知本天主堂有著矩形會眾區、內縮外凸的聖壇區與後殿空間；在三廊巴西利卡格局中，作為低矮走道的側廊讓方柱列與高牆區隔出的寬敞挑高中廊成為一個連貫聖壇區的完整空間。教堂內的柱列規範著空間秩序與動線，中廊前方內縮的矩形聖壇區與外凸的後殿因著側面長窗的採光與空間的層次縮減而成為焦點。此時的聖壇仍緊鄰牆面，但它所在的三階淺台取代了以往如舞臺般的高台；後方壁面上作為唯一裝飾的大型十字架點出空間核心所在，木質平屋頂[168] 與混凝土原色壁面是空間中的唯二色調，整體顯得簡樸莊重，流露出禮儀運動中強調回歸本質、聚焦聖壇、刪減裝飾的理念。在外觀上，教堂有如由三個逐層遞減面積的立方體所組成。外部細節呼應著內部空間的主次，挑高的會眾區有著規律分佈的單一方形高窗，聖壇區則有著縱向長窗；會眾區外圍的開放式柱廊及玻璃門則與聖壇區的大片厚實壁面形成對比；後殿上方拔高的直條鏤空三角塔與十字架凸顯出聖壇所在。知本天主堂的雪白外觀與其俐落的幾何造形讓它在一片青山綠野中成為一個帶有濃厚象徵的地標。此外，它也被視為臺東傳教區教堂設計的典範，因為此設計已為後續三年可能的信眾增長做出準備：

> 面對這樣的信眾人數增長，在興建教堂時不可能為一個擁有五百位受洗者的教會設計一個小型教堂。然而可支配的經費已所剩無幾。因此，我們通常並不建蓋一個太大的教堂，而是在週日與節慶時節能有一個開放式門面的教堂。教堂的大門可以被卸下，好方便那些坐在教堂前院的聽眾仍能參

[167] 現有文獻對知本天主堂的竣工有1957與1956年兩種說法，但根據瑞士白冷會1957年初文刊中對知本新堂的介紹，教堂應在1956年底就已完工。知本天主堂今日具有濃厚的原住民文化色彩，改變了原設計的歐洲現代教堂風格。趙川明，《後山傳愛》，頁228-229、233; Jacob Hilber, “Dsche-Ben, ein Schulbeispiel unserer Taitung-Mission,” *Bethlehem*, 62.1 (1957), pp. 380-383.

[168] 設計稿上註記「木頭/纖維板屋頂」（Holz/Pavatex Decke）。費宥諒設計圖，臺東白冷會。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與彌撒。知本教堂由一個大型水泥立方形構，其聖壇空間與主廊可提供四百人座位。當更多人潮出現時，我們可卸下圍繞主廊三面的玻璃門，讓原本的禮拜空間成為一個有著柱列的大廳。如此一來，教堂成為一個可容納一千多人、且能遮陽蔽雨的空間，同時擁有良好的通風，讓人在這種熱帶氣候中能感到舒適。這個教堂有如一個巨大的帳篷：在人潮擁擠時高高拉起它下方的布棚，讓趕來的人群在其中尋得庇護。[169]

這種彈性空間的設計在瑞士已有先例，如Metzger在1932年的蘇黎世St. Theresia教堂；進入大門後，首先是一個能容納80人的小型週間禮拜堂（Werktagskapelle）；在週日時，則可拉開高廊（Empore）下方的玻璃門而擴展為一個更大的聚會空間。這樣的創新設計不但已預先將歐洲1970年代多功能教堂的議題展現出來，[170] 同時可能也提供了費宥諒一個極佳的參考。

（2）大溪天主堂

大溪是白冷會在拓展土坂地區與金峰鄉六個部落宣教工作的重鎮，費宥諒的設計完成於1956年8月（圖62a），教堂在1957年3月祝聖（圖62b）。它被費宥諒視為當年所有作品中最美麗的一件，[171] 而龔岱恩神父（Josef Guntern，1915－1987）則稱它為臺東地區教堂設計的正確範例：

> 氣候、風雨、炎熱、尤其颱風與地震，都讓簡單而堅固的混凝土建築成為最佳選擇。如此一來，無須每兩年就得再度修建教堂。除此之外，這種形式非常符合此間民眾的品味，他們非常喜愛這種風格。白亮的教堂在一片綠地中或深藍大海襯托下，成為一個迷人的焦點。有一次我坐在開往大溪的小巴士裡，當遠方教堂初現在視線中時，車上所有的乘客因對它感到讚

[169] Jacob Hilber, “Dsche-Ben, ein Schulbeispiel unserer Taitung-Mission,” p. 381; 原文參見附錄五。

[170] Fabrizio Brentini, *Bauen für die Kirche*, p. 88.

[171] 今日的大溪天主堂在經過擴建、加蓋二樓，與新增的濃厚原住民風格裝飾下，已不復見原貌。趙川明，《後山傳愛》，頁25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嘆而禁不住紛紛起身探看。這座神的聖殿看似一個庇護的堡壘，但或許更好的說法是把它比喻為一艘緩緩駛向大海的船。⑫

大溪天主堂有著常見的矩形平面、內縮外突的聖壇空間，前置的門廊，與依附於主體建築的聖器室。在三廊廳式格局中，方柱列將空間區隔為中廊與左右側的走道，讓門廊、會眾區與聖壇區成為統一的禮儀空間。屋頂外露的格狀筋樑結構呼應著充斥在空間中的方格窗孔；聖壇區兩側的開窗烘托出此空間的特殊性。在外觀上，白色的壁面與方窗孔洞相得益彰；照壁上由方孔排列成的十字形則與聖壇上方格狀鏤空高塔上的十字架前後呼應。

（3）花蓮美崙進教之佑主教座堂（1956/1957）

與大溪天主堂極為類似、且幾乎是同時期進行規劃的，則是花蓮美崙的進教之佑主教座堂，也是巴黎外方傳教會自1953年起經營花蓮宣教區以來的第一座鋼筋混凝土教堂，由費聲遠主教在1956年請託費宥諒設計。⑬

> 我有一位白冷會的朋友，是建築師，他曾答應我，一旦需要他幫忙，他一定肯幫忙，現在正是找他的時機。……我的建築師……按照他替我們設計的主教座堂，捏造了一個模型，在手中轉來轉去，端詳着上下四方，顯然對他的傑作非常滿意，誇讚著它的條紋、比例，內部的安排及其他一切

⑫ "*Das Klima, die Witterung, die Hitze und besonders die Taifune und Erdbeben, fordern geradezu den einfachen und doch festen Betonbau. Denn, so muss man nicht nach zwei Jahren wieder seine Kirche neu aufbauen. Dazu kommt, dass diese Art dem Geschmack der Leute sehr entspricht, sie lieben geradezu diesen Stil. Tatsächlich wirkt die hellweisse Kirche im Grün der Matten oder gegen das Tiefblau des Meeres wie ein faszinierender Punkt. Als ich im Autobus gegen Da-hsi fuhr, standen alle Passagiere spontan vor Bewunderung auf, als die Kirche von ferne sichtbar wurde. Das Gotteshaus sah wie eine schützende Burg aus, oder besser noch wie ein Schiff, das auf dem Ozean dahingleitet*...."; [Caption to the picture], *Bethlehem*, 62.1 (1957), p. 337.

⑬ Patrick Veil, "Weitere Nachrichten aus Formosa," *Echo S.M.B.*, 20.5 (1956), p. 7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他的工作又好又快，一星期以後……全部圖樣包括一切細節都準備好了。……經過六個月……我們的主教座堂豎立起來……青年人相當喜歡這單調形式，老年人就稍差一些了。⑭

費宥諒第一個設計版本完成於1956年9月（圖63a），第二個版本則完成於1957年1月（圖63b-c）。兩者的不同主要在於側廊、聖壇區，與聖器室的窗戶配置；第二個版本加強了側廊的採光，讓中廊高窗與側廊窗戶的排列對應凸顯出水平線性；而聖壇區的窗戶則從原本的橫向基調改為縱向排列，一方面點出與會眾空間的區隔，另一方面也與高塔的直線性呼應。

花蓮主教座堂有著費氏教堂中常見的平面與空間配置。在巴西利卡式的三廊格局中，相較於左右側的低矮走道，中廊的方柱列與挑高壁面讓此一高聳寬大的會眾區連同聖壇區融合為一個完整的禮儀空間（圖63d），⑮ 但其中的聖壇區又因著兩側大片窗面而顯得異常明亮與重要。屋頂的筋樑結構營造出前導至祭桌的走勢，烘托出崇拜空間的高潮，其矩格框架也讓整體空間有了秩序感與統一性。全白素淨的色調、寬敞的聖壇空間與淺台、聖壇後方作為空間中唯一裝飾的苦像等，都流露出禮儀改革的影響。與壁面有著懸殊差距而顯得略為細碎的開窗固然有著防颱考量，⑯ 亦是歐洲禮儀改革運動影響下的一種建築語彙：封閉度高的崇拜空間有利於隔絕外界干擾，提高會眾參與禮儀的專注。花蓮主教座堂無論在建材或造形上，在當地景觀中都顯得與眾不同。建築主體、門廊與其方柱列、方矩形窗戶，以及鐘塔上的鏤空格狀交叉造形等，⑰ 在在強調出幾何性、嚴謹、純粹的特質（圖63e）；其中，鐘樓的幾何圖式似乎頗受費宥諒喜愛，他在日本的星美學園聖堂便以此樣式作為外觀主導元素（圖64）。

⑭ 費聲遠，《回憶錄》，頁127-129。

⑮ 圖中的座椅與聖壇祭桌位置都已是梵二公會後的形式。此教堂今已成為花蓮天主教文物館；在幾經修建後，屋頂、窗戶、內部格局與中國風裝飾等，都已與原貌不同。

⑯ 費聲遠主教認為大窗戶的設計對一個位處颱風區的教堂而言，並不適合。而張志豪也認為美崙進教之佑堂的小格窗戶與許多花東地區教堂的細長窗戶都是源自防颱考量。費聲遠，《回憶錄》，頁126；張志豪，《花東地區天主教教堂建築研究》，頁92。

⑰ 美崙進教之佑堂門廊上方的壁畫在1958年教堂祝聖時尚不存在，教堂外觀呈單一色調。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花蓮主教座堂在一些人眼中或許顯得單調，如費主教所言，卻也營造出一種堅固堡壘的聯想，在生活與開教都艱苦的花蓮不失為合宜的教堂建築意象。[178]

（4）新營天使之后堂（1958）

與大溪天主堂及美崙進教之佑堂同類型的還有費氏為德國方濟會在新營會院所設計的天使之后堂（圖65a）。[179] 1958年9月28日祝聖的天使之后堂在空間格局上與前述範例有所不同。結合鐘樓的入口位於長面，獨立的洗禮堂則緊鄰入口通道左側（圖65b）；主廊與聖壇區形成一個完整的矩形單廳空間，而副壇與六個告解室則全數被安置在有如附屬空間的單邊側廊中。室內的格狀屋頂結構延伸至四周白色壁面，垂直與水平線條賦予整體空間工整嚴謹之感，同時也暗示前往聖壇區的動線（圖65c）。會眾區左側上方的大片壁面與下方的帶狀開窗有如一道發光的指示線，導向前方光線滿盈的聖壇區（圖65d）。相較於花蓮主教座堂內聖壇緊鄰牆面的安排，此處的聖壇已向中央挪移。[180] 在柱子與壁面的屏蔽下，單邊側廊內的副壇與告解室幾乎成為獨立的空間，不僅維持了主要聖禮空間的統一性，也保有個人冥思與告解的私密性（圖65e）。在外觀上，教堂與會院有如數個高低錯落的白色立方積木組合而成，窗戶與鐘樓上排列整齊的正方或矩格開口成為大片壁面上的唯一裝飾，讓整體幾何感十足的教堂無疑成為當地顯著地標（圖65f-g）。

天使之后堂是唯一曾多次出現在費宥諒文章中的臺灣案例，用以說明亞洲海外宣教地教堂設計對文化涵化與禮儀精神的實踐：「鋼筋混凝土的選用具有抗颱耐震的特色，內部格局則符合禮儀的秩序安排。」[181] 此特色也大受德國方

[178] 花蓮秀林鄉聖彌額爾堂因有著白色立方造形與鏤空的塔樓元素而可能是參考主教座堂而來。

[179] 更多有關新營天使之后堂的歷史與分析可參見于禮本，〈德國與臺灣的相會：1950-1970德國科倫方濟會省在臺南新營教區的教堂建築〉，頁53-59。

[180] 科倫方濟會省長安格曼（Antonellus Engemann）特別讚揚這種符合禮儀改革精神的設計。Antonellus Engemann, “Theologische Neuorientierungen in der Weltmission,” *Rhenania Franciscana*, 14.2 (1961), p. 7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濟會的肯定：

> 新營教堂非常寬敞、簡單、莊嚴，在空間設計與裝飾上清楚指向獻祭禮與聖壇。在建築結構上有所區隔的瑪利亞〔副壇所在的〕側廊裡也安排有告解用椅，不會影響教堂的統一性。在教堂之外，尤其在入口前方，則是對宣教尤其意義非凡的洗禮堂。[182]

獨立洗禮堂在費宥諒的臺灣教堂中並非固定元素，經費、信眾人數的多寡，及擴展可能性等，都決定它是否有存在的必要。如此一來，便可理解天使之后堂作為新營方濟會總院的天主堂，具有獨立洗禮堂的合理性與昭告性，同時也彰顯出亞瑟神父「教堂設計臣服於宣教」的理念。[183]

（5）鸞山天主堂

費宥諒在1961年設計鸞山禮拜堂時，共繪有兩個版本。除了前文提及的東方風格造形之外（圖37），另一個版本則是現代味十足的幾何立方形式（圖66）。[184] 在空間格局上，聖壇區深入會眾區，淺台上的祭桌則非常接近會眾席；這樣的格局反映出與另一方案截然不同的禮儀象徵。在東方風格版本中，聖壇緊鄰壁面，司鐸與會眾一致面朝祭桌，象徵了舒瓦茲教堂建築理論中的

---

[181] Charles Freuler, SMB, “Is Adoption of Church Architecture a Misunderstood Ideal?” pp. 54-56; 61頁附圖資訊中的地名錯誤，不是Hsinchu〔新竹〕，應是Hsingying〔新營〕; Karl Freuler, “Vom Kirchenbauen in der Mission. Gedanken Eines Priester-Architekten,” p. 172.

[182] “*Die Kirche in Hsin-Ying ist geräuming, einfach und würdig, in Raumgestaltung und Einrichtung klar auf das hl. Opfer und den Altar ausgerichtet. Ein baulich abgetrennter Marienseitengang, in dem auch die Beichtstuehle stehen, stört die Einheit der Kirche nicht. Ausserhalb der Kirche, und zwar vor dem Eingang ist die gerade für die Mission so bedeutsame eigene Taufkapelle. Nun, die Kirche ist ja in der Heimat durch Photos ziemlich bekannt*.”; Landolf Wißkirchen, “Auf Fahrt in den Fernen Osten,” *Rhenania Franciscana*, 17.3 (1964), p. 141.

[183] Hildebrand Yaiser, O.S.B., “The Liturgy as a Basis for New Churches in Japan,” p. 79.

[184] 此設計圖並未落實興建。*Pläne von Karl Freuler*. Luzern Staatsarchiv.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朝聖旅途」意象；在現代幾何造形版中，聖壇在近正方平面裡幾乎位於中央，司鐸在彌撒時面對會眾，一如設計圖中的標註：「聖壇面對會眾」，強調出舒瓦茲理論中聖壇是信徒從世界走向天家的「門檻」意象。在外觀上，平屋頂門廊、教堂主體，與立方鐘樓形成立面與側面的不同層次；而規律的矩格窗戶也形塑出強烈的幾何性，可看出大溪、花蓮主教座堂，與新營天使之后堂的影子。

大溪、花蓮主教座堂、天使之后堂，與鸞山禮拜堂的這種白色立方堆疊結構、鏤空鐘樓形式、內部空間格局及結構，與所展現的嚴謹簡明風格，也見於費氏在日本的教堂，如小名濱市的聖施洗約翰堂（1956）（圖67）、京都衣笠的聖靈堂（1958）（圖68）、東京澀谷區的聖道明會修道院天主堂（1958）（圖69），與東京司教區神學院等（圖70a-b）。這些教堂都反映出瑞士「新建築」的美學特色，以及瑞士自1930年代以來呼應禮儀改革運動的現代教堂空間格局。室內外露的柱樑框架結構營造空間秩序與韻律感、維持主要禮儀空間的統一性、隔絕外界的高聳封閉牆面，與聖壇的核心角色等，都是1930年代以來重要教堂建築師，如Schütz、Dreyer、Metzger、Baur等人的建築語彙。[185]

4. 金崙（1956）、都歷（1956）、泰源（1956）、尚武（1956）、大鳥天主堂（1962）

除了上述立方樣式之外，費宥諒的作品中也有著利用多元幾何形體組合的嘗試，舉凡單坡斜頂、梯形、或圓弧造形元素等，都在其列。

（1）金崙、都歷天主堂

1954年錫質平神父在金崙買下一座茅草屋做為臨時教堂，1956年胡恩博神父籌建新堂，費宥諒的設計圖完成於1956年1月（圖71a），新堂在同年9月祝

[185] Fabrizio Brentini, *Bauen für die Kirche*, pp. 69-76, 84-94, 10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聖啟用（圖71b-c）。⑱⑥「金崙教堂位置極佳。可以開車環繞它一圈。教堂位於一片綠野風景中，四周高大的椰子樹襯托出其全白樣貌。」⑱⑦ 教堂主體由近正方形平面的會眾空間與外突的圓弧後殿所組成，矩形平面的聖器室則依附在南面。室內的方柱列將教堂區隔為三廊等寬的空間，內縮、外突的聖壇區與中廊連貫融合。屋頂外露的長方筋樑與柱列所形成的格狀框架賦予整體空間一種幾何性的秩序感。⑱⑧ 圓弧後殿兩側壁面上的多個方格小窗讓此空間在點點光束效果下顯得尤其特殊（圖71d）。聖壇區特殊的造形、窗形與採光，都有效地凸顯此空間的重要。在外觀上，單坡頂的教堂形式讓聖壇區成為至高點，呼應了此空間的核心地位。白色壁面上的縱向長窗、半圓後殿兩側壁面上高低錯落的九個方孔小窗等幾何元素，與聳立的十字架是外觀上唯一的點綴，整體建築顯得簡樸、節制。

> 這個符合現代建築形式的新教堂由鋼筋混凝土建構，適合當地氣候，並符合禮儀改革運動的訴求。教堂後方〔大門〕可完全打開，好讓那些無法進入教堂內的上百人群也能參與主日崇拜。⑱⑨

白冷會神父費道宏（Patrick Veil）的評論點出了此教堂設計的三個重點：建材結構的選擇因應了防震抗颱的需要、空間格局的安排符合了禮儀精神，而彈性空間的設計順應了當地宣教發展。

---

⑱⑥ 金崙天主堂於2001年再度重建，2007年落成，費氏教堂不復存。趙川明，《後山傳愛》，頁 254-255、258。

⑱⑦ "*Djin-lun hat die wunderbarst gelegene Kirche. Man umfährt sie mit dem Autobus von allen Seiten. Die Kirche ist in grüner Landschaft und inmitten von hohen Palmen ganz in Weiss gehalten*."; Patrick Veil, "Weitere Nachrichten aus Formosa," p. 79.

⑱⑧ 圖片可參見張志豪，《花東地區天主教教堂建築研究》，頁70。

⑱⑨ "*Die neuen Kirchen – in Beton ausgeführt suchen der modernen Bauweise zu entsprechen, dem Klima und den Verhältnissen gerecht zu werden und auch der liturgischen Bewegung entgegenzukommen. Die Kirchen können nach hinten ganz geöffnet werden, damit so einige hundert Menschen, die nicht in die Kirche hinein können, dem Gottesdienst beiwohnen können*."; Patrick Veil, "Weitere Nachrichten aus Formosa," p. 7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比金崙天主堂晚四天祝聖的都歷聖加拉天主堂有著幾乎與其相同的結構與造形（圖72），⑩ 但教堂長面的縱向窗戶分為上下兩層，上層的窗框、窗面與牆壁形成平直的壁面；下層的窗戶卻凹陷於牆體中，此一凹凸落差為全白的教堂帶來一絲活潑的光影明暗變化。⑪

（2）泰源天主堂

同年7月，費宥諒為臺東泰源地區設計的一座未具名教堂則有如單坡屋頂的金崙天主堂與傳統雙坡屋頂建築的嵌入結合（圖73a-b）。⑫ 此教堂有著常見的矩形平面、三廊格局與外突的半圓聖壇區；與中廊等寬的門廊及聖壇區烘托出中軸空間的連貫完整。側面大片格子窗的排列呼應著屋頂線條的起伏，而圓弧聖壇區的單坡屋頂與直排小方窗則強調此空間的特殊性。建築中的直線、稜角與圓弧，讓現代感十足的教堂在俐落中不失柔和。這種單坡與雙坡頂相結合的類似手法也見於同年費氏在日本的三重縣四日市市聖母堂（1956）（圖74a-b），它是費氏自認最美的作品之一。⑬ 此教堂由美國馬利諾遣使會（American Maryknoll Society）委託設計，在經費充裕的前提下，規模比臺東的天主堂更為複雜龐大。

（3）尚武天主堂

1956年1月費宥諒方完成單坡頂金崙天主堂的設計，緊接著在2月5日完成

⑩ 都歷天主堂於1956年9月7日落成祝聖。1976年另建傅義修士設計的新堂。在茵夢湖白冷會檔案室的都歷天主堂歷史照片上no.1163註明此教堂為費宥諒所設計。瑞士茵夢湖白冷會檔案室；趙川明，《後山傳愛》，頁162-163。

⑪ 如今都歷舊堂已作為儲物空間，內部隔間、天花板等有多處更改，難以判斷室內結構原貌。

⑫ 目前難以判定此一不具名教堂是否曾落實興築。設計圖落款時間為1956年7月31日。*Pläne von Karl Freuler*. Luzern Staatsarchiv.

⑬ 此教堂在1966年的一場大火中付之一炬。Fabrizio Brentini, *Karl Freuler*, pp. 44-4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尚武天主堂則展現出進一步的造形變化（圖75）。矩形平面的教堂有著常見的空間配置，如門廊、三廊格局、內縮外突的聖壇區，與擁有獨立入口的聖器室。費宥諒在設計圖上用「大廳」（"*Halle*"）一詞標示門廊，凸顯此空間相當程度的寬度與進深；此外，並在教堂左、中、右三個入口處的中央大門部位註記著「極少打開」（"s*elten offen*"）。[194] 這似乎都顯示，當入口三處大門全開時，門廊能成為額外延伸出的開放式聚會廳室，延續了知本天主堂以來的設計概念。此教堂以鋼筋混凝土骨架、水泥磚或紅磚為建材，[195] 門廊與教堂主體的斜頂反向而行，形成有如兩個單坡頂對接所組成的M字形建築。教堂下半部的成片方形窗格與上半部的厚實牆面形成對比，而聖壇區上方的圓窗與下方的厚實牆面則為此規律帶來變化。

（4）大鳥天主堂

1956年的尚武天主堂形式再現於費宥諒1961年的大鳥新堂設計（圖76a-c）。[196] 大鳥新堂的平面有如兩個對接的梯形，其中依序含括了門廊、單廳主廊、聖壇區與依附在其後方的聖器室；[197] 被註記為「有屋頂的前庭」（"*Gedeckter Vorplatz*"）的門廊在大門敞開時，就能讓聚會空間延長一個跨度。洗禮盆的預選位置有二：中軸線上與聖壇遙對的入口正前方，或聖壇區祭桌的附近（圖76c）；[198] 這兩種安排都強調了洗禮的重要，前者意在表達洗禮聖事是成為教會奧體的第一步，後者則反映出1950年代的新趨勢：有鑑於洗禮是信

[194] *Pläne von Karl Freuler*. Luzern Staatsarchiv.

[195] "*Ausfürhung: Betonrahmen. Zementblock od[er] Ziegel*"; 目前難以判定此設計是否曾落實興建。*Pläne von Karl Freuler*. Luzern Staatsarchiv.

[196] 前文曾提及改建於1955年的大鳥聖伯多祿堂因教友增加再度不敷使用，費宥諒在1961年4月20日設計完成的新堂於1962年竣工祝聖。現今大鳥天主堂與原貌出入頗大；趙川明，《後山傳愛》，頁 266；*Pläne von Karl Freuler*. Luzern Staatsarchiv.

[197] 原設計圖中祭桌後方通往聖器室的中央小門在1962年落成的大鳥新堂中被移至左側。

[198] 設計圖中註記著："*Taufstein ev[entuell] hinten X oder im Chor Y*"〔洗禮池或許在後方X標記處或聖壇區的Y標記處〕。費宥諒設計圖，臺東白冷會。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徒「新生」成為基督追隨者的第一件關鍵聖事，是進入教會與永生的門檻，因此洗禮應被納入主要禮儀空間中，成為信眾禮儀生活的一部分，以提醒信眾成為教會肢體的初衷與意義。[199] 在此一無柱單廳的教堂中，自門廊至會眾區三分之二處的空間在寬度與高度上逐漸縮減，加強了深遠感與集中往前的動勢；而後，複由此處漸高漸寬，讓聖壇區成為最高廣的空間，烘托出中央祭桌的焦點地位。屋頂的白色格子樑與其間的木質天花板（*Aufgehängte Holzdecke*）形成深淺顏色的交替，連同入口上方牆面上的彩色玻璃[200] 讓全白的空間不失活潑（圖76d）。在外觀上，教堂有著矩形立方門面，而門廊的五米高方柱、門柱、拉門上的矩格、壁面的小方格花磚，與屋頂上的十字架等，共同形塑出濃厚的幾何風格（圖76e）；教堂側面大幅外突的板柱在兼具遮陽板功能之餘，也讓平直的壁面有了明顯的凹凸變化，而幾乎與板柱等長的縱向格窗也加強了垂直線條所帶出的韻律感。大鳥新堂的整體外觀與尚武天主堂（圖75）類似，僅兩邊拉高的屋頂長度比例不同；此處有如展翅線條的V字形屋頂是否巧智性地影射地名「大鳥」，尚無法定論，但屋頂線條呼應山景的考量顯然含括其中。

在同時期的瑞士教堂中，少有與上述金崙、都歷、泰源，尚武、大鳥，與日本四日市市類似造形的教堂案例，這種樣式應是費氏個人創新、嘗試的類型；這可能也是為何他將日本四日市市天主堂視為最美創作之一，言下不無自豪之意。此外，金崙與都歷天主堂的形式也見於1966年興建的臺東永康聖若望天主堂，與鹿野寶華天主堂（圖77、78）。[201] 永康聖若望天主堂有著一個左右兩側開放式、如穿廊般的門廊空間，建築挑高自入口至聖壇區逐漸升高而形成單邊斜頂；大幅突出於外壁的板柱與凹凸有致的壁面等，則是大鳥新堂中的元素。永康與鹿野寶華天主堂的設計者身份至今不明，但它們與費氏教堂在白冷會傳教區內的影響可能不無關聯。

---

[199] Barbara Kahle, *Deutsche Kirchenbaukunst des 20. Jahrhunderts*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90), pp. 183-193.

[200] 設計圖上註記著「彩色玻璃！」（"*Bunter Glas!*"）；費宥諒設計圖，臺東白冷會。

[201] 寶華天主堂建於1966年，但隔年便因颱風而受損。趙川明，《後山傳愛》，頁13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5. 臺東宜灣和平之后堂（1960）

宜灣地區的開教始於1954年，1955年建蓋了第一間茅草屋教堂，由費宥諒設計的新堂則於1960年3月破土興建，同年10月21日落成祝聖。[202] 宜灣天主堂的平面由矩形門廊、橫向的橢圓形廳式會眾空間，與內縮、外凸的圓弧聖壇空間所組成（圖79a-c）。入口位於門廊側面，進入教堂後首入眼簾的是位於門廳中的聖洗池；穿透小格花磚的光線緩和了此一低矮空間的壓迫感，同時也強調了洗禮儀式帶有的重生與光明希望之意涵。會眾空間後半部成排的長窗自門廳兩側展開，讓空間顯得通亮輕盈（圖79d）；反之，會眾區前半部的封閉牆面讓光線強度隨著趨近聖壇而逐漸降低，微弱的光線自環繞會眾區一圈的帶狀高窗灑入室內，增添幽密之感。此種封閉隱密性在壁龕式的外凸半圓聖壇空間達到高峰，兩側縱向細長窗格讓祭桌浸淫在昏暗的光線中，並讓壁面上半隱沒在陰影中的耶穌苦像顯得尤其奧秘，引人遐思。教堂的開窗設計除了營造良好的通風效果，也讓空間中的光線自入口起由強而弱，由急至緩，有如心境上的由動而靜，最後集中在聖壇的幽暗與一絲微光中，獲得最後的沉澱。[203] 在外觀上，位於面海山丘上的白色教堂[204] 自門廳至十字架，展現出逐漸升高的層次，圓弧牆板在帶出塔樓意象的同時，也標記出教堂建築的核心空間位置。它除了是當地明顯地標之外，也呼應了周遭風景（圖79e）。[205] 門廳的小格花磚與V字形屋頂、會眾區牆面上排列半圈的直向格窗以及上方圍繞一圈的帶狀高窗，都表現出對稱規律與簡明的線條；而門廳與聚會廳的出挑屋簷、聖壇區上方凸出的圓弧牆板，則為工整的造形輪廓添加一絲活潑變化。[206]

---

[202] 費宥諒的宜灣教堂設計圖並未保留下來，但瑞士茵夢湖白冷會檔案室內的歷史照片no.1165上註記著“Freuler”的名字；趙川明，《後山傳愛》，頁216-220、301。

[203] 教堂內部如今漆為淺藍，不同於原本的全白空間。

[204] 根據歷史照片，教堂外觀原為白色，後來曾被漆為米白，如今則是灰色洗石子。

[205] 原本教堂後方的小丘在1963年史泰南神父就任後被移除，以改善雨水沖刷積水之患。趙川明，《後山傳愛》，頁221、301。

[206] 宜灣天主堂如今的門窗形式、材質與顏色皆不同於原貌：原本下方的長窗為木框格狀，現在則是金屬框的無格單扇窗戶；原本上方氣窗也是木框格狀，現改為橫條百葉窗。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在平面構思上，宜灣天主堂與費宥諒在日本的名古屋南山大學聖十字堂（1958）類似（圖80a），由聖言會委託設計的聖十字堂因經費充裕而在規模與結構複雜度上遠勝於宜灣天主堂。聖十字堂同樣建於山坡上，從街道而來時須通過台階進入一個小廣場，而後到達教堂（圖80b）；它一樣有著低矮的門廳，而後方是結合高聳鐘樓的入口通道；會眾區與聖壇區由兩個大小不同的橢圓交集而成，兩者有如對話般成為一個整體，又各自保有主體性；集中在會眾區的開窗讓聖壇區顯得相對陰暗幽秘，營造兩個空間的差異，而圈圍聖壇的座椅安排則凸顯出空間焦點所在。[207]

圓形向心式的現代教堂在瑞士天主教圈中並非具代表性的主導類型；也因此，費氏的宜灣和南山天主堂與同期瑞士的兩座教堂之相近則顯得特別有趣，它們分別是Metzger在蘇黎世的斐利克斯與瑞古拉教堂（Felix und Regula church, Zürich, 1950－1951）（圖81a-c），以及Baur在溫特圖爾市的聖羅倫斯教堂（St. Laurentius church, Winterthur- Wülflingen, 1957/59）（圖82a-c）。[208] 宜灣天主堂中不同高度層次的矩形門廳、橢圓教堂主體、環繞會眾區的帶狀高窗，入口處牆面的多窗高度採光（如Baur的聖羅倫斯教堂），或主堂部分明顯出挑的平頂屋簷等（圖81b-c）等，都見於這兩座教堂中。[209] 此外，Metzger自斐利克斯與瑞古拉教堂之後，進一步發展出的聖克勞斯天主堂（Bruder Klaus Kirche, Gerlafingen-Solothurn, 1956）（圖83a-b）除了將大小雙圓的概念稍加變化，在採光設計上也是讓教堂近入口的後半部空間充滿光線，而靠近聖壇區的前半部空間僅餘上方環繞一圈的細帶高窗，類似宜灣天主堂的形式。前文已闡述過Metzger與Baur兩人與費宥諒的關聯，加之斐利克斯與瑞古拉教堂及聖羅倫斯教堂不但因聖路加協會出版的刊物而聲名大噪，且是1954年東京攝影展中的作品，不難想像費宥

---

[207] Fabrizio Brentini, *Karl Freuler*, p. 12.

[208] Fabrizio Brentini, *Karl Freuler*, p. 12; Schweizer St. Lukasgesellschaft ed., *Kirchenabuten von Hermann Baur und Fritz Metzger*, pp. 52-55, 58-59, 134-135.

[209] 張志豪認為宜灣的弧形牆面象徵了基督與教友共融孕育於聖母子宮中，此看法顯然是根據Brentini對圓弧牆面的詮釋而來。然而費宥諒與當代歐洲現代教堂建築的論述卻鮮少談及建築元素的象徵意涵，而是多集中討論何種空間形式能更符合禮儀精神與需求；因此，宜灣天主堂的造形是否有聖母子宮的意像還有待商榷。張志豪，《花東地區天主教教堂建築研究》，頁156；Fabrizio Brentini, *Karl Freuler*, p. 1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諒在設計宜灣天主堂時，可能或多或少受到這兩座教堂的啟發。

6. 臺南中寮天主堂（1959）

除了上述的宜灣天主堂，費宥諒在1959年為德國方濟會所設計的中寮天主堂（圖84）也是費氏作品中少見的例子，[210] 其中融合了同時期下營與宜灣天主堂中的許多元素。[211] 中寮天主堂有著八角形向心式的平面，矩形外突的洗禮堂與半圓外突的聖壇區分別位於中軸兩端；圓形淺台與其中央的祭桌因著聖壇區特別的造形而被強調出來，然而一半的聖壇區探入八角形會眾空間的安排又讓兩者彼此相融，拉近了信眾對禮儀的參與感。一方面，大幅突出壁面的板柱、帶狀高窗搭配下方的空心磚牆面、聖壇及洗禮堂的空間配置等，都與下營天主堂類似（圖52）；另一方面，半圓外突的聖壇空間與其兩側的縱向細窗、聖壇區屋頂上方的圓弧牆板與十字架等，則見於宜灣天主堂（圖79a-c）。費宥諒的這個設計因某些不明原因而並未被落實；但方濟會後來在1965年所興建的果毅天主堂（圖85a-c）卻高度重現了費氏中寮天主堂的設計：其平面是費氏中寮天主堂設計圖左右方向對調的結果，其中的帶狀高窗也被保留下來，而平屋頂門廊則被轉換為柱廊，空心磚牆面則被轉化為正面（façade）的小格玻璃牆。這樣的高度雷同無疑證明了費宥諒的設計在方濟會新堂建蓋上的後續影響。[212]

7. 臺東烏石鼻天主堂（1962）

費宥諒在1962年完成的烏石鼻天主堂（圖86a）可被視為中寮天主堂的延

[210] 出於不明原因，中寮天主堂並未根據費宥諒的設計興建。

[211] 下營的設計圖日期是1959年9月25日，中寮的設計圖日期是1959年10月8日，宜灣天主堂的設計圖下落不明，但從教堂1960年3月破土興建回推，其設計應在1959年末左右完成。

[212] 費宥諒的中寮天主堂設計圖中並未標示座椅的排列方式，但根據果毅天主堂的情形來看，極可能仍以長軸概念排列於中央走道兩側。有關果毅天主堂的討論可參閱于禮本，〈德國與臺灣的相會：1950-1970德國科倫方濟會省在臺南新營教區的教堂建築〉，頁64-6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伸變化。[213] 這座1963年落成祝聖的教堂是費宥諒在臺灣唯一落實的向心式教堂。[214] 它的平面類似中寮天主堂，但內部空間由兩個同心八角形組成；外突的平頂屋簷與後推的梯形門廊拉長了從外界進入禮儀空間的轉折區，門廊兩側壁面上飾有天使形象的鑲嵌畫，[215] 預告了大門後的挑高神聖空間。梯形的聖壇區融入了八角形的會眾區，相當接近空間中心，體現出禮儀精神中「共同體」與「環繞聖壇」的理念；而它與入口直線相對的方位也傳達出「朝聖旅途」的意象。緊鄰在聖壇區後方的聖器室則位於八角形迴廊的一環，兼顧出入方便與維持主要禮儀空間完整性的考量。同樣的，告解空間則位於緊鄰入口的右側迴廊角落，既不干擾主要禮儀的進行，也保有告解者出入的私密性。在外觀上，教堂有如由兩個大小不同的八角柱體重疊而成，出挑的平頂屋簷在陽光下加深了結構的凹凸特色，加之全白的外觀與方格小窗，形塑出濃厚的現代理性風格（圖86b-c）。教堂主體上方有著圍繞聚會空間一圈的三排方孔小窗，與下方較大的矩格窗戶形成下重上輕的對比；成排的方孔高窗顯然能讓內部中央挑高的聚會空間因著從上方而來的細碎光束而充滿一種神聖天啟的氛圍。烏石鼻的窗戶設計還有一個別於以往的地方：「上方的玻璃小窗只有最下面一排可打開，或完全封死」、「〔下方較大的〕窗戶向內打開，外部的百葉窗板向外打開」；[216] 這些顯然都是因應當地臨海風雨天候而進行的加固措施。令人玩味的是，烏石鼻天主堂的樣貌到底是一種純粹幾何形式的變化創新，或是將東亞傳統建築元素（重簷八脊攢頂）加以「現代化」的嘗試？果真費宥諒的另一張草圖（圖86d）展現了他在發想過程中的不同思索：東方傳統建築造形搭配聖壇位於向心式空間中央的形式，與西方傳統三廊長軸空間搭配外凸聖壇區等。

---

[213] 費宥諒的教堂已被1996年的新堂取代。Bethlehem Mission Immensee (SMB), Archiv, A 394.03；趙川明，《後山傳愛》，頁223-224。

[214] 中寮天主堂的設計雖在1959年完成，但並未建蓋；而複製中寮天主堂設計的果毅天主堂則建於1965年。*Pläne von Karl Freuler*. Luzern Staatsarchiv; 趙川明，《後山傳愛》，頁301。

[215] 設計圖上標記著 "*Engelmosaik*"; *Pläne von Karl Freuler*. Luzern Staatsarchiv Luzern.

[216] 從歷史照片中無法研判是否有落實原本的窗戶設計。原設計圖上標記著："*oben Fenster nur die unterste Reihe öffnen, oder gar keine!*"; "*Fenster innen öffnen; Fensterladen aussen öffnen*."; *Pläne von Karl Freuler*. Luzern Staatsarchiv.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最終，烏石鼻天主堂所呈現的是東方元素被簡化為西方現代建築幾何語彙的形式，這或許可被理解為他在文化涵化建築上「取其精神而非外觀」的原則，以及他在設計圖上的註記之意：「教堂應建在街道右邊，以凸顯極強烈與宏偉的效果。教堂如以往採取非常簡單的結構系統，不會產生太大的應力。」[217] 此處的「強烈與宏偉」似乎一方面指涉了白色、簡潔俐落的現代造形無疑將成為顯著的地標；而另一方面，模糊源自東亞寺殿建築的意像或可喚起當地民眾對宏偉性的聯想，但同時並無礙於它作為教堂建築的明確性。

在費宥諒的設計裡，繼1959年的中寮天主堂與1962年的烏石鼻天主堂之後，1964年的日本八日市市（Yokaichi）教堂（圖87），與福島縣勿來市聖約瑟禮拜堂（1965）中的座椅安排都是三面朝著聖壇的配置；[218] 而1966年的伊勢市聖多瑪小崎教會（圖88a-b）則在平面、座椅安排、聖壇區的玻璃牆，與外形等，與瑞士建築師摩澤爾（Werner Max Moser，1896－1970）在日內瓦的新使徒教堂（New Apostolic Church, Genf, 1950）（圖89a-b）極為接近。[219] 費宥諒在臺灣與日本的這五座教堂明顯反映出向心式教堂自1950年代開始在歐洲大受青睞的趨勢，以及瑞士現代教堂對他的持續影響。然而，烏石鼻天主堂之所以別具意義，是因為無論從時序關係、缺乏能與之比擬的歐洲案例，以及造形設計等角度觀之，它極可能是費氏此種教堂類型的發軔，且在樣式上明顯不同於之前

[217] "*Lieber Ernst, hier ein Entwurf für Ushebi. Man sollte die Kirche R[echts] v[on] Axe des Weges lassen. Dann wirkt das Ganze sehr stark und monumental. Die Konstruktion ist wieder sehr einfach und die Spannungen nicht zu gross….*"; *Pläne von Karl Freuler*. Luzern Staatsarchiv.

[218] 費宥諒在東京六本木區的聖方濟教堂（St. Franziskus in Tokyo-Roppongi, 1962-1966）也有圍繞聖壇三面的座椅配置，但不確定現今這種形式是否符合原貌。Beate Löffler, *Fremd und Eigen*, pp. 219-220; Fabrizio Brentini, *Karl Freuler*, pp. 110-113; 張志豪，《花東地區天主教教堂建築研究》，頁156。

[219] Fabrizio Brentini, *Karl Freuler*, p. 21; Beate Löffler, *Fremd und Eigen*, p. 219; "Neuapostolische Kirche in Genf: 1949/50, Haefeli, Moser, Steyer, Architekten BSA/SIA, Zürich; Örtliche Bauleitung F. Quétant, Architekt BSA,Genf," *Das Werk*, 39 (1952), pp. 41-4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置入片段東亞建築元素之方式，而是帶有濃厚個人創意的文化涵化新形式。

（四）費宥諒神父的空間觀

綜上所述，費宥諒的教堂在平面形式上變化並不多，最常見的是矩形長軸走向的空間；自1959年左右開始，才出現較為多元的雙圓、多角，與向心式設計。而這些平面設計與空間格局如何反映禮儀精神，也就是費宥諒教堂設計的核心思考，則可從幾個面向來看。首先，凸顯聖壇區的常見手法有：抬高的淺台、透過側窗採光以凸顯此空間的明亮與神聖性，以及對比相形昏暗的會眾區。雖然偶見幽暗聖壇區對比明亮會眾區的情形，如宜灣天主堂，但明顯屬於特例；畢竟在禮儀改革訴求中，教堂的設計要能方便會眾觀看、並參與聖祭禮。其次，當聖壇區與會眾區透過光線或材質暗示出彼此有所區隔的同時，形塑這兩個區域相容為一完整空間的印象也極為重要，以強調信眾共融、共為一體。此時，費氏常用的手法則有：與會眾區（中廊）同寬的聖壇區，往往同時搭配了低矮的側廊以維護主要禮儀空間的完整性；或者透過貫穿會眾區、導向聖壇區的天花板、屋架、柱列，與柱樑結構框架等，以營造空間中連貫的韻律感與統一性。而這些手法基本上可被視為是他在1954年東京的瑞士現代教堂建築展演講內容的再現。

在禮儀改革的基督中心論中，聖壇區裡的聖壇（祭桌）是教堂空間的焦點，而它在費氏設計中的位置並不統一，有時緊鄰壁面，有時離壁前移，且往會眾方向前挪的幅度時大時小。首先，聖壇緊鄰壁面的案例並不算多，所出現的時段分佈也相當平均，從1955年到1965年之間皆有例可循；當中又以嵌入主廊內的聖壇空間形式居多。⑳ 反之，聖壇離壁一米內的案例數量最多，分佈時段也是自1954年到1965年都有；其中，又以聖壇空間外凸的形式居多；這種外突的後殿形式顯然為聖壇區提供了較充裕的空間，可讓聖壇往會眾區前移而不

⑳ 設計圖中明確標示出聖壇位置者共計30例。在7件聖壇緊鄰壁面的例子中（堂口小禮拜堂、Bali、知本、新城、臺東培質院、鸞山、臺東白冷會院），外凸聖壇空間形式者有2例，內嵌主廊空間形式者有5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影響兩個空間的合宜關係。㉑ 最後，聖壇明顯大幅往會眾區挪移至幾乎與其相接，或甚至接近教堂中心位置的案例數量最少，且出現的時間明顯較晚，多集中在1959年到1965年之間；其中，又以聖壇空間內嵌於主廊空間的形式居多，包括向心式的烏石鼻天主堂。㉒ 可以確定的是，無論聖壇是緊鄰或微離壁面，它們在費氏以矩形長軸式空間類型居多的教堂中，多呈現前述舒瓦茲理論中的「神聖之旅」意象；這種空間安排也是最接近傳統教堂空間的一種，但在現代教堂發展中被賦予了新的意義。相形之下，與傳統單一中軸走道形式差異較大的T形動線匯集於聖壇的「神聖的啟程」類型在費氏作品中僅出現過一次；而聖壇位於向心式空間中央的「神聖的環繞」類型也僅以隱約的形式出現在1962年的烏石鼻天柱堂，但終究沒有跨出最後一步，被安置在教堂正中央。當德國的現代教堂設計自1930年代開始便陸續出現聖壇極近會眾區的形式、並自1950年起日益普遍時，瑞士的現代教堂建築明顯偏向矩形長軸式空間，將聖壇置於中央的例子即便在1950年代也相當少見。費宥諒的禮儀空間構思明顯與瑞士的發展緊密相連，自1959年才開始零星出現融入會眾區的聖壇位置與向心式空間，這也說明了他在設計上的保守傾向。這種作法是出自費氏個人選擇，或是順應當地修會人士、堂區神父意見而來，尚無法定論。然而，若綜合海外宣教、偏小的教堂規模、節省經費、簡易建蓋等角度來看，教堂的外觀、平面、聖壇的位置等，是否呈現出最「前衛」、或最多變豐富的形式，顯然不是首要考量；如何確保將福傳內容無誤、清楚、喚起認同情感地傳達給當地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民眾，才是更重要的訴求。即便偏遠地域如臺東可提供教堂設計一個極佳的實驗地，而這也或多或少可從費氏教堂多變的外形中看出，但基於福傳教育目的，牽涉到表達禮儀內容的空間安排時，中庸之道似乎是個更好的選擇。最後，正也是這種福傳教育及文化順應的動機主導了費宥諒在材質與樣式上的設計。一方面，他嘗試利用當地傳統建材，如木條板材、竹材、木頭柱樑，與磚材等，以扣合風俗民情；另一方面，鋼筋混凝土的使用則兼具反映時代精神、

㉑ 在聖壇離壁一米內的18件案例中，外凸聖壇空間形式者有11例，內嵌主廊空間形式者有7例。

㉒ 在聖壇大幅往會眾區挪移的5件案例中（下營、宜灣、鸞山、烏石鼻、鹿野學生中心禮拜堂），外凸聖壇空間形式僅有1例，內嵌主廊空間形式者則有4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樹立現代建築風格典範，以及因應地震、颱風氣候等實際考量。在樣式上，鸞山天主堂的東方風味與現代性的兩個設計版本則是很好的例子，彰顯出他遊走在此兩大原則之間的思路。

四、費氏教堂的發展與其臺、日作品之異同

若要讓費氏的臺灣教堂在其個人創作發展中的定位明晰，則勢必需將它們放入整體作品的脈絡中，方能具體認知。而其中最關鍵的，便是他在日本的上百件教堂作品。從研究材料的龐大規模而言，費氏臺、日教堂異同之詳盡分析實屬另一獨立的研究課題；因此，本文在礙於篇幅限制下，僅先勾勒一個初步觀察。

從費宥諒教堂設計的發展來看，非專業建築師的「素人」背景、在瑞士並無設計教堂的實際經驗，以及海外宣教神職身份的定位等，讓他自1949年在日本開始設計教堂起，作品就呈現多元樣貌，這無非反映出他的多方摸索嘗試，也因此在明顯借鏡歐洲範例的許多設計中，不乏曇花一現的例子，如具有類似多米尼庫斯・波姆教堂中拔地而起尖拱框架的聖彌迦勒教堂（St. Michael, Minami-Rinkan, 1952），與新城天主堂的巨大圓錐頂鐘樓等。[223]

> 作為歐洲教堂建築的新手，我必須在最初的學習訓練階段遵循歐洲教堂建築的發展，直到數年之後找到自己的方向，讓西方特色退居後位，而東方特色低調但決定性地展現眼前。[224]

> 〔我的創作歷程是〕從初期的理性、低調，經過中期的大膽進展，直到〔京都〕主教座堂的整體藝術。[225]

---

[223] Beate Löffer, *Fremd und Eigen*, p. 215.

[224] 原文參見附錄四；Karl Freuler, *Persoenliche Gedanken*, pp. 1-2, 4.

[225] 「整體藝術」（Gesamtkunstwerk）是指教堂建築與其內的座椅、聖壇、華蓋、用器、燈座等都有著統一設計風格；能進行整體藝術的建築師在歐洲建築傳統中代表著特別的成就。原文參見附錄四；Karl Freuler, *Persoenliche Gedanken*, pp. 1-2, 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如費宥諒自述，引導他尋找「新方向」的一個推動力便是海外宣教背景下的文化涵化思考。這個理念雖在他開始設計教堂時便已存在，但直到1950年代初方見較為明確、固定的實踐模式，例如透過當地傳統材質、東亞傳統建築元素的挪用，以及它們與西方幾何樣式的結合等；此類教堂在日本與臺灣都有不少例子。而同時並存的，則還有他在處理經費較充裕、或規模較大的教堂設計時所依循的1930－1950年代瑞士現代鋼筋混凝土教堂建築形式。㉖ 這固然與日、臺的地震、颱風地理氣候特質有關，但也因為費宥諒認為，嚴謹的幾何造形可作為現代西方與東亞傳統建築的共通語彙。簡潔的框架結構，或耀眼的白色立方造形、類似積木系統的堆疊組合、多段式立面或側面的特色、常保持平整的建築正面等，讓其作品有著節制的變化，而不流於誇張賣弄。在費宥諒成熟運用新客觀主義（Neue Sachlichkeit）風格的同時，正值歐洲個人主義濃厚的雕塑性建築興起之際，且迎來較保守的「新建築」陣營之譏諷，認為是一種理性精神的崩塌。㉗ 費宥諒並未受此新風氣的影響，一如傅義修士曾打趣的評論：「他就是個方塊！」㉘ 在這種「保守」作風的背後，究其因，或許仍源自他尋求一種東、西方文化精神能有所交集之建築表現的堅持。費氏這種方正規矩的教堂作品被Brentini認為是最具說服力的一種，在日本與臺灣的數量都相當多，成為日、臺兩地教堂具有同質性的代表。費氏現代幾何樣式教堂中在平面與外觀的新變化，如雙橢圓交集、正方、與多角向心式等，則從1958/59年開始明顯可察，呼應了禮儀改革運動的勝利，並預示了未來梵二公會後的教堂設計趨勢。

費宥諒生平最後一個教堂設計是日本京都主教座堂（1968）（圖90a-c），它是唯一沒有經費侷限的委託案，也被認為是他最成熟的一件整體藝術作品。此教堂有著簡單的矩形平面，與寬敞的單廳空間，聖壇區與長邊的牆面瓦解為成片的彩繪玻璃。聖壇區有著大理石與花崗岩所形成的正方形矮台，此區約佔

㉖ Karl Freuler, “Accommodation of Church Architecture in Japan. Some Suggestion,” p. 229.

㉗ Fabrizio Brentini, *Karl Freuler*, p. 13.

㉘ “*Er ist ein Klotz (viereckig)*!”; 2013年9月4日在瑞士白冷會茵夢湖（Immensee）會院中訪談Julius Felder。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整體面積的三分之一，並深入主要空間，反映出梵二公會後的禮儀空間趨勢。教堂外觀上最顯著的標誌便是上揚的帳幕狀屋頂。[229] 費宥諒認為此設計的特色在於符合現代建築風格、凸顯玻璃與鋼筋混凝土等建材的優勢，並融入日本傳統建築中清楚、簡單、烘托材質性的原則。[230]

> 不知不覺中，我採用了一種類似日本農舍的形式。至少日本人曾高興地這麼對我說……在外觀上，主教座堂有如一個珍貴的容器，幾乎如同一個大型的聖物盒。屋頂則用金色的鋁片覆蓋。[231]

教堂做為「容器」的概念自舒瓦茲以來，也常出現在費宥諒的設計描述中；它暗示了所盛裝「聖物」的神聖性，也就是空間內象徵基督的聖壇、崇拜禮儀，及參與的信眾；這是費宥諒始終如一的信念，也是啟發其藝術手法的源頭之一。至於設計者心中的基督教藝術傳統意象[232] 在接收者眼中被轉化為本土傳統聯想，則是東、西方文化交會中一種始料未然的巧合。京都主教座堂的另一特色在於內部的整體藝術設計，舉凡地板、座椅、證道台、洗禮盆、雕刻、彩繪玻璃、燈具等，在材質、顏色、風格與彼此的搭配上，都顯得簡樸而隆重，圓融與和諧。在費氏的教堂設計中，他對「教堂藝術」的著墨並不多，明顯的改

---

[229] Beate Löffler, *Fremd und Eigen*, p. 220; Hans Holstein, *Bethlehem Mission in Japan*, p. 182; Fabrizio Brentini, *Karl Freuler*, pp. 116-123.

[230] Brentini認為費氏京都主教座堂的弧線屋頂是受到丹下健三1964年國立代代木競技場與東京聖母主教座堂的影響；但筆者認為，更大的可能是兩人皆採取了融合荷蘭結構主義、現代主義，與日本傳統建築風格的取徑；Beate Löffler, *Fremd und Eigen*, p. 220; Hans Holstein, *Bethlehem Mission in Japan*, p. 182; Fabrizio Brentini, *Karl Freuler*, pp. 14, 116-123.

[231] "I*ch kam unbewußt zu einer Form, die an ein altes japanisches Bauernhaus erinnern könnte. Die Japaner haben das wenigstens freudig erwähnt….Von außen macht die Kathedrale den Eindruck eines kostbaren Gefäßes, fast den eines großen Reliquiars. Für das Dach wurden goldfarben wirkende Aluminiumfolien verwandt*. "; Franz Wirz SMB, Fritz Kollbrunner SMB, "Neue Kathedrale von Kyoto. Interview mit dem Architekten Karl Freuler," *Bethlehem*, 5 (1968), pp. 232-233.

[232] 在基督教藝術傳統中，聖物盒自中古早期以來便常以教堂建築的造形出現。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變則始自1950年代晚期；牆面結構、建材、窗戶造形、採光、與禮儀家具（聖壇、洗禮盆、講台、座椅、聖體櫃等）等融合為一個整體的例子首見於1958年的南山聖十字堂聖壇區，繼有福島－勿来駅（Nakoso－Fukushima）天主堂的聖壇區，以及最後京都主教座堂整體空間所展現的細緻洗鍊。㉝

回顧上述費氏整體作品發展，乍看之下，其臺灣教堂與日本教堂的腳步相當一致；兩地教堂在內部格局上也常相差無幾，這顯然是以禮儀精神為原則使然。費宥諒在1954年才開始為臺灣設計教堂，他之前在日本的六年歷練無疑讓其設計更趨穩定成熟，而費氏在臺灣的教堂在多元樣貌與發展上，的確也反映出他沿用自身日本經驗的作法。然而，在他的臺灣教堂中，也出現了頗具獨特性、未見於其日本教堂的設計，如金崙、泰源、尚武、大鳥、中寮、烏石鼻等。其中，1959年的中寮天主堂與1962年的烏石鼻天主堂的向心式平面更是先日本地區一步；而烏石鼻天主堂似乎已展現費宥諒最後在京都主教座堂的發展趨勢：在融合東亞傳統建築意象與歐洲現代主義的簡明俐落之餘，粗獷、示意性的線條也脫離了「東方古典建築」中的複雜精緻與現代建築的平整規矩；在此，不再只是東、西方元素的折衷組合，而是轉化後的新形式。這或許就是費宥諒自述中所說的：「東方特色低調但決定性地展現眼前。」㉞ 臺灣的這些小型教堂相較於費宥諒在日本的作品，似乎流露出更活潑的一面；「荒郊野外」的臺東無非提供了一個極好的實驗地，此處的教堂似乎更能清楚地展現設計者多方嘗試的企圖。費宥諒自述中所說的「中期的大膽進展」似乎在這些臺灣教堂中更充分、密集地被彰顯出來，成為費宥諒在教堂設計上尋求突破的珍貴註腳。㉟

㉝ Fabrizio Brentini, *Karl Freuler*, p. 13; Beate Löffler, *Fremd und Eigen*, p. 220.

㉞ 原文參見附錄四；Karl Freuler, *Persoenliche Gedanken*, pp. 1-2, 4.

㉟ 瑞士母會刊物中有關臺灣宣教的討論多集中在禮儀、語言、服裝上，對教堂建築全無討論，費宥諒作為設計者可能有相當高的主導權。Jakob Baumgartner ed., *Vermittlung zwischenkirchlicher Gemeinschaft. 50 Jahre Missionsgesellschaft Bethlehem Immensee* (Immensee: Neue Zeitschrift für Missionswissenschaft, 1971); Jacob Baumgartner ed., *Missionswissenschaft im Dienste der Weltkirche. 25. Jahre Neue Zeitschrift für Missionswissenschaft* (Schöneck: Administration der Neuen Zeitschrift für Missionswissenschaft, 197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從費氏教堂在日本與臺灣對當代與後續教堂建築發展所發揮的影響來看，兩地的情形也不盡相同。究其因，無非與教堂的所在地、委託方的經濟狀況、設計者本身對當地環境與文化習俗的熟悉度、教堂施工組織，與施工團隊性質等因素有關。費宥諒在日本的教堂多坐落在城鎮與都會，且駐日的德國與美國修會組織多半擁有較雄厚的資金，因此費氏在日本的一些教堂亦能展現出與歐洲教堂旗鼓相當的設計，如德國聖言會（Steyler Mission）在名古屋買下整個山丘為建地，並在地勢最高處建蓋做為整個區域中心的南山聖十字堂。㉟ 這種規模大、具一定複雜度的設計之所以能落實，也得利於專業工程團隊的配合。費宥諒在日本長年來都與市野修（Ichino Sakae）在1947年成立的親建會工務所（Shinken-kai）合作，並將之比擬為中古世紀的建築工坊（Bauhütte），讓他在這20年中得以與同樣的木工、石匠、水電工與工程師等進行默契無間的合作。㊲ 親建會工務所直至1990年為止，仍持續進行帶有費氏風格的教堂設計，㊳使費氏風格的教堂在日本的分佈廣度與持久性都遠超乎想像。

反觀費宥諒在臺灣的教堂，多坐落在白冷會所在偏遠山區的原住民部落，且白冷會所能支付的經費相當有限。此外，費宥諒來臺次數甚少，且停留為期甚短，㊴ 往往僅是前來考察建地與商討教堂設計事宜。最後，他對原住民與閩南文化並不熟悉，亦鮮少能在建蓋過程中親自監工，也無固定施工班底，而是多由當地教友協助完成。上述種種都導致臺灣的教堂在結構的複雜度上有其侷限，且無一能展現「整體藝術」的特質。在地域及時間性的影響上，費宥諒在臺灣的教堂樣式即便在白冷會與方濟會轄區內出現「複製」現象，但分佈地不出花東與當時的臺南縣範圍。究其因，臺灣的「費氏風格」教堂之所以在1970年便畫上休止符，一是因為臺灣天主教人口自1960年代中葉起增長速度減緩，興築教堂需求不再；二是因為1965年梵二公會後，教廷提倡的教會本土化風潮

㉟ Fabrizio Brentini, *Karl Freuler*, p. 10.

㊲ Karl Freuler, *Persoenliche Gedanken*, p. 5.

㊳ 諸多例子與圖片可參照《株式会社親建会工務所》2014年7月，<http://www.shinkenkai.jp/works/>（2014年12月8日檢索）。

㊴ 他在1955年11月暫往臺灣，進行教堂設計相關工作；Hans Holenstein, *Bethlehem Mission in Japan*, p. 6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帶動了中國古典風格與原住民色彩鮮明的教堂造形與裝飾，[240] 這都讓簡樸俐落的歐洲現代教堂風格逐漸模糊、淡出記憶。

最後一個日、臺兩地教堂的差異則顯露在文化涵化理念的實踐上。相形於費宥諒在日本的作品，臺灣的文化涵化教堂設計顯得模糊且不乏矛盾。首先，費氏的日本經驗顯然主導了他的「東方」概念，其中的「中國」元素相形微弱，[241] 而能凸顯臺灣或原住民文化的形式則幾無蹤影，頂多「福爾摩沙小教堂」的竹牆結構或許能勉強成為一例。另一矛盾則出現在教堂樣式與地域文化的關係。若說鹽水聖神堂因坐落在以閩南居民為主的村鎮而擁有日式或中式造形，則尚有其合理性；但作為原住民地區宣教重鎮的馬蘭聖若瑟堂與鸞山天主堂為何被賦予「東方古典樣式」，就令人費解。費宥諒與白冷會對這兩座教堂並無清楚評論，且後續也不再出現類似樣式的教堂。這是否意味著費宥諒對此種建築語彙的說服力仍有遲疑，又或者是否他對中國、或日本風格教堂在原住民文化區的合宜性有所察覺，則難以得知；但他後來多選擇熟悉的歐洲現代教堂建築風格，則是不爭的事實。[242] 當然，這樣的發展不能僅歸於設計者的個人意志，而是還與堂區神父的喜好、本土信眾對東方傳統風格的態度、對西方現代風格的反應、以及教堂建築的文化涵化議題在臺灣西方神職人員討論中的邊緣化等因素有關。一方面，本土信眾對西方形式往往充滿好奇與接納，相形之下，對中國化的基督教藝術並未特別熱衷；就如費主教曾說，他自己覺得花蓮美崙天主堂的現代造形有些單調，但它卻頗受年輕人的歡迎；而歐思定修士（Augustin Buechel）也曾提及，白冷會起初曾嘗試推廣畫家劉河北女士所繪製的中國風聖母像，以增進民眾對天主教的親切感，但後來因發現此舉並未發揮

[240] 張志豪，《花東地區天主教教堂建築研究》，頁149-150；傅朝卿，〈戰後中國古典式樣新建築〉。《臺灣建築史課程講義》。<http://www.fu-chaoching.idv.tw/file/class/ca_06.pdf>（2014/10/12檢索）

[241] 例如臺北聖母堂（1954）的中式花窗。

[242] 張志豪認為此類型建築帶有進步的象徵，這樣的詮釋與費宥諒的設計理念並不符合；然而它們在當地居民眼中所代表的「新奇」的確有可能含括這一層面的意義。張志豪，《花東地區天主教教堂建築研究》，頁4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預期效果而作罷。[243] 另一方面，在瑞士母會刊物中有關臺灣的討論多集中在禮儀語言、本土化的祭袍樣式與聖歌、原住民的文化上，極少涉及教堂建築，亦無具普遍共識的規範。最後，臺東地區多以原住民為主，「東方風格」的教堂建築在此地域的適切性必然顯得曖昧不明。上述種種或許都是費氏的臺灣教堂多偏重現代風格之因；他自述中的「讓西方特色退居後位，而東方特色低調但決定性地展現眼前」[244] 似乎在描述其日本地區作品有其合理性，但在臺灣的教堂上卻不明顯；這多少顯露出歐洲背景的建築師在文化涵化上的理念與想像，以及實踐效果之間難以避免的落差或力有未逮。如何能掌握或分辨東亞地區內個別國家及其中不同地域的人文特色，仍是一個高難度的挑戰。

結語

> 教堂空間中的所有設計必須反映神的榮耀，並將之傳播給會眾、進入內心與冥思、引發靈感、喚起教會的博愛行動。建蓋教堂就是真正的敬拜，擔負著造就對信仰全心付出的責任。這才是成功的教堂建築。[245]

日本與臺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到1970年左右期間的教堂建築多半由外國宣教士或與其相關的外籍建築師主導，[246] 而費宥諒的教堂作品便是一例。無論是在日本或臺灣的外國建築師中，[247] 他的教堂在作品數量與分佈廣度上，都成為獨一無二的現象，難有其他的建築師能與之比擬。客觀而言，他為當時盛行西方歷史主義風格教堂建築的亞洲宣教地引入了歐洲現代教堂建築造形與精神，[248] 落實了當代禮儀改革運動的訴求，身體力行對在地文化的融合，進行了歐洲與日本、臺灣傳統建築及文化的對話，並在亞洲土地上提供了具說服力的

---

[243] 歐思定修士，個人訪談，臺東白冷會總院，臺東市（2013年4月3日）。

[244] 原文參見附錄四；Karl Freuler, *Persoenliche Gedanken*, p. 4.

[245] 原文參見附錄四；Karl Freuler, *Persoenliche Gedanken*, p. 4.

[246] Beate Löffler, *Fremd und Eigen*, p. 222; 張志豪，《花東地區天主教教堂建築研究》，頁147-148。

[247] 例如James McDonald Gardiner與William Merrell Vories等。

[248] Beate Löffler, *Fremd und Eigen*, p. 22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歐洲現代教堂建築範例，並成就了1950到1970年代期間在日本與臺灣地區的特殊地標與跨國現象。

然而，即便費宥諒為當地後輩建築師開啟了一扇接軌西方思維與表現手法的大門，他的作品對臺灣的教堂藝術發展並未發揮實質影響。那麼它們在臺灣建築史上的意義何在？費宥諒的作品長久以來未受注意的原因頗為複雜，舉凡堂區神父與教民對教堂建築的「實用」定位、宗教藝術議題在福傳工作中的邊緣化、花蓮與臺東地區之偏遠難行等，都減低了這些教堂在當時受到關注的程度。而後，隨著本土歷史、文化史、宗教史、與建築史的系統性研究之發展，學界也開始關注臺灣的教堂建築，但似乎多聚焦在帶有歷史主義樣式、著名建築師之作品、造形技術精湛等作品上；於是，費宥諒的設計繼續在漫漫幾十年的時日中沉寂。[249] 費宥諒的案例或許正可提供一個省思，是否長久以來，在臺灣能夠受到關注的教堂建築多僅限於那些在造形設計上有相當程度特殊性與傑出性的作品？的確，若從藝術巧思、結構精湛，與技術複雜度來取決其價值，那麼費宥諒的作品不免顯得暗然失色，不但不具指標性，且與同期歐美建築風潮相較下還顯得保守，甚至「落後」。但如此一來，也必錯失一窺它們作為歷史與文化紀錄的豐富意義。

從藝術社會學的理論來看，當一個反映新思潮的新風格出現時，它在社會中不同階級與文化圈的推展速度必然快慢不一；而其中，宗教圈對新的藝術形式之接受速度無疑是最慢的，同時，它與傳統的拉鋸無疑也是最大的；[250] 而現代建築藝術的發展也不例外。其中，教堂建築是一個特殊的區塊，不但自有其複雜性，它們對現代主義的反動或互動、對傳統的羈絆與省思方式及程度，皆難單純地從世俗性現代建築的理解對其執一而論，即便宗教性與世俗性現代建

[249] 為何費氏的教堂一直以來未受注意，所牽涉的原因甚廣，例如臺灣建築教育體系中的發展與關注重點、教堂在建築界的地位、教堂建築研究在學界的發展、媒體與學術期刊的關注方向、競圖、審核與建蓋的流程體制、神職人員的態度、外語相關報導（此處尤其是指非英語系的德文與法文報導）在臺灣的流通限制等。此議題實屬一獨立研究課題，可做為後續延伸探討的方向。

[250] Arnold Hauser, “The Sociological Approach: The Concept of Ideology in the History of Art,” *The Philosophy of Art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1959), pp. 19-4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築有著密切的關係。費宥諒的教堂設計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其樣式緣由、設計理念、禮儀精神、瑞士文化與時代背景淵源，都補充、並深化了我們對「現代」教堂建築的理解：在驚艷度不高的教堂外觀背後，也能蘊藏著複雜的思維。它們可以是對教堂建築在現代生活中的重新定義與定位，可以是讓教堂建築能在異國文化土地上成為禮儀精神的稱職解說載體之規劃；可以是對現代主義思潮與「傳統」、或對自身文化與異國文化的省思。外表平凡無奇的這些教堂很容易被單純地歸咎為「簡陋」與經濟、技術不足所造成；但若揭開歷史的層層面紗，它們的另一面特質卻可以是費宥諒身處「現代」時勢中，立足於對天主教傳統感到自豪的基礎上，對西方建築「傳統」的一種正面回應，並從中尋求啟發，讓不帶有可辨性「陳腔濫調」歷史主義色彩之教堂「原型」成為跨越時代與文化藩籬的可行中庸路徑。海外宣教的脈絡下，這些教堂展現了設計者對他者文化的好奇、包容、順應與思考。再者，它們之所以不引人注目，或許正因為其外在表徵成功地流露出與本土建築相容的共性？我們可以認為此類教堂建築的「昭告性」不足，而無法發揮其宗教象徵力；但從另一角度觀之，這是否也代表了費宥諒在教堂建築的文化順應上達到了某種程度的果效？同樣的，那些「非典型」、並未「與時俱進」的「落後」現代樣式教堂可以被理解為個人創意不足、外在條件局限所致、或費氏對「東方傳統」與西方現代特質的融合未臻成熟；然而，若從異國文化場域中的宣教目的觀之，勢必重思教堂建築的「前衛性」有多重要、是否合宜與必要、所謂的「適切性」界線何在、誰擁有主導權、所依據的原則為何、費宥諒做為設計者欲為亞洲樹立的教堂建築典範為何排除了最新的現代教堂建築趨勢？這些問號提醒了我們在面對費氏的教堂建築時，以一種更謹慎、細膩的態度與思考模式去理解它們，方能避免一些過於片面的評價窠臼。

誠如費宥諒所說，這些教堂建築（das Bauen; *aedes*）就是實踐福傳教育（*Erbauung; aedificatio*）的鑿鑿紀錄。他的這些教堂與臺灣歷史及生活相接，背後一端牽連的是瑞士的文化藝術傳統、現代潮流與建築發展、禮儀改革與海外宣教運動；另一端牽連的則是日本的文化傳統、它與西方現代主義的互動、與歐洲宣教在東亞的佈局。可以說，費氏教堂的主要價值並不在其藝術傑出性，而是它所展現出的西方傳統、現代、本土、及東亞傳統多方交織的網絡環扣，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以及蘊含其中、緊密連結的文化與歷史意義。無論是那些僅留紙上的構思、已消失與被閒置的教堂、或仍繼續發揚信仰精神的聖所，這些作品所呈現出的宏觀面、所牽連的國家及地域廣度、文化豐富度、歷史獨特性，與人文思想層面的多元性等，都讓它們在臺灣建築史上擁有獨一無二的地位。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附錄一 東京1954年的瑞士現代教堂攝影展作品清單[251]

建築師	照片張數	教堂名稱（地點，年代）
Otto Dreyer	12張	● Wallfahrtskapelle St. Anton (Kanton Luzern, Stettenbach bei Grosswangen, 1932) ● Pfarrkirche St. Theodul (Kanton Luzern, Littau, 1938) ● Bruder Klaus Kapelle (Sigerswil bei Grosswangen, 1940) ● St. Josef (Luzern, Maihof, 1940; Turm 1951) ● Bruder Klaus Kirche (Kriens, Modellaufnahme, im Bau)
Josef Schütz	6張	● St. Maria und Antonius (Thayngen, 1951) ● Muttergotteskirche, Modellaufnahme (Solothurn, 1953/54, im Bau)
Hermann Baur	63 張	● Pfarrkirche Dreifaltigkeit (Bellach, 1937) ● Pfarrkirche St. Leodegar (Möhlin, 1938) ● Pfarrkirche St. Mauritius (Dornach, 1939) ● Pfarrkirche Peter und Paul, Modellaufnahme (Stüsslingen, 1948) ● St. Michael (Basel, 1949) ● Allerheiligen (Basel, 1950) ● Pfarrkirche (Thailen, Saar, 1953) ● Marienkirche (Olten, 1953) ● Pfarrkirche St. Martin (Zuchwil,1953, im Bau) ● Bruder Klaus Kirche (Bern, 1953/54, im Bau) ● Pfarrkirche, Modell (Cahagnes, France, 1951, im Bau)

[251] *Ausstellung in Tokyo*. Dossier PA 378 / 163, Staatsarchiv Luzer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Projekt Solothurn ● Projekt Langenthal ● Projekt Wettingen
Fritz Metzger	9張	● St. Karl (Luzern, 1933-35) ● St. Franziskuskirche (Riehen, 1949) ● Felix u. Regula, Modell (Zürich, 1950)
Oskar Müller	2張	● Dreifaltigkeitskirche St. Gallen
Hanns Brütsch	3張	● Burder Klaus Kapelle (Zug, Grindelwald, 1951) ● Wettbewerb Bruderklausenkirche Bern ● Wettbewerb Kirche Oberwil, 1. Preis
August Boyer	1張	● Wettbewerb St. Anton (Luzern)
Alois Anselm	1張	● St. Anton (Luzern, 1954)

附錄二 費宥諒在東京瑞士現代教堂攝影展的英文演講稿（擷錄）

The department of liturgical art of the "Nat. Cath. Comm. of Japan" in keeping with its aim "to foster Japanese sacred art" is making exhibitions from time to time, so that, by means of the material displayed, it may indicate the right way towards a living contemporary ecclesiastical art…. I received the material shown in this exhibition from the S.S.L., the Swiss society of Catholic artists which is highly esteemed in Switzerland as well as abroad…. If we look at these churchbuildings, we cannot but notice three qualifications: the logic of the construction, the artistic expression of modern sentiment, the conformity to the rules of the liturgy and the devotion of the Church….

Church building is designed for a special purpose, the celebration of the liturgy….I am speaking today of a liturgical movement which distinguishes itself by the three following qualifications:
(1) Aiming at the essential thing: that is, the emphasis on the mass as the highpoint and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very core of rede[m]ption and religion. Thus, the religious life of the community as well as of the individual has its source and its means of perfection in the sacrifice of the Mass.

(2) A certain restrained sobriety: that is the exclusion of superficial pomp, while, retaining at the same time, and trying to grasp the essence of the holy action.

(3)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mass as a symposiom[symposium], a sacred community-meal. The sacrifice of the Church is shared by the community. It is no longer an act of private priestly devotion with casual spectators…. It is the time of the awakening of the laity which is called to cooperate and to share the responsibility for all the brethren.

This new and living spirit is imposing new laws for our church-construction, which can be clearly seen in this exhibition. The church is constructed as a room in which the sacrifice is offered for the community. It is built around the elevated altar in which the eyes and hearts of the faithful converge on the place of sacrifice and the table of the people of God. The altar dominated the room; the administration of sacraments, the preaching of the Gospel, the cult of the eucharistic Christ, the private devotion are subordinated to it. Side-altars, confessionals, stations of the cross, should be put in separate rooms, if they have to be in the church, in those places which do not attract attention nor disturb the celebration of the mass. An ideal solution would be to annex to the church a separate chapel (instead of the numerous monooki) where the Blessed Sacrament could be preserved and the confessionals easily located. This chapel…. could be used for the mass on weekdays, or in it could be assembled smaller groups of the faithful when special devotions are held…. The baptismal font too is a somewhat neglected object. A monumental room near the entrance of the church would be the adequate expression of the fundamental meaning of this sacrament….I would like to mention my new churches in Kichijoji and Kamakura…, those churches are an attempt to carry out all the ideas mentioned before.

If you look at the different pictures displayed in this exhibition, your attention will be called to the spaciousness of the choir, the noble ornamentation of the altar, the intelligent and sober arrangement of light and shade opposed to all theatrical effects, the choice of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material, and, in general, to the religious sincerity with which these artists carried out their works.

Of course, with regard to our position here in Japan, I do not advocate the mere copying of these churches such as they are. The climate, financial, missionary situation of this country is a different one….Father van Straelen recently published an article about the accommodation of buildings to Japan; and regard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hurches he is offering several suggestions. The author seems to be convinced that our churches should not be monumental, but low and dark like Buddhist temples.However, one should bear in mind that we must not derive our laws of construction from the achievement of Buddhism and Shintoism. Thinking in terms of the liturgy, one would have to say just the opposite: "Servite Domino in laetitia/, Laetatus sum in his quae dicta sunt mihi, in domum Domini ibimus. [serve the Lord with gladness I rejoiced at the things that were said to me: we shall go into the house of the Lord(Is. 66:10–11; Ps. 121:1)]" The greatness of God, the dignity of our adoptive Sonship, the beauty of the ancient liturgy are calling for joyful brightness and monumental rooms as they are materialized in these Swiss churches. These large rooms were designed out of need to unite again the liturgy with our religious life and to live on the treasures offered by the sacraments…. ㉜

附錄三 比爾希勒評論亞洲教堂建築亂象與費宥諒的教堂設計

Heute, wo das wiederstehende Japan echte und unechte Modernität durchs Band vergöttlicht und der Weg zu einem ehrlichen Kirchenbau offen stünde, verlieren sich die katholischen Kreise leider in einem sterilen und inmitten der grossartigen japanischen Bautradition unfruchtbaren Historizismus. So wurden z.B. in Tokio nach dem Krieg gegen zwanzig neue Kirchen gebaut, die bewusst die verschiedenen Stile des Abendlandes

㉜ Karl Freuler, *Vortrag für die Bishöfe und Superioren in Japan, als Einführung in die Ausstellung des SSL, 30.IV.1954; Ausstellung in Tokyo*. Dossier PA 378 / 163, Staatsarchiv Luzer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veranschaulichen sollten. Dass diese innerlich toten Gebilde, schlechte Museumsstücke, dem Ansehen des Katholizismus bei gebildeten Japanern nicht förderlich sind, dürfte einleuchten. Wie unsäglich naiv das Problem des Kirchenbaues angepackt wird, zeigt am besten das nachfolgende Beispiel: Ein höherer Geistlicher besuchte unseren Architekten [Karl Freuler] und brachte ihm eine lange Reihe von Fassadenentwürfen, die er selber für eine noch zu bauende Kirche entworfen hatte. Für die Kirche selber bestand noch gar kein Projekt. Der übelberatene geistliche Bauherr wollte für seinen projektierten Bau von der Fassade ausgehen. – Noch letztes Jahr wurde in Tokio eine Kirche in "reiner Renaissance" erstellt, einige hundert Meter daneben bauten gleichzeitig die Buddhisten ein faszinierendes Tempelchen in Beton, künstlerisch hervorragend und mutig konzipiert, lebendig, frisch…. Das Konstruktive der Kirchen von Karl Freuler ist nicht zuletzt auch durch zwei in Europa zum Glück nicht in Frage kommende Faktoren bestimmt: Sicherung gegen Erdbeben und gegen Taifune. ㉕③

附錄四 費宥諒80歲的自述回顧（擷錄）

Das Werk, welches ich entwarf, in strenger Disziplin mir erarbeitete und durchführte, hatte immer mit Glaube, Hoffnung und Liebe zu tun, stand immer in einer Spannung von schöpferischer Phantasie und geschenkter Intuition und leichter, fast spielerischer Bearbeitung des Projektes, stets von fröhlicher Schaffenskraft getragen. Was mir mehr Freude als Mühe machte, war das Planen von Kirchen und Kapellen, Kathedralen und Klöstern. Hier sollte das Bauen zur Erbauung—von aedes zur aedificatio—werden. Hier konnte ich als Liturge und Architekt durch Bildung und Ausbildung in der Theologie und Architektur mit Hingabe und Begeisterung Wertvolles leisten. Diese Synthese von Glauben, Kunst und Wissen muss im Werk sichtbar werden….Die Fotos zeigen die Geschichte meines Schaffens von den sachten, stillen Leistungen des Anfangs über die mutigen Würfe der Mitte bis zum Gesamtwerk der Kathedrale….
Das Studium an der ETH hat mich geformt im technischen und künstlerischen Bereich.

㉕③ Linus Birchler, "Ein Schweizer Kirchenarchitekt in Japan," *Basler Volksblatt* (1953), pp. 3, 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Die Seele und das Herz meines Arbeitens im Fernen Osten waren aber die Theologie und im besonderen die Liturgie. Als Missionar war mir die Aufgabe gegeben, christliche Gemeinden zu gründen, in kleinen Schritten sie zu fördern und lebendig zu erhalten. Dies wäre kaum möglich, wenn nicht das Wort und das Sakrament in gültigen Räumen als Orte der Begegnung und der Feiern des Glaubens geboten würden…..Was mich als Priester und Seelsorger beim Bauen von Kirchen und Klöstern faszinierte, war die gläubige Anteilnahme am Geschehen um Gottes Zuneigung und Nähe, Gottes Berufung und Sendung aller Christen, welche in diesen Räumen liturgisch vollzogen wird…. Der Kirchenbauer steht in der hörenden, dienenden und demütigen Haltung seinen Auftrag gegenüber. Er sollte leben aus dem Glauben an die Herablassung Gottes in Jesus Christus, seine Entäusserung in diese weltliche Welt und sorgen, dass dieser göttliche Gnadenstrom aufgenommen wird in würdige Gefässe zum Lob Gottes und zur Erbauung der christlichen Gemeinde. Alles im Kirchenraum muss an der Herrlichkeit Gottes teilhaben und sie wieder ausstrahlen zur Sammlung, zur Innerlichkeit und Kontemplation sowie zur Anregung und zum Aufruf einer diakonischen Kirche. Kirchenbau ist wahrer Gottesdienst, der verpflichtet, zu Bildung und Weiterbildung für einen vollkommeneren Einsatz. So kann das Werk gelingen…. Was ist nun das Spezifische in meinem Planen und Ausführen? Meine Tätigkeit spannt sich über grosse Teile des Fernen Ostens—Japan, Korea, Taiwan. Ich musste mich also mit den Gegebenheiten Ostasiens auseinandersetzen, mit seiner Geschichte, seiner Kultur und seinem Klima, welches besondere Anforderungen stellte und ganz neue Ueberlegungen forderte. Die Beschaffenheit der Erde, mit ihren Beben und Stössen, mit Wind und Taifun, Kälte, Feuchtigkeit und Hitze, Tropenregen und gewaltigen Schneefällen, all dies musste beim Konstruieren berücksichtigt werden. Eine weitere Frage: welche Baumaterialien können unter diesen klimatischen Verhältnissen berücksichtigt werden? Und was kann ich von den Bauleuten erwarten an ethischer Einstellung und technischem Können? Diese Ueberlegungen brachten Beschränkungen mit sich, welche die Phantasie anregten und im Suchen und Versuchen das Bauen höchst faszinierend machten. Als Neophyt des europäischen Kirchenbaues musste ich mich während der ersten Lehr- und Wanderjahre ihrer Entwicklung einfügen, bis ich nach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Jahren meinen Weg gefunden hatte, auf dem, das Westliche zurücktretend, das Oestliche leise aber entschieden hervortrat. Das Studium von Tempeln und Palästen, das ganz andere Proportionsgefüge klassischer Bauten, die subtile äusserst menschliche Beziehung zu den Baumaterialien wie Holz, Stein, Bambus, Reispapier und Strohmatten, die liebevolle Pflege einzelner Bauteile, all dies immer gegenwärtig, reflektierend und verarbeitend, half mir frei zu werden von schulischen Bindungen und dem Neuen offen, sympathisch, ja verpflichtend zu begegnen…. ㉞

附錄五 錫質平神父描述知本天主堂的設計考量

*Wollten wir Kirchen bauen, die solchem Andrange gewachsen sind, dürften wir gar nicht daran denken, in kleineren Gemeinden mit etwa 500 Getauften ein bescheidenes Gotteshaus zu errichten. Unsere Missionsmittel wären längst schon versiegt. Deswegen bauen wir gewöhnlich nicht allzu gross, aber so, dass wir an Sonn- und Festtagen die ganze Front der Kirche öffnen können. Wir hängen die Türen aus, und so kann das Volk im Kirchhof leicht der Hl. Handlung folgen. Die Kirche von Dsche-ben besteht aus einem grossen Betonkubus, der den Altarraum und das Schiff, das für 400 Gläubige Platz bietet, umfasst. Bei Massenandrang hängt man die Glastüren, die auf drei Seiten das Schiff abschliessen, aus, wodurch die grosse Säulenhalle auf den drei Seiten in den Gottesdienstraum einbezogen werden. So bietet die Kirche mehr als tausend Personen Platz. Die Gläubigen sind in dieser Halle gegen die Sonne und den Regen geschützt, und zugleich ist die Kirche durchlüftet, was man beim Tropenklima sehr angenehm empfindet. Die Kirche kann man einem Riesenzelte vergleichen: bei Massenandrang öffnet man sie, und dann sieht es aus, wie wenn die unteren Zeltplanen hochgehoben würden und die heraneilenden Scharen unter ihnen Schutz fänden.*㉟

（責任編輯：陳卉秀）

㉞ Karl Freuler, *Persoenliche Gedanken*, pp. 1-6.

㉟ Jacob Hilber, “Dsche-Ben, ein Schulbeispiel unserer Taitung-Mission,” p. 38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檔案手稿

費宥諒設計圖，臺東白冷會（Architectural plans of Karl Freuler, Bethlehem Mission in Taidong）。

傅義修士教堂建築清冊，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Inventory of architectural works of Julius Felder, National Museum of Prehistory）。

Felder, Julius

Ushibi Plan. Num. A 394. 03.〔傅義，烏石鼻設計稿，卷宗編號A 394. 03〕, Bethlehem Mission Immensee, Archiv〔白冷會總部檔案室，瑞士茵夢湖〕

Freuler, Karl

Persoenliche Gedanken, anlässlich meines 80. Geburtstages am 5. Dezember 1992 und der Herausgabe des Buches über meine Tätigkeit als Architekt im Fernen Osten. [Beilage zur Monographie von 1992]. Num. A393. 06a〔費宥諒自傳，卷宗編號 A 393. 06a〕, Bethlehem Mission Immensee, Archiv〔白冷會總部檔案室，瑞士茵夢湖〕

Werklist. Num. A 393. 07. v. 6707.〔費宥諒的作品清單，卷宗編號A393. 07. v. 6707〕, Bethlehem Mission Immensee, Archiv〔白冷會總部檔案室，瑞士茵夢湖〕

Num. E030. 2〔費宥諒的剪貼簿，卷宗編號E030.2〕, Bethlehem Mission Immensee, Archiv〔白冷會總部檔案室，瑞士茵夢湖〕

Ausstellung in Tokyo. Dossier PA 378 / 163〔東京展作品清單，卷宗編號PA 378 / 163〕, Staatsarchiv Luzern〔瑞士琉森國家檔案室〕

Vortrag für die Bishöfe und Superioren in Japan, als Einführung in die Ausstellung des SSL, 30.IV.1954; Ausstellung in Tokyo. Dossier PA 378 / 163〔費宥諒東京展演講稿，卷宗編號PA 378 / 163〕, Staatsarchiv Luzern.〔瑞士琉森國家檔案室〕

Pläne von Karl Freuler〔費宥諒教堂設計稿，無編號〕, Staatsarchiv Luzern.〔瑞士琉森國家檔案室〕

近人論著

于禮本

2011 〈殴洲現代教堂建築在臺灣：以Justus Dahinden的公東高工為例〉,《南藝學報》, 2期，頁203-229。

2014 〈德國現代教堂建築在臺灣：哥特佛瑞德・波姆（Gottfried Böhm）的菁寮聖十字堂與學甲天主堂〉,《南藝學報》, 8期，頁83-125。

2015 〈德國與臺灣的相會：1950-1970德國科倫方濟會省在臺南新營教區的教堂建築〉,《藝術學研究》, 16期，頁37-12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Yu, Li-pen
2011 "European Modern Church Architecture in Taiwan: A Unique Perspective of Justus Dahinden's Design for Kung-Tung Technical Senior High School," *Artistica TNNUA*, 2, pp. 203-229.
2014 "German Modern Church Architecture in Taiwan: The Jing Liao Holy Cross Church and the Xue Jia Catholic Church Designed by Gottfried Böhm," *Artistica TNNUA*, 8, pp. 83-125.
2015 "German and Taiwan Encounters: Church Architecture of the German Franciscan Province Colonia in Tainan's Xingying Region during 1950-1970," *Journal of Art Studies*, 16, pp. 37-130.
天主教白冷外方傳教會編
2003 《天主教白冷外方傳教會來臺傳教五十週年紀念專輯》，臺東：編者自印。
Societas Missionaria de Bethlehem, ed.
2003 *50 Jahre Bethlehem Mission in Taiwan 1953-2003 Festschrift*, Taidong: Bethlehem Mission.
范毅舜
2012 《公東的教堂：海岸山脈的一頁教育傳奇》，臺北：本事文化。
Fan, Nicholas
2012 *The Chapel of Kung-Tung: An Education Legend in the Coastal Range of Taiwan*, Taipei: Motifpress Publishing.
徐明松、王俊雄
2008 《粗獷與詩意—臺灣戰後第一代建築》，臺北：木馬文化。
Shyu, Ming-song & Wang, Chun-hsiung
2008 *Rustic & Poetic. An Emerging Generation of Architecture in Postwar Taiwan*, Taipei: Ecus Publishing House.
黃連生編
1995 《白冷會在中國傳教史料》，臺東：臺東天主教教義中心。
Huang, Lian-sheng, ed.
1995 *Historical Documents on the China Mission of the Bethlehem Mission Society*, Taidong: Catholic Doctrine Center.
傅朝卿
1996 〈光線與材質的詩篇—評介台東公東高工舊舍〉，《建築師雜誌》，1期，頁108-113。
Fu, Chao-Ching
1996 "Poetry of Light and Material – On the Historical Architecture of Taidong Kung-Tung Technical Senior High School," *Taiwan Architect*, 1, pp. 108-11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張志豪
2002 《花東地區天主教教堂建築研究》，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
Chang, Chih-hao
2002 *The Study of Catholic Church Architecture in Eastern Taiwan*, Master's Thesis of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Architecture, National Cheng-Kung University.
費聲遠著，董增順譯
1980 《回憶錄》，花蓮：華光書局。
Verineux, Andrew Jean; Dong, Zeng-Shun, trans.
1980 *A Memoir*, Hualien: Hua Guang Publishing.
趙川明編
2013 《後山傳愛：白冷會臺東60年的影像故事》，臺東：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
Zhao, Chun-Ming, ed.
2013 *Sending Love in the Mountains: A Visual Story of the Bethlehem Mission Society in Taitung for 60 Years*, Taitung: National Taitung Living Arts Center.
鄭仲烜
2010 〈傳教會與區域發展—以臺東白冷會為例〉，《東臺灣研究》，14期，頁53-88。
Cheng, Chung-hsuan
2010 "Missio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 Study on the Bethlehem Mission in Taitung," *Journal of Eastern Taiwan Studies*, 14, pp. 53-88.
歐思定口述，鄭仲烜記錄
2006 〈歐思定修士訪問記錄〉，《臺東文獻》，復刊12期，頁48-62。
Büchel, Augustin & Cheng, Chung-hsuan
2006 "Interview with Br. Augustine Büchel," *Taitung Historical Journal*, 12, pp. 48-62.
歐思定編
2003 《天主教白冷外方傳教會來台傳教五十週年紀念專輯》，臺東：白冷會。
Büchel, Augustin, ed.
2003 *50 Jahre Bethlehem Mission in Taiwan 1953-2003*, Taitung: Bethlehem Mission.
蔡光明
2008 《公東教堂建築語彙與神學意涵之研究》，臺南：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
Tsai, Kuang-ming
2008 *On the Church of St. Joseph, Kung-Tung Technical Senior High School – Architectural Vocabulary & Theological Meaning*, Master's Thesis of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Architecture, National Cheng-Kung University.
閻亞寧
2010 《花蓮縣縣定古蹟新城神社舊址調查研究》，花蓮：花蓮縣文化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Yen, Ya-ning
2010 *Research on the Hualien County Historical Site Xincheng Shinto Shrine*, Hualien: Hualien County Cultural Affair Bureau.
Baumgartner, Jacob, ed.
1970 *Missionswissenschaft im Dienste der Weltkirche. 25. Jahre Neue Zeitschrift fürMissionswissenschaft*, Schöneck: Administration der Neuen Zeitschrift für Missionswissenschaft.
1971 *Vermittlung zwischen kirchlicher Gemeinschaft. 50 Jahre Missionsgesellschaft Bethlehem Immensee*, Immensee: Neue Zeitschrift für Missionswissenschaft.
Baumann, Martin
1952 "Bericht aus Morioka," *Echo S.M.B*, 16.7, pp. 6-7.
Bernoulli, Carl Albrecht
1928 "PhilosophischeBemühmungen: Rudolf Schwarz: Wegweisung der Technik," *Das Werk*, 15.12, pp. 392-394.
Birchler, Linus
1926 "Betonkirchen," *Das Werk*, 13, pp. 21-25.
1933 "Wallfahrtskapelle St. Anton, Stettenbach bei Grosswangen: Architekt Otto Dreyer, Luzern," *DasWerk*, 20, pp. 263-265.
1953 "Ein Schweizer Kirchenarchitekt in Japan," *Basler Volksblatt*, 1953.3.6.
Brentini, Fabrizio
1992 *Karl Freuler. Architektur für die Kirche. Japan 1948-1968*, Baden: Verlag Lars Müller.
1994 *Bauen für die Kirche. Katholischer Kirchenbau des 20. Jahrhunderts in der Schweiz*, Luzern: Edition SSL.
1997 "Rudolf Schwarz und sein Einfluss auf die Kirchenarchitektur in der Schweiz," in Conrad Lienhardt, ed., *Rudolf Schwarz (1897–1961). Werk, Theorie, Rezeption*, Regensburg: Schnell & Steiner, pp. 58-78.
[Caption to the picture]
1957 *Bethlehem,* 62.1, pp. 335-337.
Engemann, Antonellus
1961 "Theologische Neuorientierungen in der Weltmission," *Rhenania Franciscana*, 14.2, p. 72.
Freuler, Charles SMB
1950 "Church Architecture in Japan," *Missionary Bulletin* (Seperatdruck, Herbst), pp. 7-11.
1953 "Ecclesiastical Architecture in Japan," *Bethlehem*, pp. 242-244.
1953 "Religious Architecture in Japan," *Liturgical Arts*, 21.3, pp. 74-75.
Freuler, Karl
1946 "Alte kirchliche Kunst," *Bethlehem*, 51.1, pp. 8-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947 “Vom neuen Bauen in China. Ein Blick in Geist und Gestaltwandlung,” *Bethlehem*, 52, pp. 464-468.

1957 “Accommodation of Church Architecture in Japan. Some Suggestion,” *Missionary Bulletin,* 11, pp. 226-229.

1959 “Is Adoption of Church Architecture a Misunderstood Ideal? Reflections of a Priest-architect,” *Liturgical Arts*, 27.3, pp. 54-56, 61.

1959 “Vom Kirchenbauen in der Mission.Gedanken eines Priester-Architekten,” *Die KatholischeMissionen*, 78.6, pp. 171-174.

Hauser, Arnold

1959 *The Philosophy of Art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Henze, Anton

1958 *Neue Kirchliche Kunst*, Recklinghausen: Paulus Verlag.

Hilber, Jacob

1957 “Dsche-Ben, ein Schulbeispiel unserer Taitung-Mission,” *Bethlehem*, 62.1, pp. 380-383.

Immos, Thomas

1963 “Ein Schweizer Architekt in Japan,” *Bethlehem*, 42, pp. 3-7.

Holenstein, Hans

2004 *Bethlehem Mission in Japan 1948-2001*, Immensee: Bethlehem-Mission.

Jansen, Erich

1963 “Aus unserer Formosa-Mission, Brief von P. Erich Jansen,” *Rhenania Franciscana*, 16.4, pp. 151-153.

Kahle, Barbara

1990 *Deutsche Kirchenbaukunst des 20. Jahrhunderts*,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Lavanoux, Maurice

1953 “A Summary,” *Liturgical Arts*, 21.3, p. 94.

Lehman, Susanna

1994 “Buchbesprechung,” *Werk, Bauen + Wohnen,* 81, p. 77.

Löffler, Beate

2011 *Fremd und Eigen.Christlicher Sakralbau in Japan seit 1853*, Berlin: Frank &Timme GmbH Verlag.

Merton, Thoma

1956 *Notes on sacred and profane arts*, New York: Jubilee Magazine.

Muck, Herbert

1962 “Liturgische Anliegen und Religiöse Werte in den Raumordnungen von D. Böhm,” in August Hoff et al., eds., *Dominikus Böhm*, München: Schnell &Steiner, pp. 26-3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Muttergotteskirche in Solothurn-Weststadt: Architekt Josef Schütz, Zürich," *Das Werk*, 41 (1954), pp. 451-454.

"Neuapostolische Kirche in Genf: 1949/50, Haefeli, Moser, Steyer, Architekten BSA/SIA, Zürich; Örtliche Bauleitung F. Quétant, Architekt BSA, Genf," *Das Werk*, 39 (1952), pp. 41-46.

Pahl, Jürgen

1999 *Architekturtheorie des 20. Jahrhunderts*, München: Prestel Verlag.

Rust, Ambros

1961 *Die Bethlehem Missionare Immensee*, Freiburg: Paulus Verlag.

Schnell, Hugo

1973 *Der Kirchenbau des 20. Jahrhunderts in Deutschland*, München: Schnell & Steiner.

Schrickel, Svenja

2005 "Die Notkirchen von Otto Bartning – eine serielle Kirchenbauproduktion der Nachkriegszeit. Überlieferte Zeichen eines Neuanfangs nachdem ZweitenWeltkrieg," *Denkmalpflege in Baden-Württemberg, Esslingen am Neckar*, 34.4, pp. 201-213.

Schwarz, Rudolf

1938 *Vom Bau der Kirche*, Würzburg: Werkbund-Verlag.

1949 "Der neue Kirchenbau," *Das Werk*, 36.4, pp. 107-109, 114.

1955 "Liturgie und Kirchenbau," *Baukunst und Werkform*, 8.2, pp. 87-93.

Schweizer St. Lukasgesellschaft, ed.

1956 *Kirchenbauten von Hermann Baur und Fritz Metzger*, Würzburg: EchterVerlag.

"St. Michaelskirche, Hirzbrunnen, Basel," *Das Werk*, 36 (1949), pp. 112-113.

Van Bühren, Ralf

2008 *Kunst und Kircheim 20.Jahrhundert. Die Rezeption des Zweiten Vatikanischen Konzil*, Paderborn: Ferdinand Schöningh.

Veil, Patrick

1956 "Weitere Nachrichten aus Formosa," *Echo S.M.B*., 20.5, p. 79.

Wirz, Franz SMB, Fritz Kollbrunner SMB.

1968 "Neue Kathedrale von Kyoto. Interview mit dem Architekten Karl Freuler," *Bethlehem*, 5, pp. 230-233.

Wißkirchen, Landolf

1964 "Auf Fahrt in den Fernen Osten," *Rhenania Franciscana*, 17.3, pp. 107-144.

Yaiser, Hildebrand. O.S.B.

1953 "The Liturgy as a Basis for New Churches in Japan," *Liturgical Arts*, pp. 79-80.

"Zwei Kirchen von Prof. Rudolf Schwarz," *Das Werk*, 44.6 (1957), pp. 193-19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網路論文與資料庫

傅朝卿
〈戰後中國古典式樣新建築〉,《臺灣建築史課程講義》。
<http://www.fu-chaoching.idv.tw/file/class/ca_06.pdf>（2014/10/12檢索）
臺東縣政府文化處
〈天主教白冷外方傳教會〉,《文化資產類別》。<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itycase/cityCase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caseId=VA09602000983&version=1&assetsClassifyId=1.2&cityId=22&menu=1>（2012年3月5日檢索）
薛弘道
〈白冷外方傳教會在華人區域〉,《白冷會在台灣》。<http://www.smb.tw/Bethlehem%20Missionare%20in%20China%20und%20Taiwan-chin.pdf>（2014年1月5日檢索）
〈カトリック大和教会〉,《株式会社親建会工務所》。
<http://www.shinkenkai.jp/wordpress/wp-content/uploads/2014/07/yamato_3.jpg>（2014年12月8日檢索）
〈カトリック吉祥寺教会〉,《株式会社親建会工務所》。
<http://www.shinkenkai.jp/portfolio-item/%E3%82%AB%E3%83%88%E3%83%AA%E3%83%83%E3%82%AF%E5%90%89%E7%A5%A5%E5%AF%BA%E6%95%99%E4%BC%9A/>（2014年10月12日檢索）
《株式会社親建会工務所》。
<http://www.shinkenkai.jp/works/>（2014年12月8日檢索）
Neff, Karl
"Kulturbeilage," *Ostschweiz*, 21 (1944), no. Pag. ; *ABBATISCELLA CATHOLICA* http://abbatiscella.blogspot.tw/2006/08/unsere-liebe-frau-vom-ahorn-6_29.html（2015年12月1日檢索）

訪談紀錄

田力強神父
個人訪談，關山天主堂，關山。(2013年4月3日)。
田清福先生
個人訪談，臺東東興天主堂，東興。(2015年4月1日)。
黃子芳先生
個人訪談，寶桑天主堂，臺東市。(2015年6月9日)。
傅義修士
個人訪談，瑞士白冷會，琉森－茵夢湖（Luzern-Immensee）。(2013年9月4日)。
歐思定修士
個人訪談，臺東白冷會會院，臺東市。(2013年4月3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版出處

圖1　費宥諒的慣用印章（擷自大南天主堂設計圖）。圖版：Staatsarchiv, Luzern.

圖2　Fritz Metzger, St. Karl, Luzern, 1932-1934. 圖版：Schweizer St. Lukasgesellschaft ed., *Kirchenbauten von Hermann Baur und Fritz Metzger* (Würzburg: Echter Verlag, 1956), pp. 35, 37, 38.

圖3　Johannes Hugentobler, Maria zum Ahorn (Wallfahrtskapelle), 1937, Appenzell Kanton（擷自費宥諒剪貼簿中的圖片）。圖版：Staatsarchiv, Luzern.

圖4　Kühmatt Kapelle, Mariä Heimsuchung, 1646-1643. 圖版：Michaela Sennhauser, (26.06.2015 um 16:31 Uhr), Lizenz: ©http://www.fotocommunity.de/pc/pc/display/36383154

圖5　鄉村教堂模型圖錄，（Faller公司的兒童模型組裝玩具），1958。圖版：*Heini's Modellbahnboerse*, http://www.modellbahnboerse.org/MIF/faller2.jpg

圖6　費宥諒，鹿野天主堂（Kirche in Lu Yüä, 1956.7.13）。圖版：Staatsarchiv, Luzern.

圖7a　鹿野，龍田天主堂，1956。圖版：趙川明編，《後山傳愛：白冷會臺東60年的影像故事》（臺東：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2013），頁133。

圖7b　鹿野，永安天主堂，1957。圖版：趙川明編，《後山傳愛：白冷會臺東60年的影像故事》（臺東：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2013），頁128。

圖7c　費宥諒，石坑天主堂，1957。圖版：趙川明編，《後山傳愛：白冷會臺東60年的影像故事》（臺東：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2013），頁181。

圖8　費宥諒，神奈川縣 濱市菊名，聖安東天主堂，1957。圖版：Karl Freuler, "Vom Kirchenbauen in der Mission. Gedanken eines Priester-Architekten," *Die Katholische Missionen*, 78.6 (1959), p. 173.

圖9a　費宥諒（？），平安村，聖若瑟天主堂，1957。圖版：國立臺灣博物館NGB-10148029。

圖9b　費宥諒（？），官田，聖安東尼天主堂，1957。圖版：Georg Horst Reis, *Taiwan-Mission der Kölnischen Franziskaner Provinz. Von den Missionaren gegründeten Pfarreien, Kirchen, Kapellen, Ordenshäuser und Schulen 1953-1975* (Franziskanerkloster Neviges, 2008), n. pag. No.055.

圖10　費宥諒（？），臺東，大鳥天主堂，1955。圖版：Jakob Hilber, "Eine Woche auf der Insel der verdammten," *Bethlehem*, 1 (1955), p. 18.

圖11　費宥諒（？），臺東，南興天主堂，1956。圖版：趙川明編，《後山傳愛：白冷會臺東60年的影像故事》（臺東：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2013），頁265。

圖12　費宥諒，神奈川縣茅崎市（Chigasaki, near Yokohama），無原罪の聖母，1952。圖版：Maurice Lavanoux, "A Summary," *Liturgical Arts*, 21.3 (1953), p. 82.

圖13　鹿野，和平天主堂，1954。圖版：趙川明編，《後山傳愛：白冷會臺東60年的影像故事》（臺東：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2013），頁12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14　費宥諒，臺北聖母堂（Our Lady Shrine at Taipei）（1954.5.5）。圖版：Staatsarchiv, Luzern.

圖15　費宥諒，吉祥寺市，聖靈教會（Kichijori -Tokyo），1950。圖版：Immensee, SMB Archiv.

圖16　費宥諒，神奈川縣茅崎市(Chigasaki, near Yokohama)，無原罪の聖母，1952。圖版：Maurice Lavanoux, "A Summary," *Liturgical Arts*, 21.3 (1953), p. 82.

圖17　費宥諒，仙臺，聖道明天主堂（St. Dominik church, Sendai），1950。圖版：Immensee, SMB Archiv.

圖18　費宥諒，一關天主堂（Ichinoseki church, Iwate），1952。圖版：Hans Holenstein, *Bethlehem Mission in Japan 1948-2001* (Immensee: Bethlehem-Mission, 2004), p. 58.

圖19　費宥諒，館山聖十字堂（Holy Cross church, Tateyama），1950s。圖版：Immensee, SMB Archiv.

圖20a　Fritz Metzger, Oerlikon church, 1926. 圖版：Linus Birchler, "Betonkirchen," *Das Werk*, 13 (1926), p. 21.

圖20b　Fritz Metzger, Oerlikon church, 1926. 圖版：Linus Birchler, "Betonkirchen," *Das Werk*, 13 (1926), p. 21.

圖20c　Fritz Metzger, Oerlikon church, 1926. 圖版：Linus Birchler, "Betonkirchen," *Das Werk*, 13 (1926), p. 21.

圖21a　Otto Dreyer, St. Anton, Stettenbach -Grosswangen, 1932. 圖版：Linus Birchler, "Wallfahrtskapelle St. Anton in Stettenbach bei Grosswangen: Architekt Otto Dreyer, Luzern," *Das Werk*, 20.9 (1933), p. 264.

圖21b　Otto Dreyer, St. Anton, Stettenbach -Grosswangen, 1932. 圖版：Linus Birchler, "Wallfahrtskapelle St. Anton in Stettenbach bei Grosswangen: Architekt Otto Dreyer, Luzern," *Das Werk*, 20.9 (1933), p. 264.

圖21c　Otto Dreyer, St. Anton, Stettenbach -Grosswangen, 1932. 圖版：Linus Birchler, "Wallfahrtskapelle St. Anton in Stettenbach bei Grosswangen: Architekt Otto Dreyer, Luzern," *Das Werk*, 20.9 (1933), p. 265.

圖22a　費宥諒（？），新港，安德肋堂，1955。圖版：*Bethlehem*, 61.3 (1956), p. 226.

圖22b　費宥諒（？），新港，安德肋堂，1955。圖版：*Bethlehem*, 61.3 (1956), p. 227.

圖23　費宥諒（？），佳里聖三堂，1956。圖版：Georg Horst Reis, *Taiwan-Mission der Kölnischen Franziskaner Provinz. Von den Missionaren gegründeten Pfarreien, Kirchen, Kapellen, Ordenshäuser und Schulen 1953-1975* (Franziskanerkloster Neviges, 2008), n. pag. No.1.

圖24　Otto Bartning, 臨時教堂，建蓋步驟。圖版：Svenja Schrickel, "Die Notkirchen von Otto Bartning – eine serielle Kirchenbauproduktion derNachkriegszeit. Überlieferte Zeichen eines Neuanfangs nach dem Zweiten Weltkrieg," *Denkmalpflege in Baden-Württemberg, Esslingen am Neckar*, 34.4 (2005), p. 20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25 Otto Bartning, 臨時教堂，類型B的三種形式。圖版：“Baupläne von Notkirchen (Typ B),” *Prometheus. Das verteilte digitale Bildarchiv für Forschung & Lehre*. n.d. <http://prometheus.uni-koeln.de/pandora/image/show/paderborn-90bf9f3ae0005a46cfc0a218f989740891e77c2b>（2015年8月27日檢索）

圖26 Otto Bartning, 臨時教堂，類型A。圖版：“Baupläne für Notkirchen (Typ A und B),” *Prometheus. Das verteilte digitale Bildarchiv für Forschung & Lehre*. n.d. <http://prometheus.uni-koeln.de/pandora/image/show/paderborn-77a6f66a431b17dd1f8486c6019aecda671e9d75>（2015年8月27日檢索）

圖27 費宥諒，一關天主堂（Ichinoseki church, Iwate），1952。圖版：Immensee, SMB Archiv.

圖28a 費宥諒，中華殉道烈士堂（Kirche Taitung）（1955.11.22）。圖版：Staatsarchiv, Luzern.

圖28b 費宥諒，中華殉道烈士堂，現狀（2013）。圖版：徐鈺涵攝影。

圖29 費宥諒，堂口小禮拜堂（1955.12.9）。圖版：Staatsarchiv, Luzern.

圖30 費宥諒，三重縣四日市市（Yokkaichi-Mie），聖母堂，1956。圖版：Fabrizio Brentini, *Karl Freuler. Architektur für die Kirche. Japan 1948-1968* (Baden: Verlag Lars Müller, 1992), pp. 44-45.

圖31 費宥諒，苫小牧市聖母堂（Tomakomai, 1956）。圖版：Karl Freuler, “Accommodation of Church Architecture in Japan. Some Suggestion,” *Missionary Bulletin*, 11 (1957), p. 227.

圖32 費宥諒，Bali小教堂（Kirchlein in Bali）（1956.7.28）。圖版：Staatsarchiv, Luzern.

圖33 費宥諒，「福爾摩沙小教堂」（1956.8.1）。圖版：Staatsarchiv, Luzern.

圖34 利吉天主堂，1958。圖版：趙川明編，《後山傳愛：白冷會臺東60年的影像故事》（臺東：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2013），頁300。

圖35 費宥諒，大南（東興）天主堂（Kirchlein für ein Eingeborenendorf in Taiwan）（1958.3.10）。圖版：Staatsarchiv, Luzern.

圖36a 費宥諒，馬蘭天主堂（1957.9.7）。圖版：臺東白冷會。

圖36b 費宥諒，馬蘭天主堂，梵二公會前。圖版：趙川明編，《後山傳愛：白冷會臺東60年的影像故事》（臺東：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2013），頁302。

圖36c 費宥諒，馬蘭天主堂。圖版：鄭幼詔攝影。

圖37 費宥諒，鸞山（Kapelle Luan Shan）（1961.3）。圖版：Staatsarchiv, Luzern.

圖38 費宥諒，苫小牧市聖母堂（Tomakomai, 1956）。圖版：Karl Freuler, “Accommodation of Church Architecture in Japan. Some Suggestion,” *Missionary Bulletin*, 11 (1957), p. 227.

圖39 費宥諒，北海道，苫小牧市聖母堂（Tomakomai, 1956）。圖版：Fabrizio Brentini, *Karl Freuler. Architektur für die Kirche. Japan 1948-1968* (Baden: Verlag Lars Müller, 1992), p. 4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40 費宥諒，鎌倉市大磯町（Mary's Church, Oiso-Kamakura），聖母堂，1955。圖版：〈カトリック大磯教会〉,《株式会社親建会工務所》。<http://www.shinkenkai.jp/wordpress/wp-content/uploads/2014/07/ooiso.jpg>（2014年10月12日檢索）

圖41 費宥諒，鎌倉市大磯町（Mary's Church, Oiso-Kamakura），聖母堂，1955。圖版：〈カトリック大磯教会〉,《株式会社親建会工務所》。<www.shinkenkai.jp/wordpress/wp-content/uploads/2014/07/ooiso_2.jpg>（2014年10月12日檢索）

圖42a 費宥諒，鹽水聖神堂（Neue Kirche in Yen Shui Taiwan）（1959.3.8）。圖版：Staatsarchiv, Luzern.

圖42b 費宥諒，鹽水聖神堂，1959。圖版：鹽水聖神堂。

圖43 費宥諒，東京板橋區，聖伊莉莎白天主堂（St. Elisabeth, Tokyo-Itabashi），1957。圖版：Fabrizio Brentini, *Karl Freuler. Architektur für die Kirche. Japan 1948-1968* (Baden: Verlag Lars Müller, 1992), p. 58.

圖44 費宥諒，都蘭天主堂（Holzkirche Tulan Taiwan）（1959.1.24）。圖版：Staatsarchiv, Luzern.

圖45 Riegelhaus (Fachwerk), 1550, Burg Zug, Zug, 瑞士。圖版：„Zug Burg Zug 6“ von Schulerst - Eigenes Werk. Lizenziert unter CC BY-SA 3.0 über Wikimedia Commons -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Zug_Burg_Zug_6.jpg#/media/File:Zug_Burg_Zug_6.jpg

圖46 費宥諒，新城禮拜堂（Project of a chapel at Hsin Cheng）（1958.2.13）。圖版：Staatsarchiv, Luzern.

圖47 Gottfried Böhm，菁寮天主堂，1956。圖版：國立臺灣博物館CGB_10153010。

圖48a 費宥諒，關山，聖母堂（1956.3.9）。圖版：Staatsarchiv, Luzern.

圖48b 費宥諒，關山，聖母堂。圖版：譚文慧攝影。

圖48c 關山天主堂入口標誌。圖版：徐鈺涵攝影。

圖49 費宥諒，長浦天主堂（Nagaura Church, Aichi），1950s。圖版：Immensee, SMB Archiv.

圖50a Hermann Baur, St. Michael church, Hirzbrunnen, Basel, 1948/49. 圖版：Schweizer St. Lukasgesellschaft ed., *Kirchenbauten von Hermann Baur und Fritz Metzger* (Würzburg: Echter Verlag, 1956), p. 109.

圖50b Hermann Baur, St. Michael church, Hirzbrunnen, Basel, 1948/49. 圖版：“St. Michaelskirche, Hirzbrunnen, Basel,” *Das Werk*, 36 (1949), p. 113.

圖50c Hermann Baur, St. Michael church, Hirzbrunnen, Basel, 1948/49. 圖版：Robert Lang, “Der Standort der Sänger,” *Ars sacra*, 20 (1950), n. pag.

圖51a Josef Schütz, St. Marien, Solothurn –Weststadt, 1953/54. 圖版：“Muttergotteskirche in Solothurn-Weststadt, 1951/54, Josef Schütz, Arch. BSA/SIA, Zürich,” *Das Werk*, 41 (1954), p. 45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51b Josef Schütz, St. Marien, Solothurn –Weststadt, 1953/54. 圖版：“Muttergotteskirche in Solothurn-Weststadt, 1951/54, Josef Schütz, Arch. BSA/SIA, Zürich,” *Das Werk*, 41 (1954), p. 453.

圖52 費宥諒，下營天主堂（Kirche Hsia Ying）（1959.9.25）。圖版：Staatsarchiv, Luzern.

圖53a Hermann Baur, Marienkirche Olten, 1953. 圖版：Schweizer St. Lukasgesellschaft ed., *Kirchenbauten von Hermann Baur und Fritz Metzger* (Würzburg: Echter Verlag, 1956), p. 114.

圖53b Hermann Baur, Marienkirche Olten, 1953. 圖版：Hermann Baur, “Marienkirche in Olten: Architekt Hermann Baur, Basel,” *Das Werk*, 41.12 (1954), p. 460.

圖54a 費宥諒，臺東培質院（原稿電腦描圖），有十字架的南向鄰街面、東面入口、教堂剖面，1958。圖版：臺東白冷會。

圖54b 費宥諒，臺東培質院，有十字架的南向鄰街面、東面入口與庭院，1958。圖版：Jakob Hilber, “Einweihung des neuen Studentenheimes und der Kathechistenschule in Taitung,” *Bethlehem*, 64.1 (1959), p. 14.

圖54c 費宥諒，臺東培質院，禮拜堂，1958。圖版：Jakob Hilber, “Einweihung des neuen Studentenheimes und der Kathechistenschule in Taitung,” *Bethlehem*, 64.1 (1959), p. 15.

圖55 費宥諒，宮古天主堂（Miyako），1952。圖版：Immensee, SMB Archiv.

圖56 費宥諒，東京主教行政大樓聖堂，1953。圖版：Immensee, SMB Archiv.

圖57a 費宥諒，寶桑天主堂，1962。圖版：Immensee, SMB Archiv.

圖57b 費宥諒，寶桑天主堂，推測原始平面、立面圖。圖版：譚文慧繪製。

圖58a 費宥諒，臺東白冷會會院，1966。圖版：Immensee, SMB Archiv.

圖58b 費宥諒，臺東白冷會會院，聖堂，1966，原稿電腦描圖。圖版：臺東白冷會；譚文慧繪製。

圖58c 費宥諒，臺東白冷會會院，聖堂，1966。圖版：作者攝影。

圖58d 費宥諒，臺東白冷會會院，聖堂，1966，原稿電腦描圖。圖版：譚文慧繪製。

圖59 費宥諒，康樂培質院（Studentenheim Kang Luo Tsun）（1959.10.1）。圖版：Staatsarchiv, Luzern.

圖60 費宥諒，鹿野（Pfarreiwerk Lu-Yä）（1965.5）。圖版：Staatsarchiv, Luzern.

圖61a 費宥諒，知本天主堂，1956。圖版：臺東白冷會。

圖61b 費宥諒，知本天主堂，1956。圖版：臺東白冷會。

圖61c 費宥諒，知本天主堂，1956。圖版：Jacob Hilber, “Dsche-Ben, ein Schulbeispiel unserer Taitung-Mission,” *Bethlehem*, 62.1 (1957), p. 383.

圖61d 費宥諒，知本天主堂，1956。圖版：Jacob Hilber, “Dsche-Ben, ein Schulbeispiel unserer Taitung-Mission,” *Bethlehem*, 62.1 (1957), p. 383.

圖62a 費宥諒，大溪天主堂（Kirche in Da Shi）（1956.8.13）。圖版：Staatsarchiv, Luzer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62b 費宥諒，大溪天主，1956。圖版：Immensee, SMB Archiv.

圖63a 費宥諒，花蓮主教座堂（美崙，進教之佑堂）（1956.9.8）。圖版：Staatsarchiv, Luzern.

圖63b 費宥諒，花蓮主教座堂（美崙，進教之佑堂）（1957.1）。圖版：Staatsarchiv, Luzern.

圖63c 費宥諒，花蓮主教座堂（美崙，進教之佑堂）（1957.1）。圖版：Staatsarchiv, Luzern.

圖63d 費宥諒，花蓮主教座堂。圖版：張志豪，《花東地區天主教教堂建築研究》（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頁64。

圖63e 費宥諒，花蓮主教座堂。圖版：花蓮天主教文物館，何玫芹小姐。

圖64 費宥諒，星美學園聖堂，東京都北區赤羽，1958。圖版：〈星美学園聖堂〉，《株式会社親建会工務所》。<http://www.shinkenkai.jp/wordpress/wp-content/uploads/2014/07/seibi_gakuen.jpg>（2014年10月11日檢索）

圖65a 費宥諒，新營，天使之后堂（Kirche Königin der Engel Hsinying Taiwan）（1958.2.24）。圖版：Staatsarchiv, Luzern.

圖65b 費宥諒，新營，天使之后堂，緊鄰入口的獨立洗禮堂。圖版：Georg Horst Reis, *Taiwan-Mission der Kölnischen Franziskaner Provinz. Von den Missionaren gegründeten Pfarreien, Kirchen, Kapellen, Ordenshäuser und Schulen 1953-1975* (Franziskanerkloster Neviges, 2008), n. pag. No. 106.

圖65c 費宥諒，新營，天使之后堂，主廊與聖壇區。圖版：Georg Horst Reis, *Taiwan-Mission der Kölnischen Franziskaner Provinz. Von den Missionaren gegründeten Pfarreien, Kirchen, Kapellen, Ordenshäuser und Schulen 1953-1975* (Franziskanerkloster Neviges, 2008), n. pag. No. 098.

圖65d 費宥諒，新營，天使之后堂。圖版：Georg Horst Reis, *Taiwan-Mission der Kölnischen Franziskaner Provinz. Von den Missionaren gegründeten Pfarreien, Kirchen, Kapellen, Ordenshäuser und Schulen 1953-1975* (Franziskanerkloster Neviges, 2008), n. pag. No. 079.

圖65e 費宥諒，新營，天使之后堂，側廊與副壇。圖版：Georg Horst Reis, *Taiwan-Mission der Kölnischen Franziskaner Provinz. Von den Missionaren gegründeten Pfarreien, Kirchen, Kapellen, Ordenshäuser und Schulen 1953-1975* (Franziskanerkloster Neviges, 2008), n. pag. No. 104.

圖65f 費宥諒，新營，天使之后堂，1958。圖版：Charles Freuler, "Is Adoption of Church Architecture a Misunderstood Ideal? Reflections of a Priest- Architect," *Liturgical Arts*, 27.3 (1959), p. 61.

圖65g 費宥諒，新營，天使之后堂，1958。圖版：Georg Horst Reis, *Taiwan-Mission der Kölnischen Franziskaner Provinz. Von den Missionaren gegründeten Pfarreien, Kirchen, Kapellen, Ordenshäuser und Schulen 1953-1975* (Franziskanerkloster Neviges, 2008), n. pag.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66 費宥諒，臺東，鸞山禮拜堂（1961.3.27）。圖版：Staatsarchiv, Luzern.

圖67 費宥諒，小名濱市聖施洗約翰堂（Onahama），1956。圖版：Karl Freuler, "Vom Kirchenbauen in der Mission.Gedanken Eines Priester-Architekten," *Die Katholische Missionen*, 78.6 (1959), p. 171.

圖68 費宥諒，京都衣笠，聖靈堂，1958。圖版：Immensee, SMB Archiv.

圖69 費宥諒，澀谷區，聖道明會修道院天主堂，1958。圖版：Immensee, SMB Archiv.

圖70a 費宥諒，東京司教區神學院模型。圖版：Hans Holenstein, B*ethlehem Mission in Japan 1948-2001* (Immensee: Bethlehem-Mission, 2004), p. 116.

圖70b 費宥諒，東京司教區神學院，1959。圖版：Immensee, SMB Archiv.

圖71a 費宥諒，金崙天主堂（Kirche in Eisen Beton in Taiwan）（1956.1.23）。圖版：Staatsarchiv, Luzern.

圖71b 費宥諒，金崙天主堂，1956。圖版：Immensee, SMB Archiv.

圖71c 費宥諒，金崙天主堂，1956。圖版：趙川明編，《後山傳愛：白冷會臺東60年的影像故事》（臺東：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2013），頁255。

圖71d 費宥諒，金崙天主堂，聖壇空間，1956。圖版：趙川明編，《後山傳愛：白冷會臺東60年的影像故事》（臺東：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2013），頁256。

圖72 費宥諒，都歷天主堂，1956。圖版：譚文慧攝影。

圖73a 費宥諒，泰源天主堂，1956。圖版：Staatsarchiv, Luzern.

圖73b 費宥諒，泰源（Kirchlein in Taiyuan）（1956.7.31）。圖版：Staatsarchiv, Luzern.

圖74a 費宥諒，聖母堂，三重縣四日市市，1956。圖版：Fabrizio Brentini, *Karl Freuler. Architektur für die Kirche. Japan 1948-1968* (Baden: Verlag Lars Müller, 1992), p. 45.

圖74b 費宥諒，三重縣四日市市（Yokkaichi-Mie），聖母堂，1956。圖版： Fabrizio Brentini, *Karl Freuler. Architektur für die Kirche. Japan 1948-1968* (Baden: Verlag Lars Müller, 1992), pp. 44-45.

圖75 費宥諒，尚武天主堂（Kirche in Schang- Wu）（1956.2.5）。圖版：Staatsarchiv, Luzern.

圖76a 費宥諒，大鳥天主堂（Kirchlein in Da- Niau）（1961.4.20）。圖版：Staatsarchiv, Luzern.

圖76b 費宥諒，大鳥天主堂。圖版：臺東白冷會。

圖76c 費宥諒，大鳥天主堂。圖版：臺東白冷會；原稿電腦描圖，譚文慧繪製。

圖76d 費宥諒，大鳥天主堂，1962。圖版：趙川明編，《後山傳愛：白冷會臺東60年的影像故事》（臺東：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2013），頁266。

圖76e 費宥諒，大鳥天主堂，1962。圖版：臺東白冷會。

圖77 鹿野，寶華山禮拜堂，1966。圖版：Immensee, SMB Archiv.

圖78 永康，聖若望天主堂，1966。圖版：趙川明編，《後山傳愛：白冷會臺東60年的影像故事》（臺東：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2013），頁153。

圖79a 費宥諒，宜灣天主堂，1960，平面圖。圖版：譚文慧繪製。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79b 費宥諒，宜灣天主堂，1960，東立面圖。圖版：譚文慧繪製。

圖79c 費宥諒，宜灣天主堂，1960，南剖面圖。圖版：譚文慧繪製。

圖79d 費宥諒，宜灣天主堂，1960，教堂內部面南。圖版：徐鈺涵攝影。

圖79e 費宥諒，宜灣天主堂，1960。圖版：趙川明編，《後山傳愛：白冷會臺東60年的影像故事》（臺東：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2013），頁301。

圖80a 費宥諒，名古屋市南山聖十字教會，1958。圖版：Fabrizio Brentini, *Karl Freuler. Architektur für die Kirche. Japan 1948-1968* (Baden: Verlag Lars Müller, 1992), p. 55.

圖80b 費宥諒，名古屋市南山聖十字教會，1958。圖版：Immensee, SMB Archiv.

圖81a Fritz Metzger, St. Felix und Regula, Zürich, 1950-1951. 圖版：Schweizer St. Lukasgesellschaft ed., *Kirchenbauten von Hermann Baur und Fritz Metzger* (Würzburg: Echter Verlag, 1956), p. 52.

圖81b Fritz Metzger, St. Felix und Regula, Zürich, 1950-1951. 圖版：Schweizer St. Lukasgesellschaft ed., *Kirchenbauten von Hermann Baur und Fritz Metzger* (Würzburg: Echter Verlag, 1956), p. 54.

圖81c Fritz Metzger, St. Felix und Regula, Zürich, 1950-1951. 圖版：“Fritz Metzger,” *Wikipedia*, 30 Dec. 2014. <https://de.wikipedia.org/wiki/Fritz_Metzger#/media/File:Kirche_St._Felix_und_Regula_Z%C3%BCrich-Hard_Aussenansicht.JPG>（2015年3月9日檢索）

圖82a Hermann Baur, St. Laurentius church, Winterthur-Wülflingen, 1955-1959. 圖版：Schweizer St. Lukasgesellschaft ed., *Kirchenbauten von Hermann Baur und Fritz Metzger* (Würzburg: Echter Verlag, 1956), p. 134.

圖82b Hermann Baur, St. Laurentius church, Winterthur-Wülflingen, 1955-1959. 圖版：Schweizer St. Lukasgesellschaft ed., *Kirchenbauten von Hermann Baur und Fritz Metzger* (Würzburg: Echter Verlag, 1956), p. 135.

圖82c Hermann Baur, St. Laurentius church, Winterthur-Wülflingen, 1955-1959. 圖版：“St. Laurentius (Winterthur-Wülflingen),” *Wikipedia*, 27 Aug. 2015.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Laurentius_Winterthur-W%C3%BClflingen_Altarraum.JPG#/media/File:Laurentius_Winterthur-W%C3%BClflingen_Altarraum.JPG>（2015年4月10日檢索）

圖83a Fritz Metzger, Bruder Klaus Kirche, Gerlafingen-Solothurn, 1956. 圖版：Schweizer St. Lukasgesellschaft ed., *Kirchenbauten von Hermann Baur und Fritz Metzger* (Würzburg: Echter Verlag, 1956), p. 58.

圖83b Fritz Metzger, Bruder Klaus Kirche, Gerlafingen-Solothurn, 1956. 圖版：Schweizer St. Lukasgesellschaft ed., *Kirchenbauten von Hermann Baur und Fritz Metzger* (Würzburg: Echter Verlag, 1956), p. 59.

圖84 費宥諒，中寮天主堂（Dschungliau）（1959.10.8）。圖版：Staatsarchiv, Luzer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85a　果毅天主堂，1965，平面圖。圖版：譚文慧繪製。

圖85b　果毅天主堂，1965。圖版：Georg Horst Reis, *Taiwan-Mission der Kölnischen Franziskaner Provinz. Von den Missionaren gegründeten Pfarreien, Kirchen, Kapellen, Ordenshäuser und Schulen 1953-1975* (Franziskanerkloster Neviges, 2008), n. pag.

圖85c　果毅天主堂，聖壇區對牆。圖版：譚文慧攝影。

圖86a　費宥諒，烏石鼻天主堂設計圖（1962.5.22）。圖版：Staatsarchiv, Luzern.

圖86b　費宥諒，烏石鼻天主堂，1963。圖版：趙川明編，《後山傳愛：白冷會臺東60年的影像故事》（臺東：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2013），頁301。

圖86c　費宥諒，烏石鼻天主堂，1963。圖版：趙川明編，《後山傳愛：白冷會臺東60年的影像故事》（臺東：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2013），頁223。

圖86d　費宥諒，烏石鼻天主堂設計圖。圖版：Staatsarchiv, Luzern.

圖87　費宥諒，八日市市（Yokaichi）教堂設計圖，1964。圖版：Immensee, SMB Archiv.

圖88a　費宥諒，三重縣伊勢市，聖多瑪木崎教會（Parish church of St. Thomas Kozaki），1966。圖版：Fabrizio Brentini, *Karl Freuler. Architektur für die Kirche. Japan 1948-1968* (Baden: Verlag Lars Müller, 1992), p. 114.

圖88b　費宥諒，三重縣伊勢市，聖多瑪木崎教會（Parish church of St. Thomas Kozaki），1966。圖版：Fabrizio Brentini, *Karl Freuler. Architektur für die Kirche. Japan 1948-1968* (Baden: Verlag Lars Müller, 1992), p. 115.

圖89a　Werner Max Moser, New Apostolic Church, Genf, 1950. 圖版：“Neuapostolische Kirche in Genf, 1949/50,” *Das Werk*, 39 (1952), p. 42.

圖89b　Werner Max Moser, New Apostolic Church, Genf, 1950. 圖版：“Neuapostolische Kirche in Genf, 1949/50,” *Das Werk*, 39 (1952), p. 45.

圖90a　費宥諒，京都主教座堂，1968。圖版：Fabrizio Brentini, *Karl Freuler. Architektur für die Kirche. Japan 1948-1968* (Baden: Verlag Lars Müller, 1992), p. 117.

圖90b　費宥諒，京都主教座堂，1968。圖版：Fabrizio Brentini, *Karl Freuler. Architektur für die Kirche. Japan 1948-1968* (Baden: Verlag Lars Müller, 1992), p. 121.

圖90c　費宥諒，京都主教座堂，1968。圖版：Immensee, SMB Archiv.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1　費宥諒的慣用印章（擷自大南天主堂設計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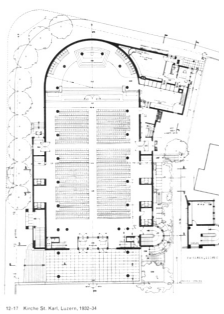


圖2　Fritz Metzger　St. Karl church　Luzern　1932-1934



圖3　Johannes Hugentobler　Maria zum Ahorn (Wallfahrtskapelle)　1937　Appenzell Kanton（擷自費宥諒剪貼簿中的圖片）



圖4　Kühmatt Kapelle　Mariä Heimsuchung 1646-164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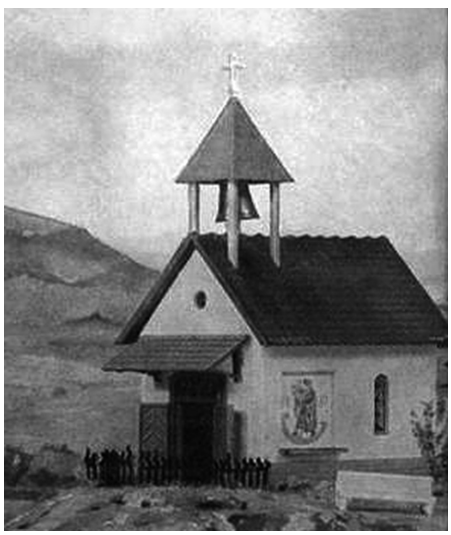


圖5　鄉村教堂模型圖錄（Faller公司的兒童模型組裝玩具）　19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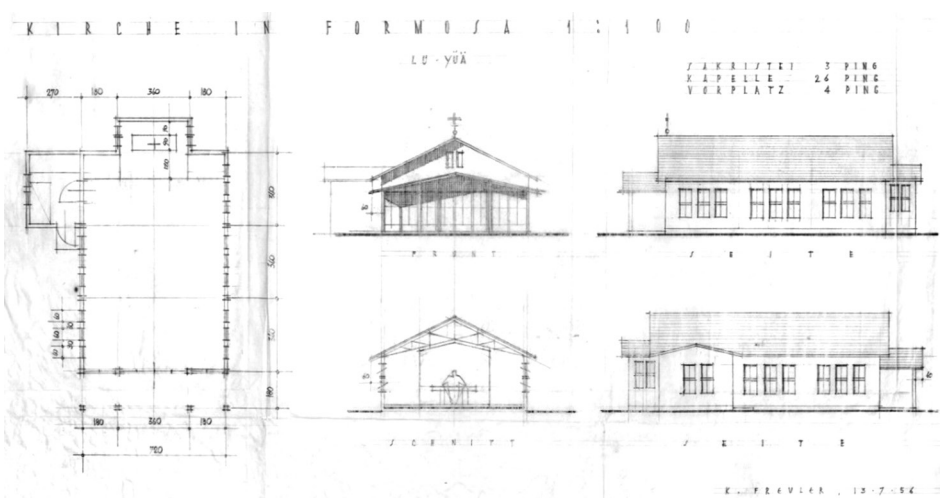


圖6　費宥諒　鹿野天主堂（Kirche in Lu Yüä）（1956.7.1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7a 鹿野 龍田天主堂 1956



圖7b 鹿野 永安天主堂 1957



圖7c 費宥諒 石坑天主堂 195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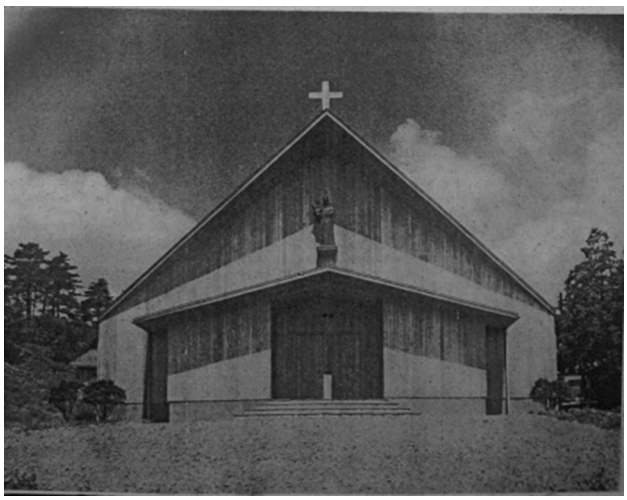


圖8　費宥諒　神奈川縣橫濱市菊名　聖安東天主堂　1957



圖9a　費宥諒（？）平安村　聖若瑟天主堂　1957



圖9b　費宥諒（？）官田　聖安東尼天主堂　1957



圖10　費宥諒（？）臺東大鳥天主堂　1955



圖11　費宥諒（？）臺東南興天主堂　195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12 費宥諒 神奈川縣茅崎市（Chigasaki – Yokohama）無原罪の聖母堂 19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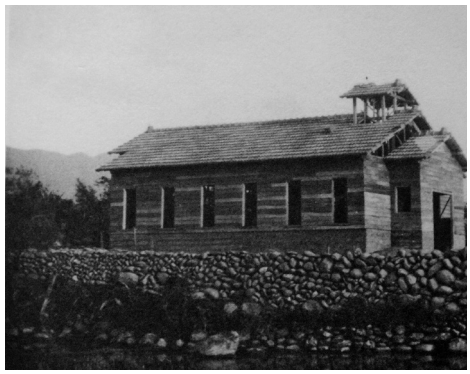


圖13 鹿野 和平天主堂 19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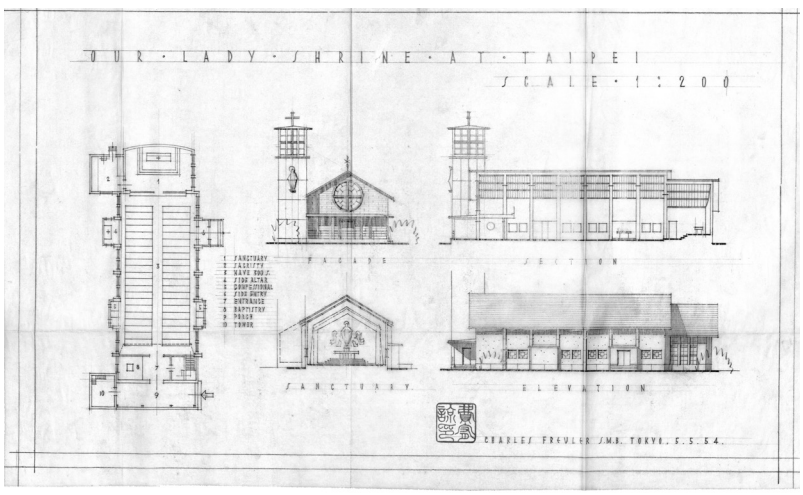


圖14 費宥諒 臺北聖母堂（Our Lady Shrine at Taipei）（1954.5.5）
1. 聖壇區 2. 聖器室 3. 中殿（500席位） 4. 副壇 5. 告解室 6. 側門 7. 大門 8. 洗禮堂 9. 門廊 10. 鐘樓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15 費宥諒 吉祥寺市 聖靈教會（Holy Ghost church Kichijori -Tokyo） 19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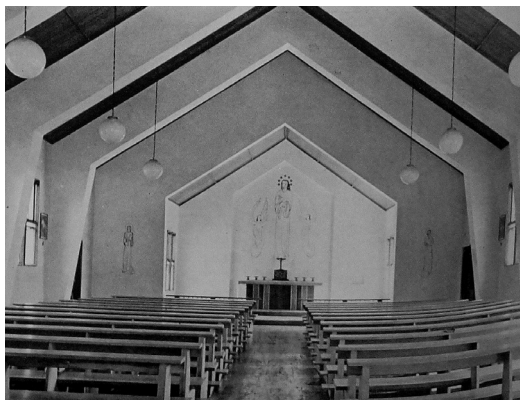


圖16 費宥諒 神奈川縣茅崎市（Chigasaki - Yokohama）無原罪の聖母堂 1952



圖17 費宥諒 仙臺 聖道明天主堂（St. Dominik church Sendai） 1950



圖18 費宥諒 一關天主堂（Ichinoseki church Iwate） 1952



圖19 費宥諒 館山聖十字堂（Holy Cross church Tateyama） 1950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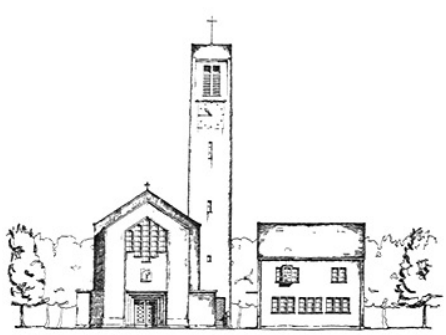


圖20a Fritz Metzger Oerlikon church 192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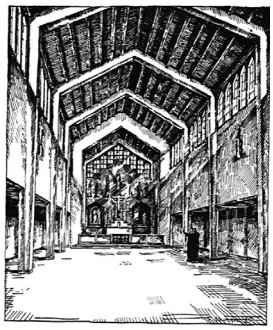


圖20b Fritz Metzger Oerlikon church 19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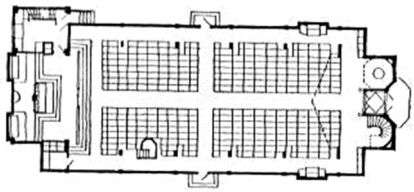


圖20c Fritz Metzger Oerlikon church 1926



圖21a Otto Dreyer St. Anton church
Stettenbach - Grosswangen 1932



圖21b Otto Dreyer St. Anton church
Stettenbach - Grosswangen 19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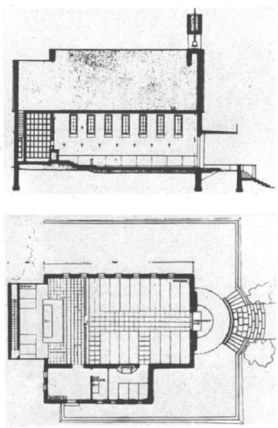


圖21c Otto Dreyer St. Anton church
Stettenbach - Grosswangen 193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22a 費宥諒（？） 新港安德肋堂 1955



圖22b 費宥諒（？） 新港安德肋堂 1955



圖23 費宥諒（？） 佳里聖三堂 19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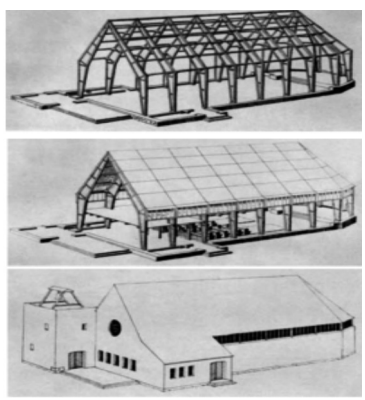


圖24 Otto Bartning 臨時教堂建蓋步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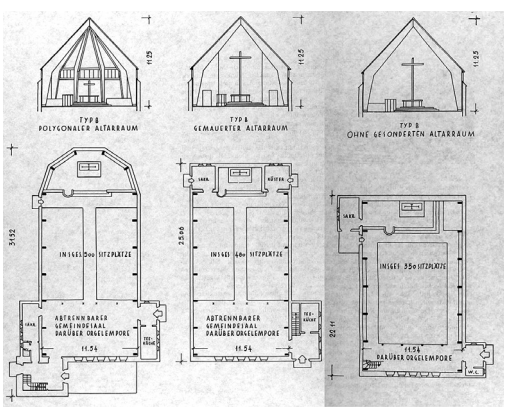


圖25 Otto Bartning 臨時教堂類型B的三種形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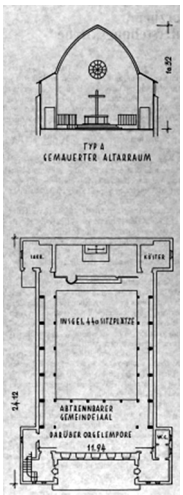


圖26　Otto Bartning　臨時教堂類型A



圖27　費宥諒　一關天主堂（Ichinoseki church, Iwate）　19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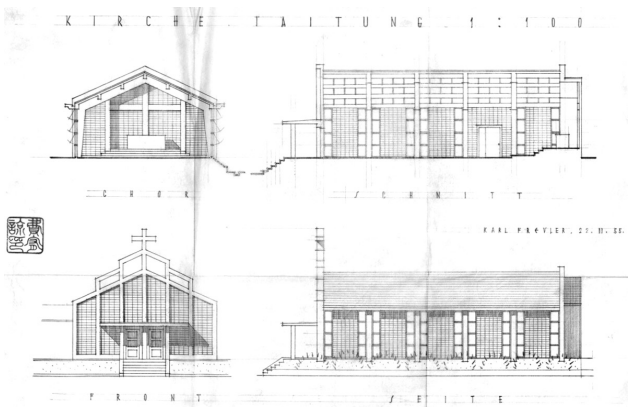


圖28a　費宥諒　中華殉道烈士堂（Kirche Taitung）（1955.11.22）



圖28b　費宥諒　中華殉道烈士堂　現狀（201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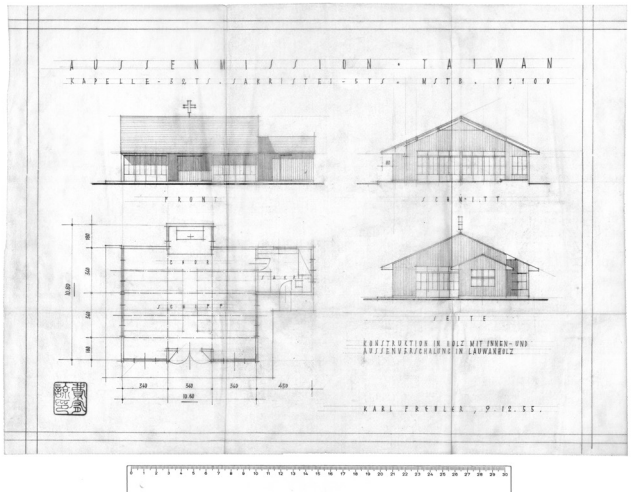


圖29 費宥諒 堂口小禮拜堂（1955.1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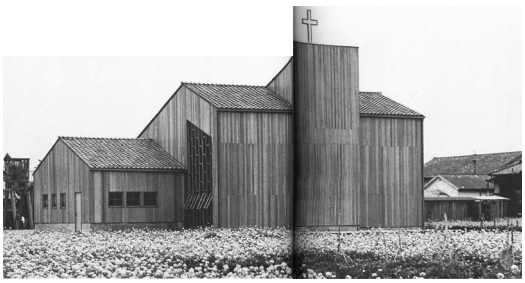


圖30 費宥諒 三重縣四日市市聖母堂（Yokkaichi-Mie）1956



圖31 費宥諒 北海道苫小牧市 聖母堂（Tomakomai） 19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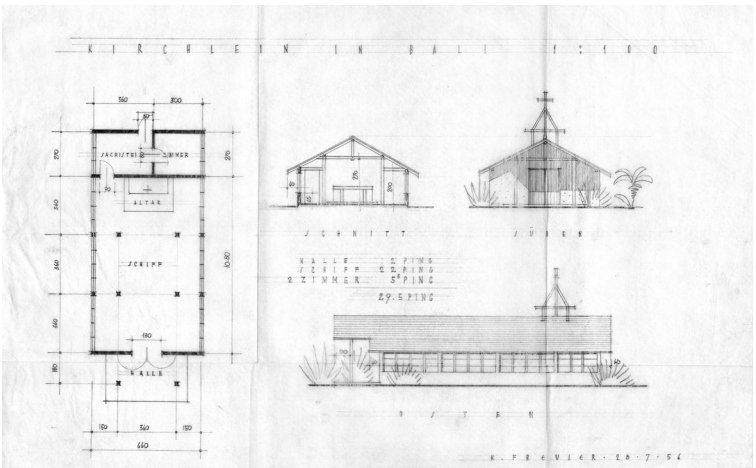


圖32 費宥諒 Bali小教堂（Kirchlein in Bali）（1956.7.2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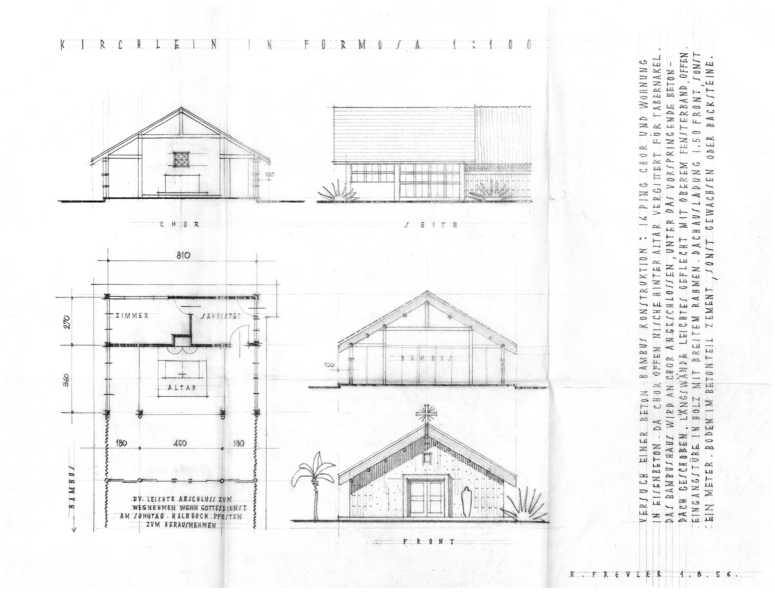


圖33　費宥諒　福爾摩沙小教堂（Kirchlein in Formosa）（1956.8.1）



圖34　利吉天主堂　195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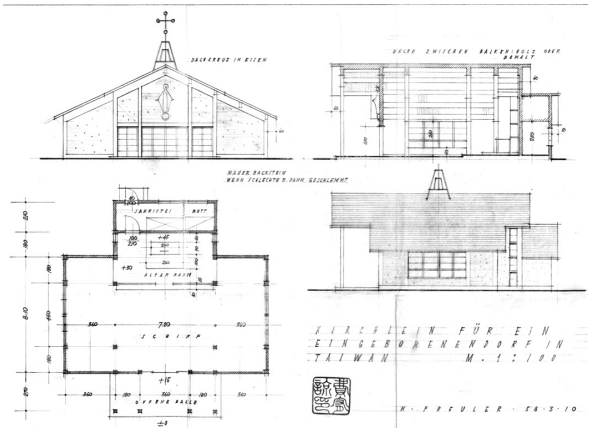


圖35　費宥諒　大南（東興）天主堂（Kirchlein für ein Eingeborenendorf in Taiwan）（1958.3.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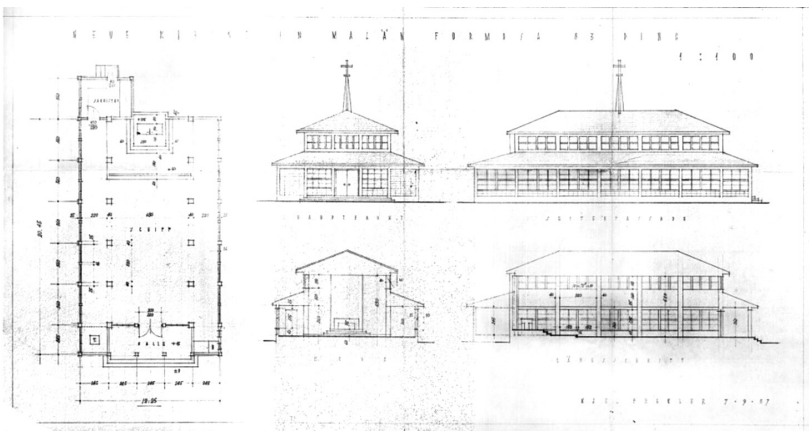


圖36a　費宥諒　馬蘭天主堂（1957.9.7）



圖36b　費宥諒　馬蘭天主堂　梵二公會前



圖36c　費宥諒　馬蘭天主堂　西面與南面　201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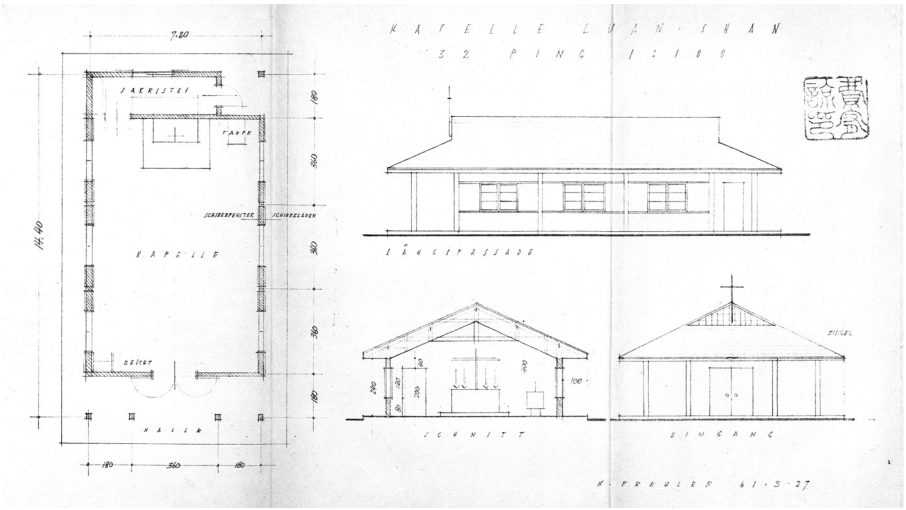


圖37　費宥諒　鸞山（Kapelle Luan Shan）（196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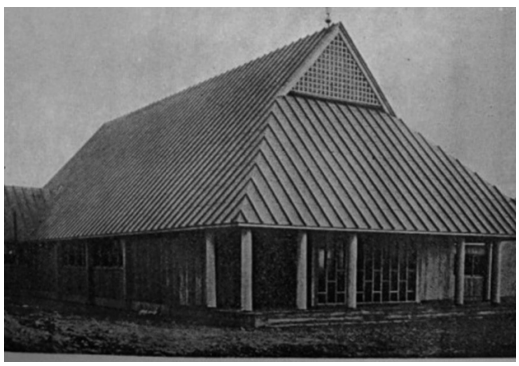


圖38　費宥諒　北海道苫小牧市　聖母堂
（Mary's church Tomakomai）　19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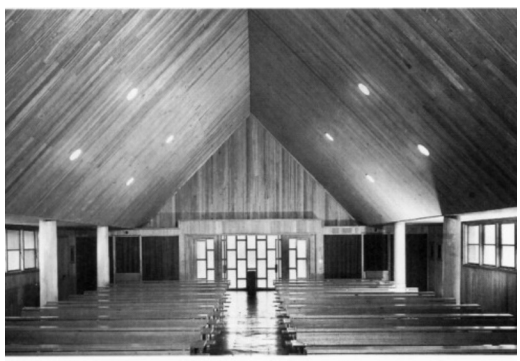


圖39　費宥諒　北海道苫小牧市　聖母堂
（Mary's church Tomakomai）　1956



圖40　費宥諒　鎌倉市大磯町　聖母堂
（Mary's church Oiso-Kamakura）　1955



圖41　費宥諒　鎌倉市大磯町　聖母堂
（Mary's church Oiso-Kamakura）　195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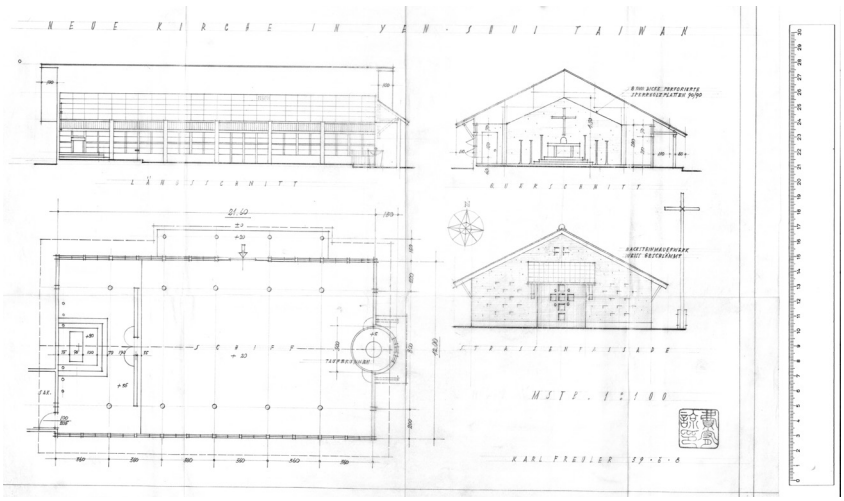


圖42a　費宥諒　鹽水聖神堂（Neue Kirche in Yen Shui Taiwan）（1959.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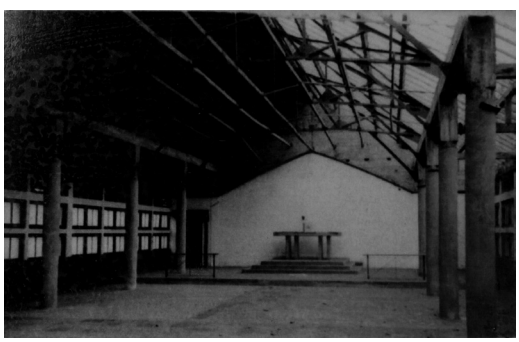


圖42b　費宥諒　鹽水聖神堂　19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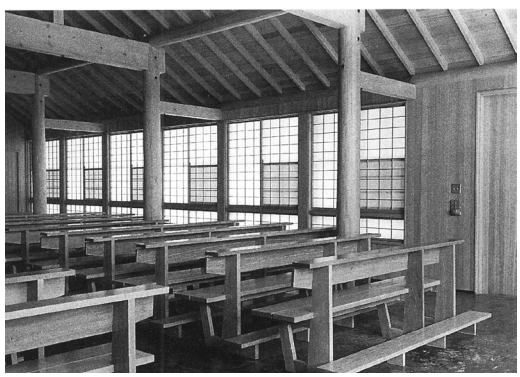


圖43　費宥諒　東京板橋區　聖伊莉莎白天主堂（St. Elisabeth church Tokyo- Itabashi）195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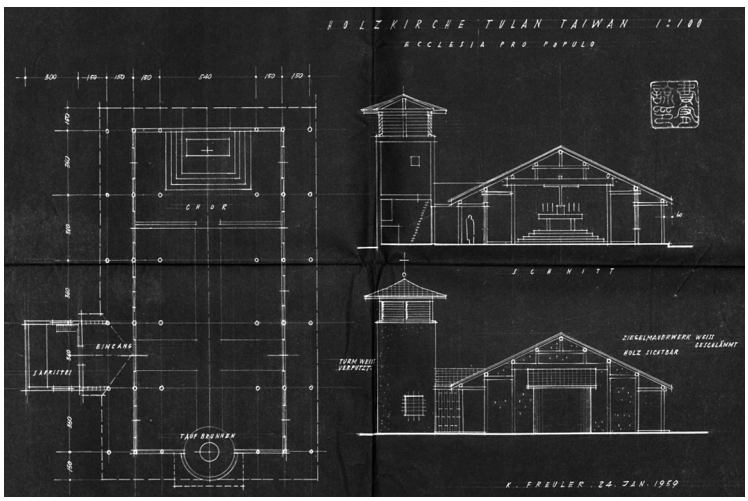


圖44　費宥諒　都蘭天主堂（Holzkirche Tulan Taiwan）（1959.1.24）



圖45　Riegelhaus (Fachwerk)　1550　Burg Zug, Zug, 瑞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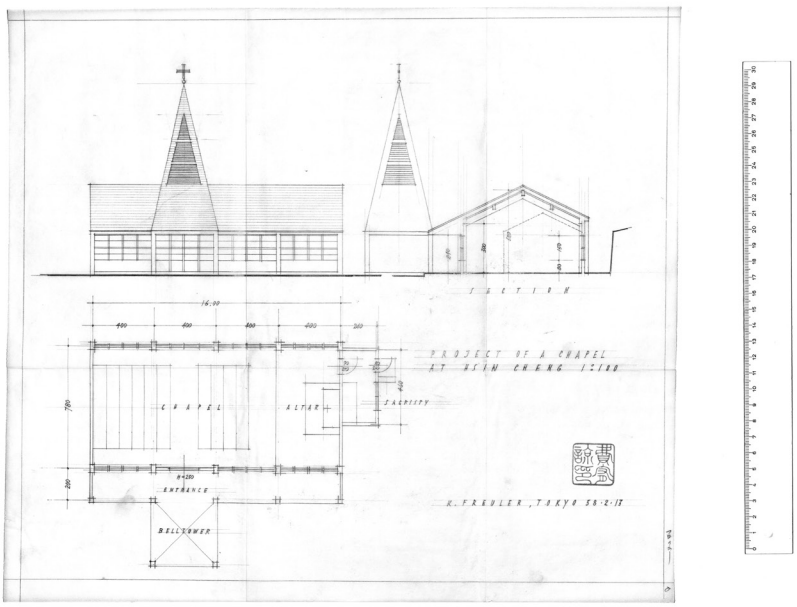


圖46　費宥諒　新城禮拜堂（Project of a chapel at Hsin Cheng）（1958.2.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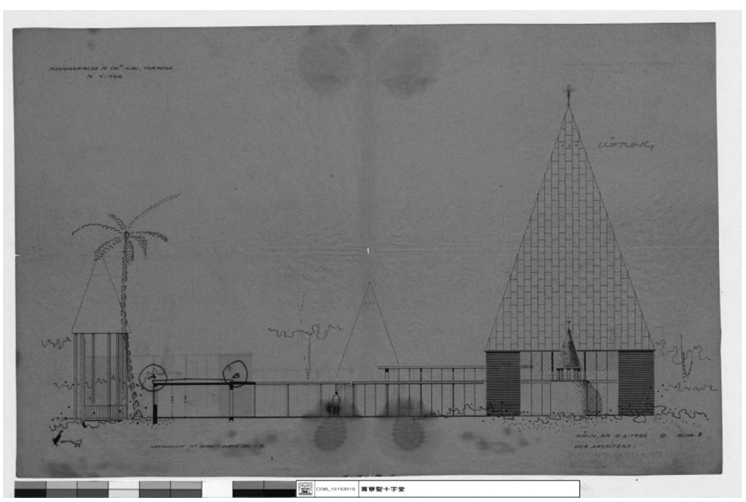


圖47　Gottfried Böhm　菁寮天主堂　195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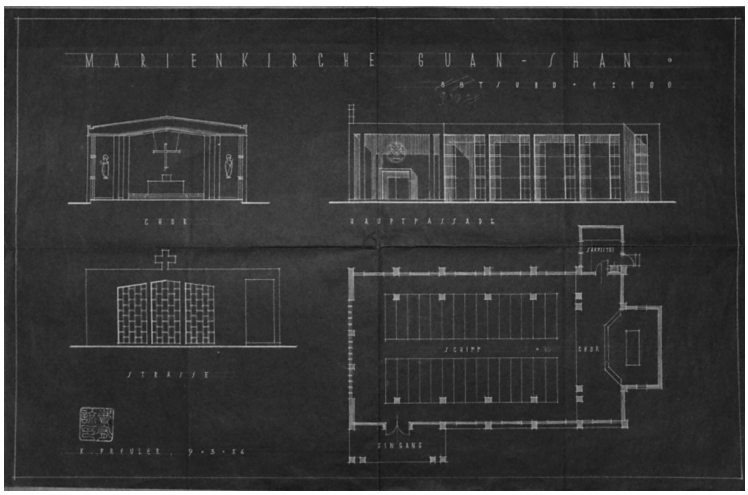


圖48a 費宥諒 關山聖母堂（1956.3.9）



圖48b 費宥諒 關山聖母堂



圖48c 關山天主堂入口標誌



圖49 費宥諒 長浦天主堂（Nagaura church Aichi） 1950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50a Hermann Baur St. Michael church (Hirzbrunnen-Basel) 1948/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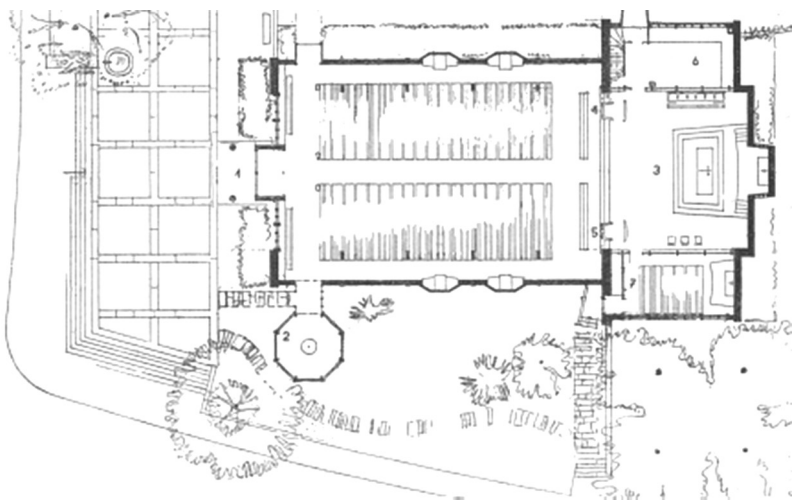


圖50b Hermann Baur St. Michael church (Hirzbrunnen-Basel) 1948/49



圖50c Hermann Baur St. Michael church (Hirzbrunnen-Basel) 1948/4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51a Josef Schütz St. Mary's church (Solothurn -Weststadt) 1953/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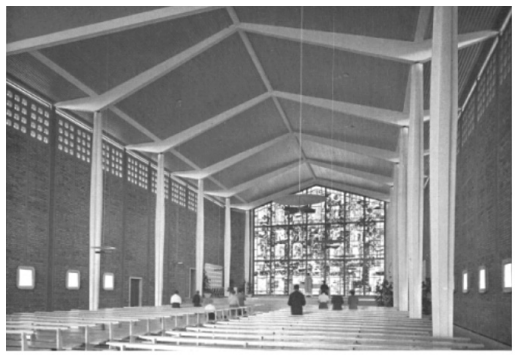


圖 51b Josef Schütz St. Mary's church (Solothurn –Weststadt) 1953/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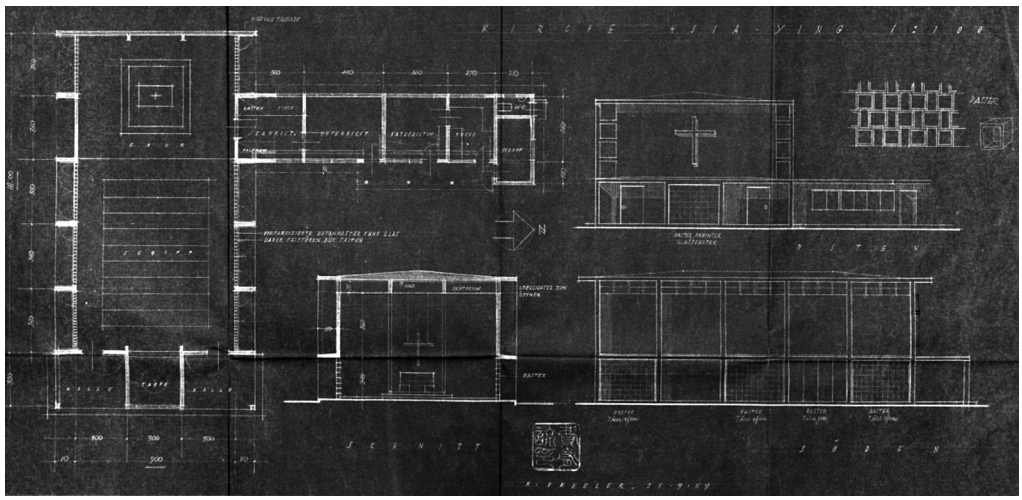


圖52 費宥諒 下營天主堂（Kirche Hsia Ying）（1959.9.2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53a Hermann Baur St. Mary's church Olten 19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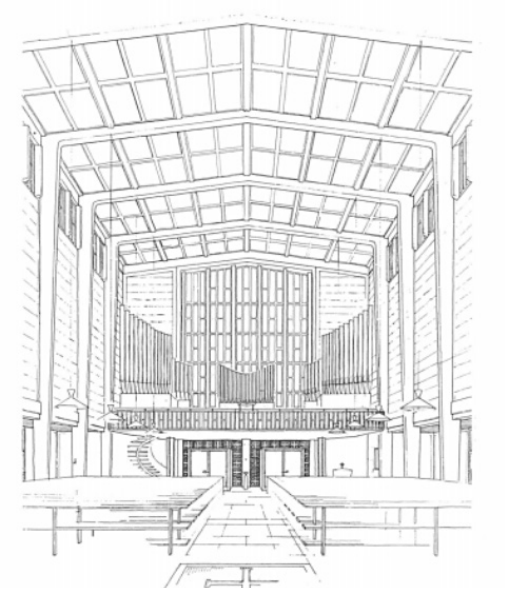


圖53b Hermann Baur St. Mary's church Olten 19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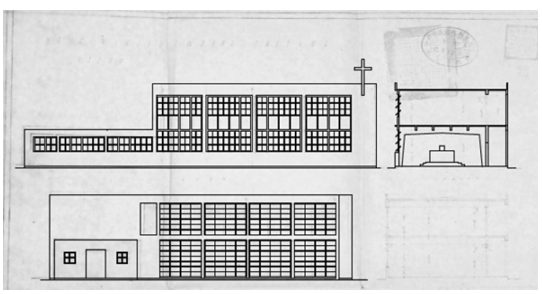


圖54a 費宥諒 臺東培質院 原稿電腦描圖 有十字架的南向鄰街面 東面入口 教堂剖面 1958（譚文慧繪）





圖54b 費宥諒 臺東培質院 有十字架的南向鄰街面（上） 東面入口與庭院（下） 19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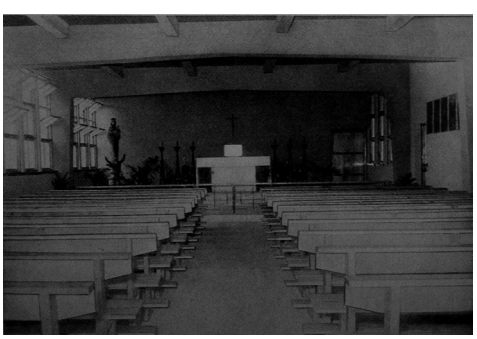


圖54c 費宥諒 臺東培質院 禮拜堂 195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55 費宥諒 宮古天主堂（Miyako） 19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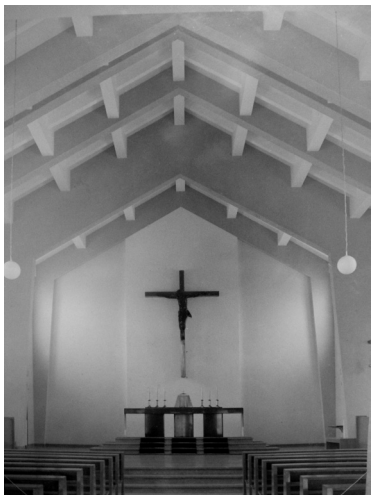


圖56 費宥諒 東京主教行政大樓聖堂 1953



圖57a 費宥諒 臺東寶桑天主堂 19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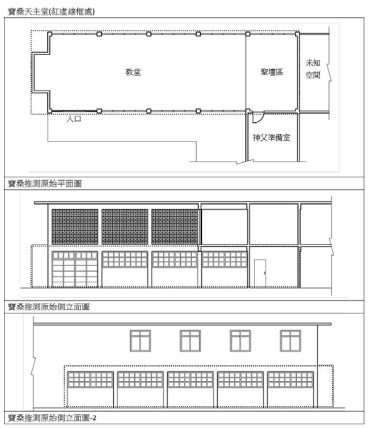


圖57b 費宥諒 臺東寶桑天主堂推測原始平面圖與立面圖（譚文慧繪）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58a 費宥諒 臺東白冷會會院 19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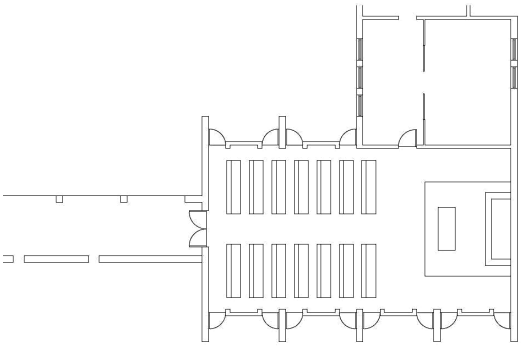


圖58b 費宥諒 臺東白冷會會院 聖堂 原稿電腦描圖 1966（譚文慧繪）



圖58c 費宥諒 臺東白冷會會院聖堂 19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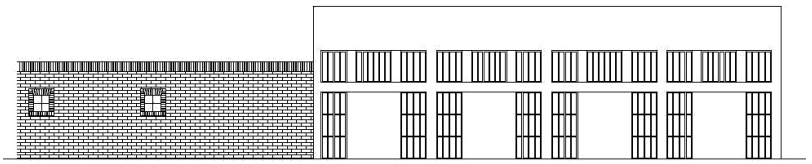


圖58d 費宥諒 臺東白冷會會院 聖堂原稿電腦描圖 1966（譚文慧繪）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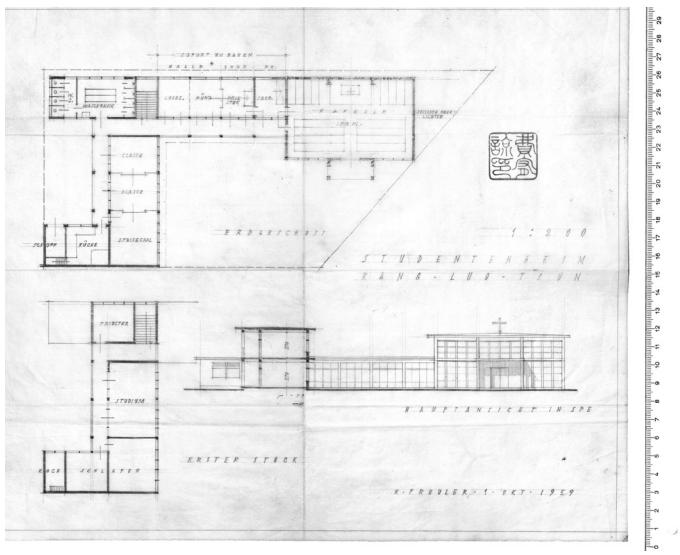


圖59　費宥諒　臺東康樂培質院（Studentenheim Kang Luo Tsun）（1959.1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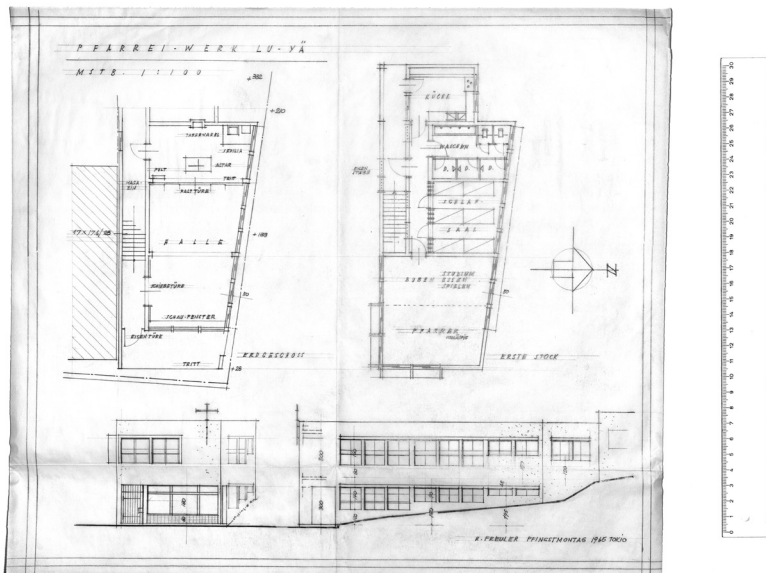


圖60　費宥諒　鹿野（Pfarreiwerk Lu-Yä）（1965.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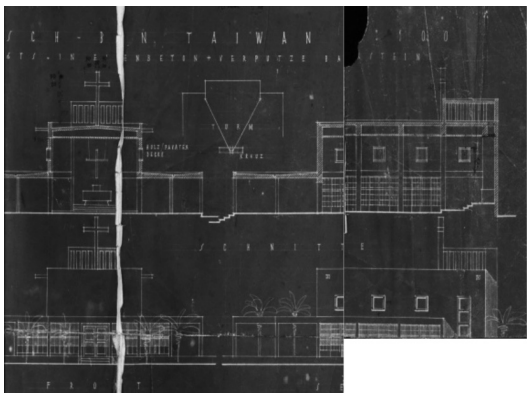


圖61a 費宥諒 知本天主堂 19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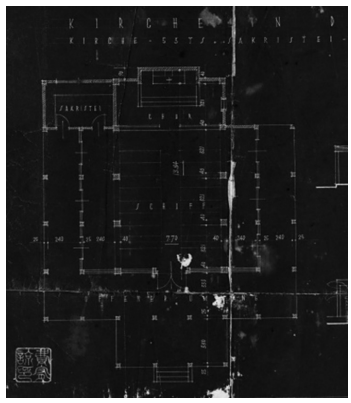


圖61b 費宥諒 知本天主堂 1956



圖61c 費宥諒 知本天主堂 1956



圖61d 費宥諒 知本天主堂 19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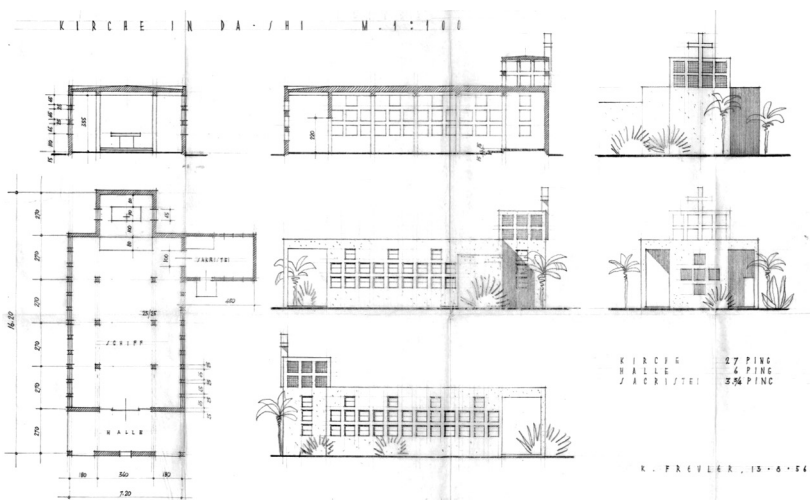


圖62a 費宥諒 大溪天主堂（Kirche in Da Shi）（1956.8.1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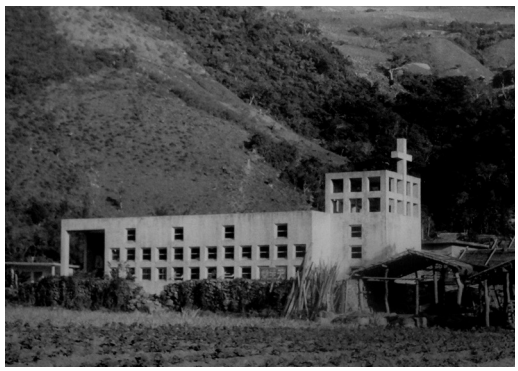


圖62b 費宥諒 大溪天主堂 19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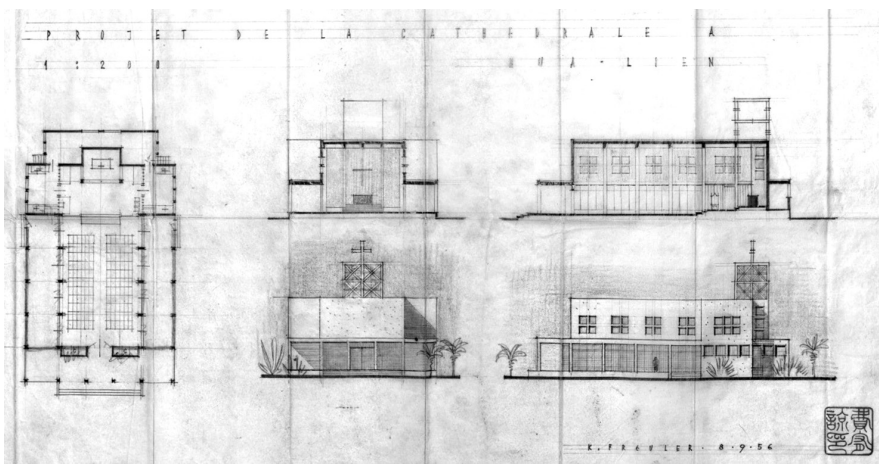


圖63a 費宥諒 花蓮主教座堂（美崙進教之佑堂）（1956.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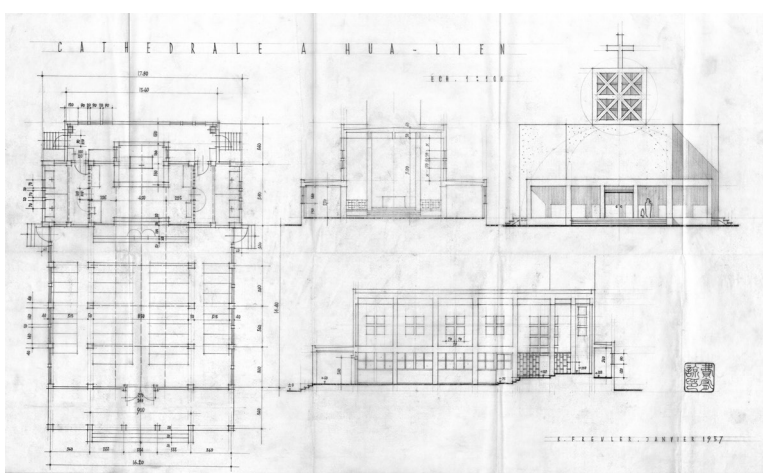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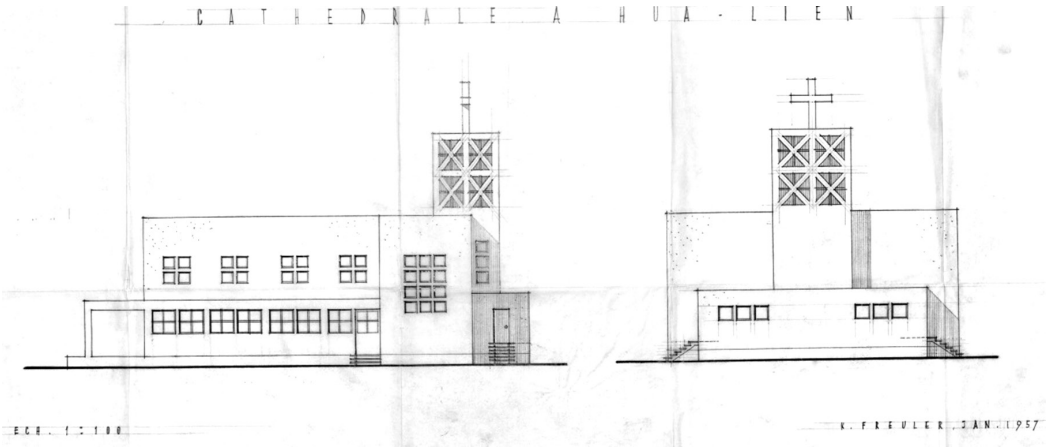


圖63b 費宥諒 花蓮主教座堂（美崙進教之佑堂）（1957.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63c 費宥諒 花蓮主教座堂（美崙進教之佑堂）（1957.1）



圖63d 費宥諒 花蓮主教座堂



圖63e 費宥諒 花蓮主教座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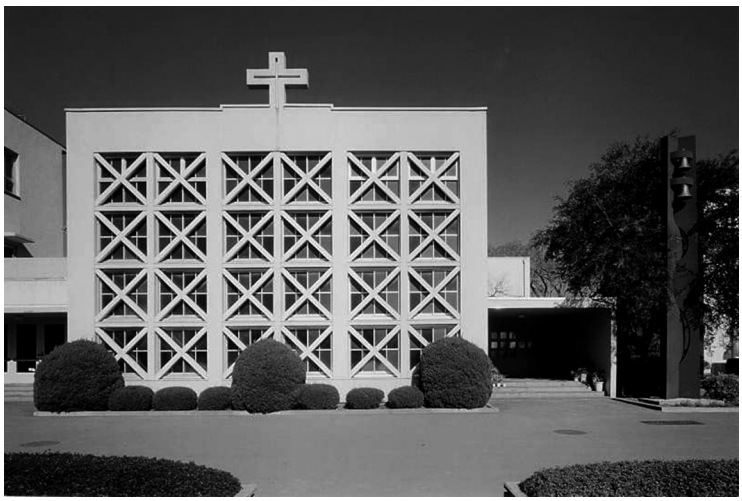


圖64 費宥諒 星美學園
聖堂 東京都北區
赤羽 195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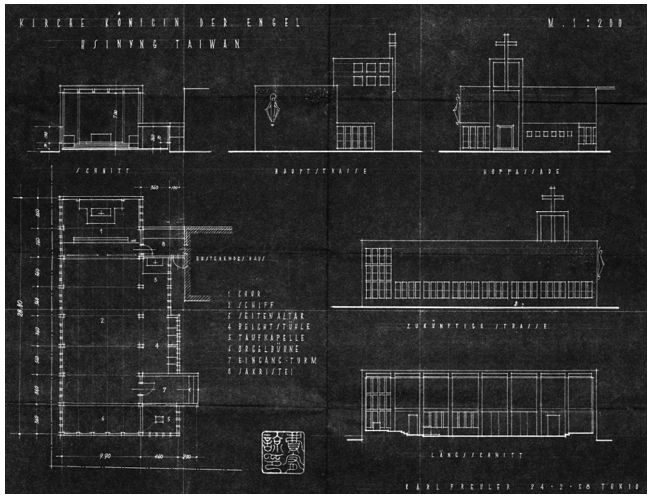


圖65a　費宥諒　新營天使之后堂（Kirche Königin der Engel Hsinying Taiwan）（1958.2.24）
1. 聖壇區 2. 主廊 3. 副壇 4. 告解椅 5. 洗禮堂 6. 管風琴台 7. 入口與鐘樓 8. 聖器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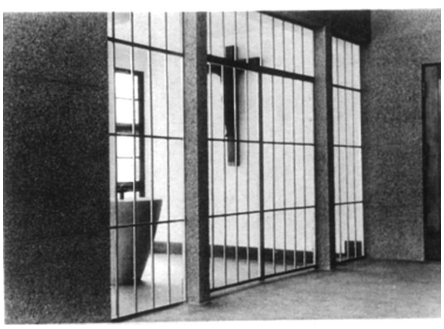


圖65b　費宥諒　新營天使之后堂　緊鄰入口的獨立洗禮堂



圖65c　費宥諒　新營天使之后堂　主廊與聖壇區



圖65d　費宥諒　新營天使之后堂　1958



圖65e　費宥諒　新營天使之后堂　側廊與副壇　195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65f 費宥諒 新營天使之后堂 19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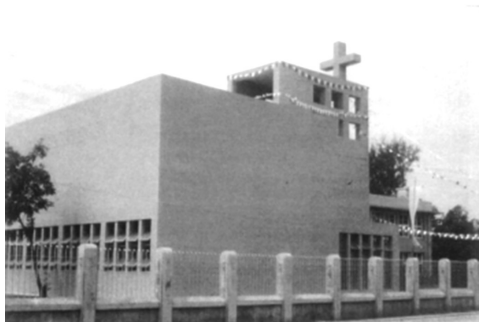


圖65g 費宥諒 新營天使之后堂 19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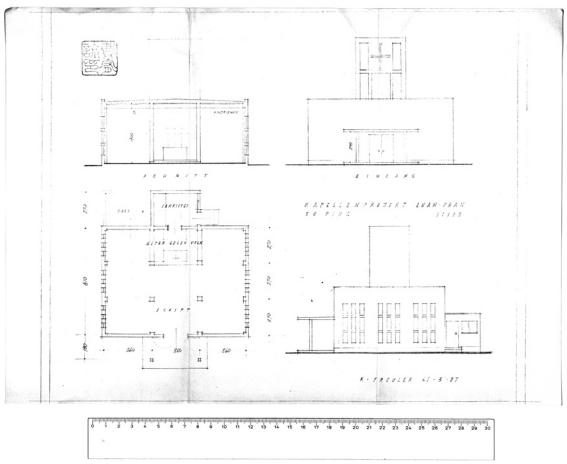


圖66 費宥諒 臺東鸞山禮拜堂（1961.3.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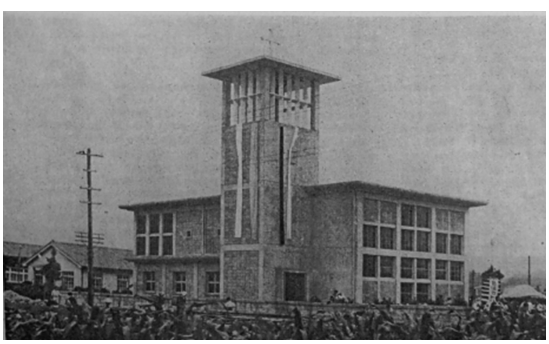


圖67 費宥諒 小名濱市聖施洗約翰堂（Onahama） 1956



圖68 費宥諒 京都衣笠聖靈堂（Kinugasa-Kyoto） 195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69 費宥諒 澀谷區聖道明會修道院天主堂（Monastery of St. Dominic Tokyo-Shibuya） 19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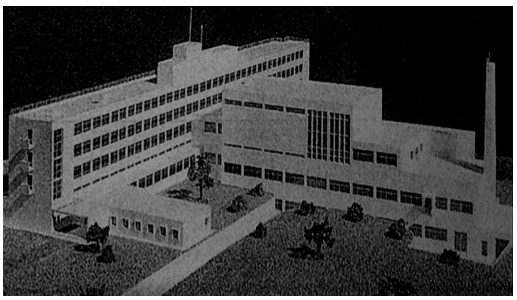


圖70a 費宥諒 東京司教區神學院模型（Model Seminary of Archdiocese of Tokyo） 1959



圖70b 費宥諒 東京司教區神學院（Seminary of Archdiocese of Tokyo） 19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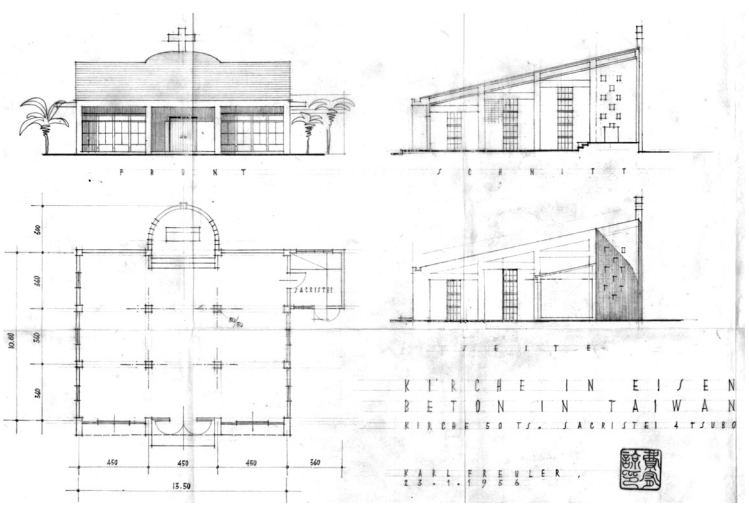


圖71a 費宥諒 金崙天主堂（Kirche in Eisen Beton in Taiwan）（1956.1.2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71b 費宥諒 金崙天主堂 1956



圖71c 費宥諒 金崙天主堂 1956



圖71d 費宥諒 金崙天主堂 聖壇空間 1956



圖72 費宥諒 都歷天主堂 1956（譚文慧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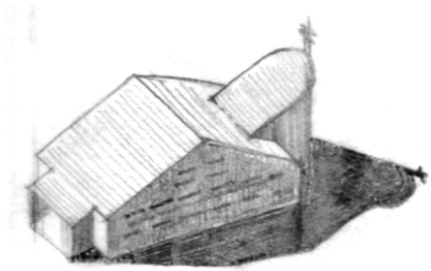


圖73a 費宥諒 泰源天主堂 19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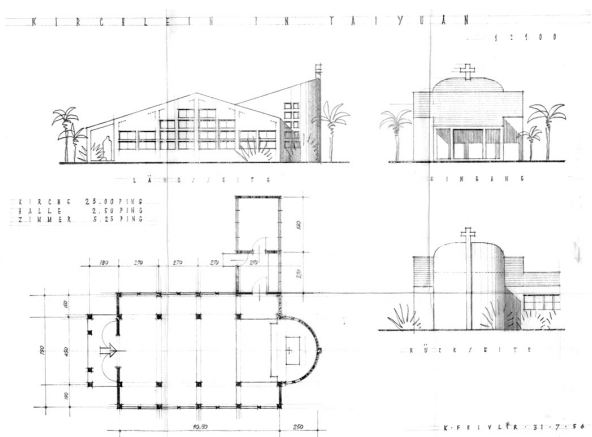


圖73b 費宥諒 泰源（Kirchlein in Taiyuan）（1956.7.3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74a 費宥諒 聖母堂 三重縣四日市市 19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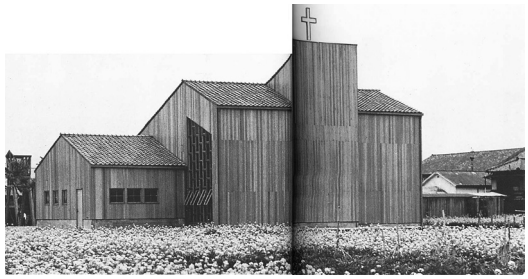


圖74b 費宥諒 聖母堂 三重縣四日市市 19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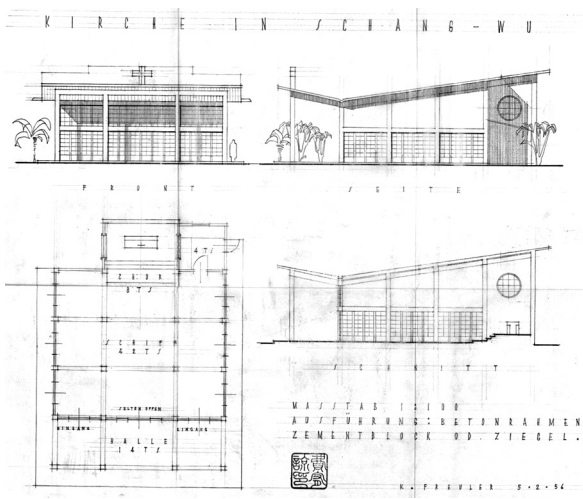


圖75 費宥諒 尚武天主堂（Kirche in Schang- Wu）（1956.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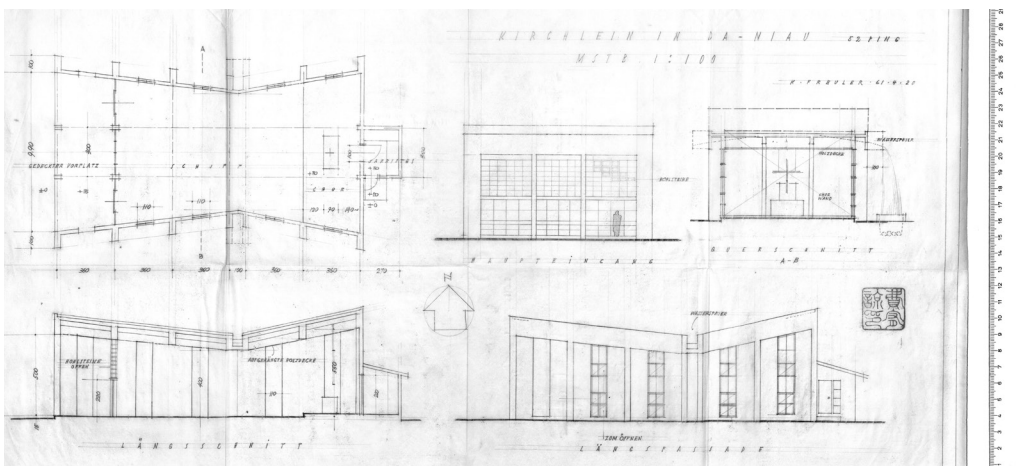


圖76a 費宥諒 大鳥天主堂（Kirchlein in Da- Niau）（1961.4.2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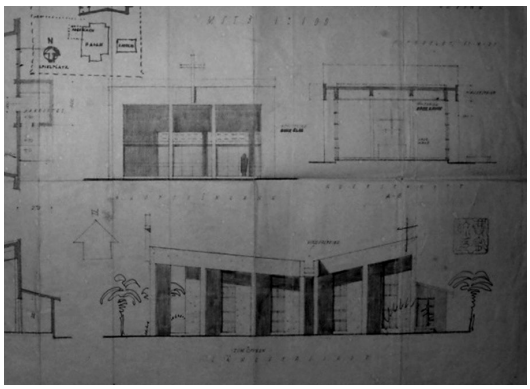


圖76b 費宥諒 大鳥天主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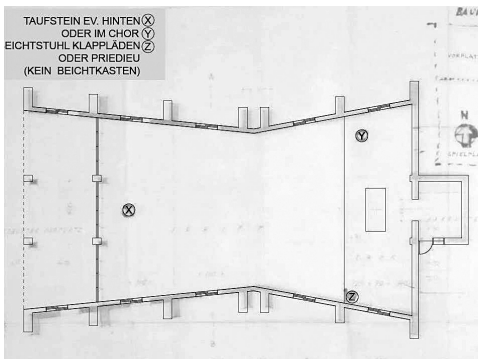


圖76c 費宥諒 大鳥天主堂 原稿電腦描圖
X. 洗禮池或許可在後方；Y. 或在聖壇區；Z. 百葉窗的告解室或祈禱臺



圖76d 費宥諒 大鳥天主堂 1962



圖76e 費宥諒 大鳥天主堂 1962



圖77 鹿野 寶華山禮拜堂 1966



圖78 永康 聖若望天主堂 196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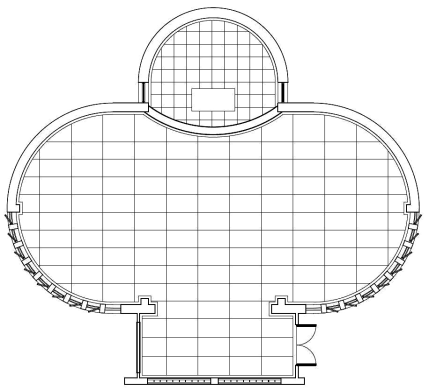


圖79a 費宥諒 宜灣天主堂 1960 平面圖（譚文慧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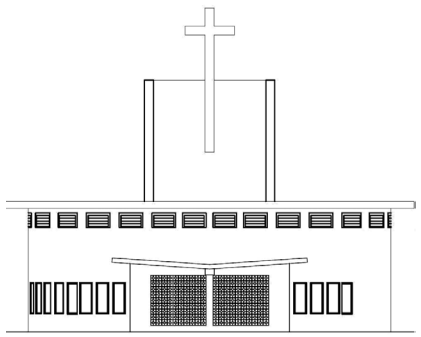


圖79b 費宥諒 宜灣天主堂 1960 東立面圖（譚文慧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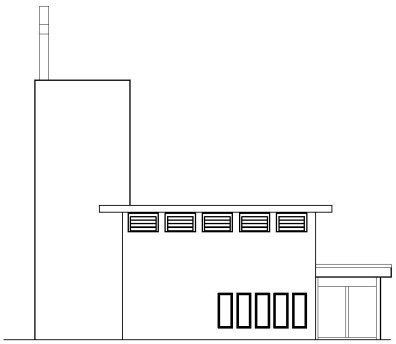


圖79c 費宥諒 宜灣天主堂 1960 南剖面圖（譚文慧繪）



圖79d 費宥諒 宜灣天主堂 1960 教堂內部面南（徐鈺涵攝 2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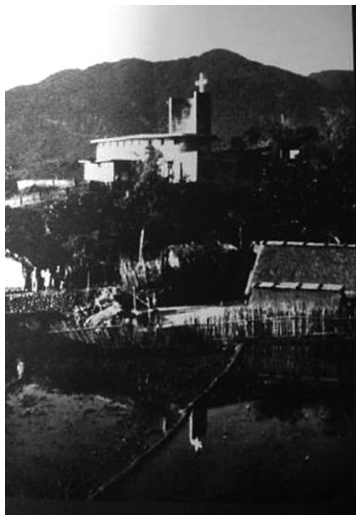


圖79e 費宥諒 宜灣天主堂 196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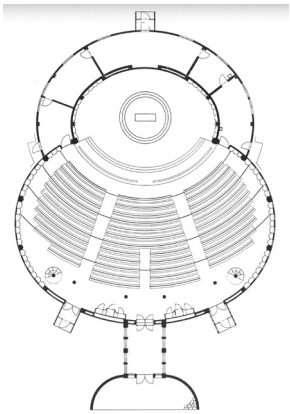


圖80a 費宥諒 名古屋市南山聖十字教會 1958



圖80b 費宥諒 名古屋市南山聖十字教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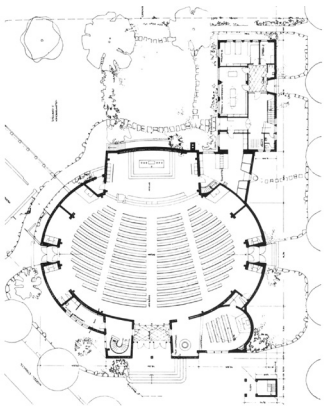


圖81a Fritz Metzger St. Felix and Regula church Zürich 1950-19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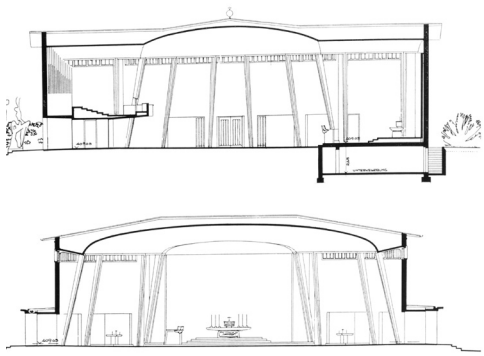


圖81b Fritz Metzger St. Felix and Regula church Zürich 1950-1951



圖81c Fritz Metzger St. Felix and Regula church Zürich 1950-195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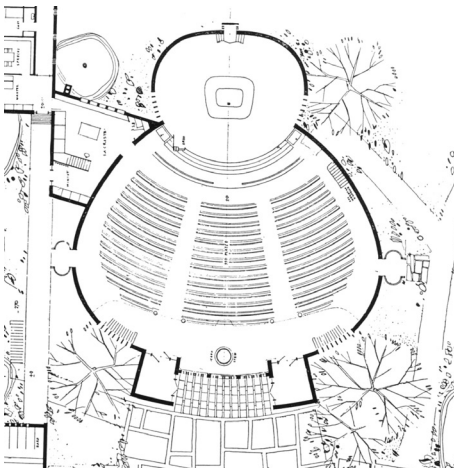


圖82a Hermann Baur St. Laurentius church Winterthur-Wülflingen 1955-19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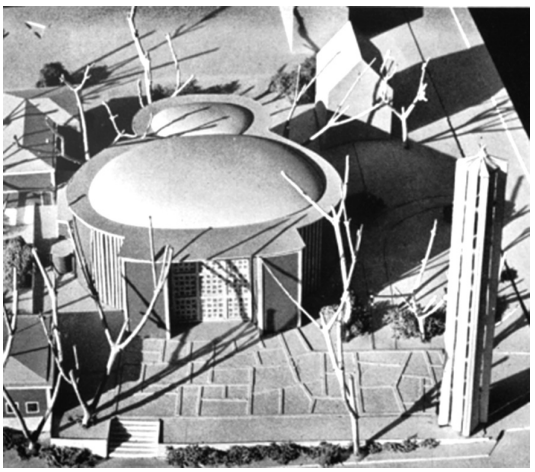


圖82b Hermann Baur St. Laurentius church Winterthur-Wülflingen 1955-1959



圖82c Hermann Baur St. Laurentius church Winterthur-Wülflingen 1955-195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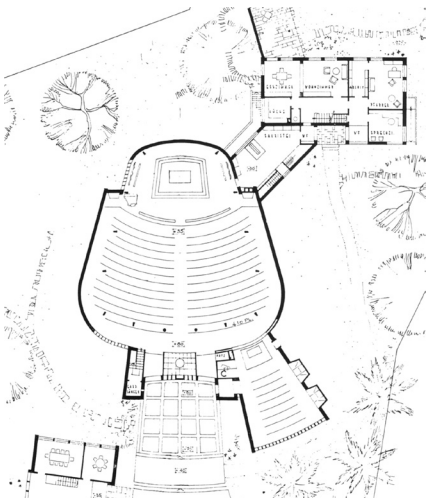


圖83a Fritz Metzger Bruder Klaus church Gerlafingen-Solothurn 1956



圖83b Fritz Metzger Bruder Klaus church Gerlafingen-Solothurn 19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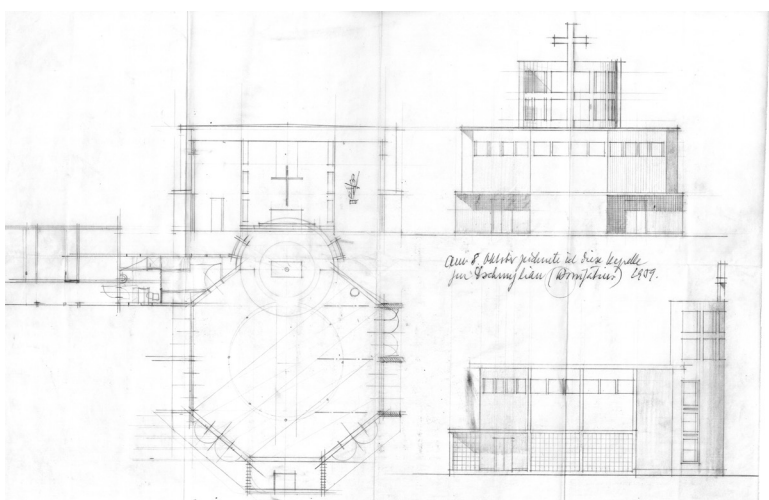


圖84 費宥諒 中寮天主堂（Dschungliau）（1959.10.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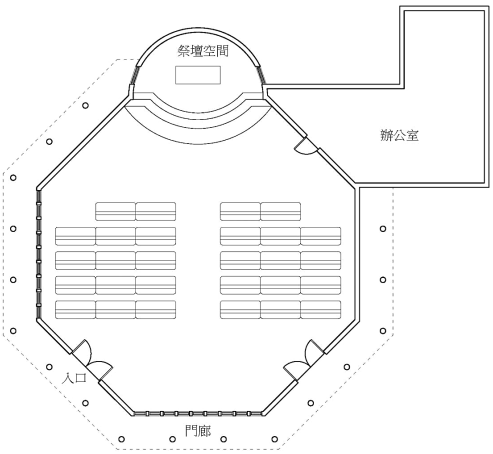


圖85a 果毅天主堂 1965 平面圖（譚文慧繪）



圖85b 果毅天主堂 1965



圖85c 果毅天主堂 聖壇區對牆（譚文慧攝影 201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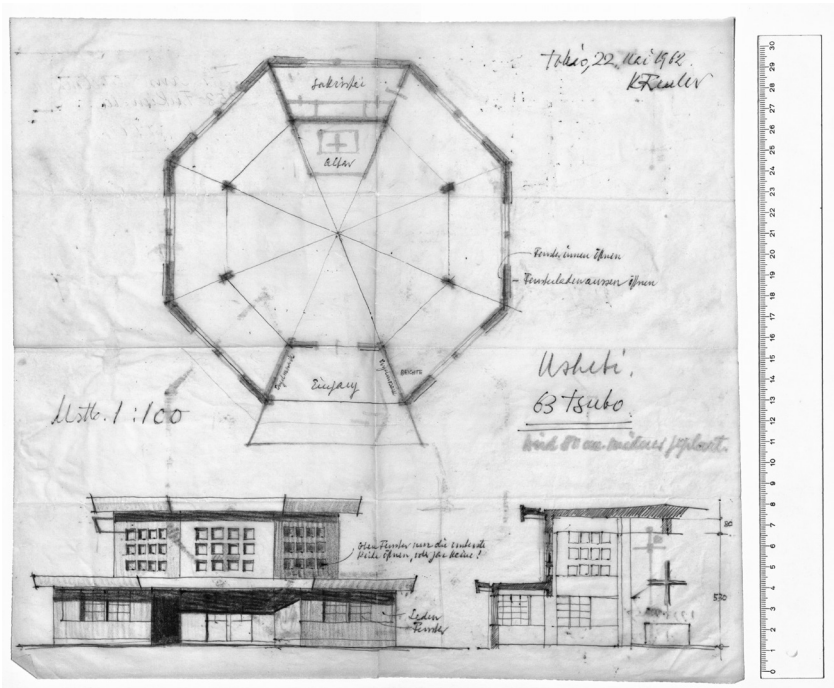


圖86a 費宥諒 烏石鼻天主堂設計圖（1962.5.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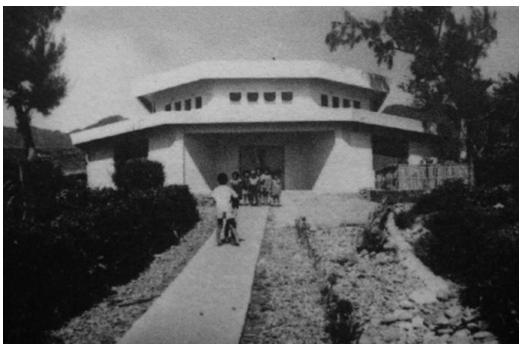


圖86b 費宥諒 烏石鼻天主堂 1963



圖86c 費宥諒 烏石鼻天主堂 196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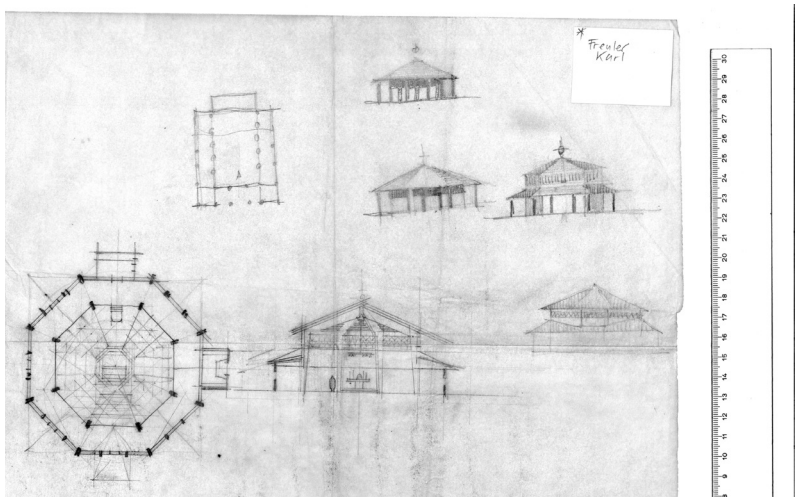


圖86d 費宥諒 烏石鼻天主堂設計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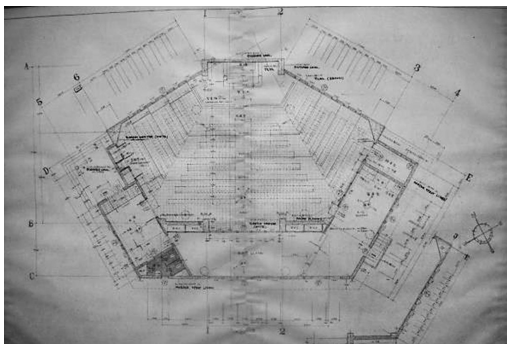


圖87 費宥諒 八日市市（Yokaichi）教堂設計圖 19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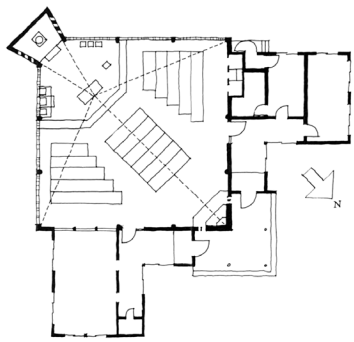


圖88a 費宥諒 三重縣伊勢市 聖多瑪木崎教會（Parish church of St. Thomas Kozaki） 1966



圖88b 費宥諒 三重縣伊勢市 聖多瑪木崎教會（Parish church of St. Thomas Kozaki） 19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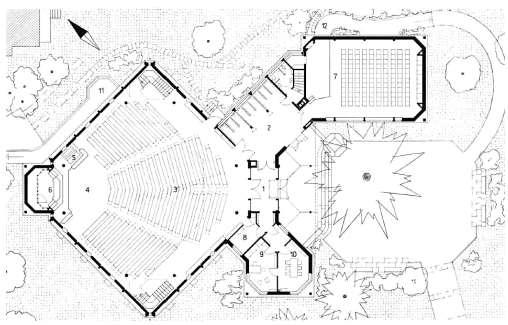


圖89a Werner Max Moser New Apostolic church Genf 195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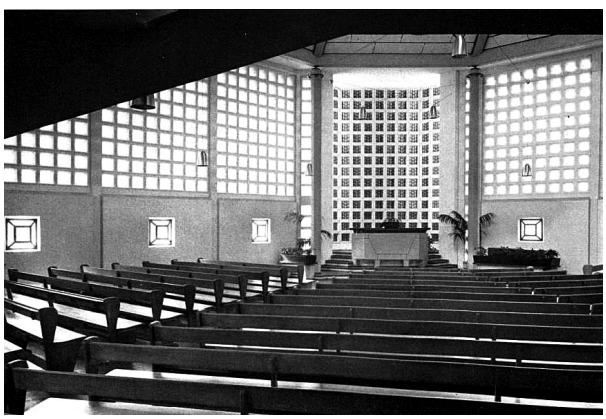


圖89b Werner Max Moser New Apostolic church Genf 1950



圖90a 費宥諒 京都主教座堂 19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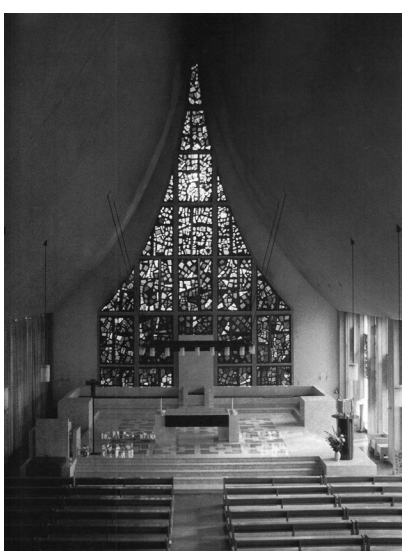


圖90b 費宥諒 京都主教座堂 1968



圖90c 費宥諒 京都主教座堂 196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From aedes to *aedificatio*: The Swiss Priest-Architect Karl Freuler's Churches in Taiwan

Yu, Li-pen
Department of Art History
Tain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Swiss Bethlehem Mission Society started new mission fields in Japan and Taiwan. Along with this development, hundreds of churches designed by Father Karl Freuler (1912-2000) were built in Japan, Taiwan, and Korea in 1950-1970. Being a Catholic priest-architect and living in Japan for 20 years, Freuler committed himself to the Asian mission through designing churches as bearers of religious education. The large numbers and various styles of the churches built have rendered Freuler's works a unique accomplishment in the architectural history.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for the first time the forty churches in Taiwan designed by Freuler during 1950-1968 through analyzing their stylistic characteristics, design concepts, and historical context. In doing so, this study aims to reveal insights into how Freuler's church buildings reflect the changes in Swiss modern church architecture, the integration of features in East Asian architectural tradition, the ideas of the liturgical movement, the strategy of Catholic mission work in Asia, and the approach of religious education and accommodation.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provide new understandings about the impact of Freuler's desig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urch architecture in East Asia and how these designs can be important evidence of the cultural and artistic correlation among Switzerland, Japan, and Taiwan.

Keywords: Bethlehem Mission, Karl Freuler, Church Architecture, Taiwan, Switzerland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